院士施仲衡：地铁越修越多，为何愈加拥堵 P24　两会推动密集修法 P34　北京“水站”黑幕 P56

2014年第11期　03月20日出版　总第533期　定价：RMB 1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5115/Z　邮发代号：4-757　国外代号：W1826



ORIENTAL OUTLOOK

东方周刊

水龙头之毒

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足够重视，但水龙头中还含有锌、锰、铬、镍等其他重金属元素，它们的析出量一直以来也没有国家标准约束





人大代表说“人”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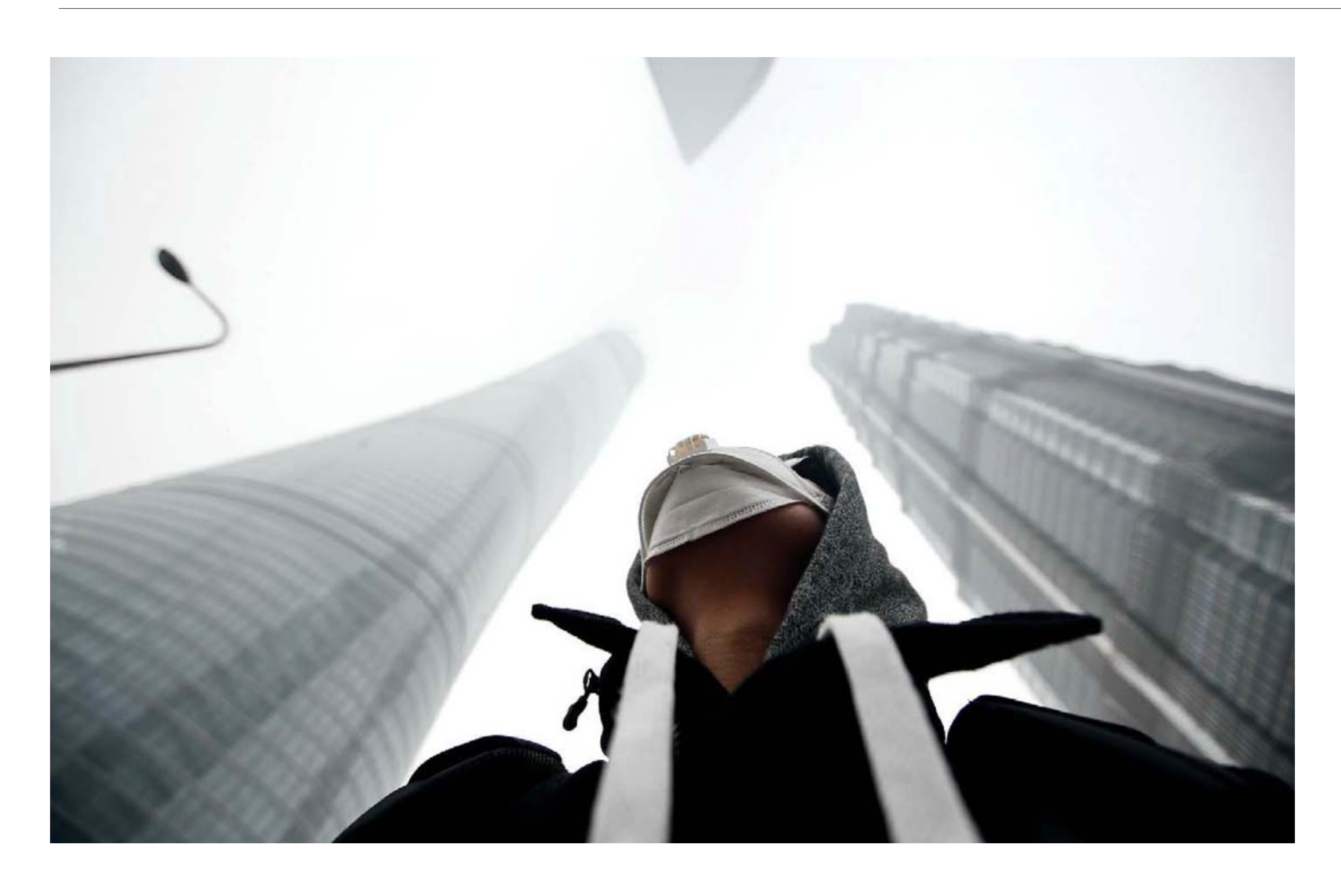
改变执政生态





告别吴天明：一个时代的背影与省思 P76

CONTENTS 目录



东方IC



现在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新市长来了、提出新要求，结果就要改线路

“目的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都能自信地在同学面前露一手，”刘永胜回忆道，“结果当年的《北京晚报》就做了个新闻：《翻个跟头就是期末考试了？》”





(2014.03.10)
瞭望新闻周刊

重塑中国经济新周期

如此背景下，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和部署，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改革工作的具体安排，都可以理解为重塑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发展战略和物质支撑的大调整和大准备。



(2014.03.05)
环　球

1937~1945：零人性屠杀

在中国，在亚洲其他曾饱受摧残的土地上，那些曾经践踏人性的暴行，会不会随时光流逝而血色渐隐？在同样经历战争暴行的欧美，会不会有人因日军暴行“与己无关”，而将这痛彻肺腑的人性之伤渐渐忽略？而这些罪行几十年间的“无痕化”过程，会不会成为那些无良政客颠倒黑白的新“证据”？



(2014.03.17)
财经国家周刊

国家治理30人谈

与两会的场内外热议国是同步，本刊邀请对国家治理充满激情和理性的 30 位各界人士，各抒治国之见。

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通讯社主管
瞭望周刊社主办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瞭望东方周刊
总 编 辑 Editor– in – Chief
姬　斌

常务副总编辑 Executive Vice Editor–in–Chief
孙　凯

副总编辑 Vice Editor–in–Chief
赵　悦　　程　瑛　　王启广

主笔 Senior Writer
黄志杰　　山　旭　　祁和忠

责任编辑 Senior Editor
黄　琳　　顾佳赟　　牛二波　　戴闻名
金明大　　张　瑜　　徐赛虎

记者 Reporter
柴爱新　　张　琰　　杨　天
黄柯杰　　刘伊曼　　赵新社
李　静　　周范才　　葛江涛
张　欣　　邢　静　　骆晓昀
刘　武　　刘　耿　　芦　垚
张　静　　傅天明　　张海林
武　刚　　吕　爽　　钱贺进
张　璐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徐修安　　周传丽　　董龄岳
周开艳　　石　婧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纪　元　　张杏梅

文字编辑 Language Editor
赵秀红

编 务 Executive Assistant
康佩红　　陈　玥　　杨卓琦

编辑部地址 Address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 305 号
电 话：(021)64728115
邮编：200031

北京采访中心 beijing Editorial Center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97 号甲
新华社发行楼 6 层西侧
电 话：(010)88052828
邮编：100031



2014 年 03 月 13 日截稿

瞭望周刊社
总编辑
姬　斌
副总编辑
胡俊凯　罗海岩　叶俊东
王磊
总编辑助理
史湘洲　杨桃源

瞭望周刊社主办刊物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环球　　　　　　财经国家周刊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赵　悦
副总经理
张　栋
财务经理
蒋震芳

广告中心 Advertising Center

常务副总经理
潘美君
副总经理
赵　君
华北区　010—88052826
销售总监
戚　健
高级客户经理
马　远　　张丽娜
客户经理
张　玮　　魏子源　　叶夏
华东区　021—64721131
销售副总监
王楚伟　　韩蕃茜
华南区　020—38810492
销售副总监
张明达
广告助理
周　杰

市场推广中心 Promotion Center

总　监
张志勇
副总监
周佳妮
市场部
孙　璐　　高雪梅　　刘丽娟
刘　柳　　韩晓晔　　韩　雪

发行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总　监
薛　玲
副 总 监
郭　伟
高级经理
王文林　　钱民义　　李　黎
李建荣　　徐　正
印　务
刘小乐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石工商广字第 0036 号
广告总代理
上海瞭望东方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
上海（021）64721131
北京（010）88052826

邮箱 E–mail

读者来信邮箱
lwdfdzlx@vip.sina.com
读者评刊邮箱
lwdfdzpk@vip.sina.com
财经新闻邮箱
lwdfcjxw@vip.sina.com
时政新闻邮箱
lwdfszxw@vip.sina.com
社会新闻邮箱
lwdfshxw@vip.sina.com
文化新闻邮箱
lwdfwhxw@vip.sina.com
新闻评论邮箱
lwdfxwpl@vip.sina.com
国际新闻邮箱
lwdfgjxw@vip.sina.com
图片新闻邮箱
lwdftpxw@vip.sina.com

印刷 Printed by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网址：
www.yuecheng.com
电话：
010–84417799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上海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757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海外定价：$2.9
（北京 399 信箱）国外代号：
W182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5883
国内标准刊号：
CN11–5115/Z
订阅热线：
(021)64728110
(010)88052829

新华网网址：
www.xinhuanet.com

瞭望东方周刊网址：
www.lwdf.cn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阅读刊物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本刊手机客户端，关注本刊官方微信、微博：


安卓版客户端


苹果版客户端


官方微信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以“权力清单”保障土地红利公正分享

本刊评论员

2014 年是土地改革破题之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做出了顶层部署，提出“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等措施。

这些措施都指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其本质是推进农村改革所产生的包括土地红利在内的改革红利更加公正合理地由农民等利益主体分享。

问题在于，在特定的时点上，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很可能意味着其他部门不得不放弃或让渡一部分权利。这些部门往往是手握实权，有责任对顶层设计实施分层对接的主体。它们的行为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顶层设计是否能顺利执行。

例如，以往地方政府掌控着所有农地变为国有土地的渠道，通过垄断这个市场赚取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才有充足的预算外财力落实包括“四万亿”刺激政策在内的投资目标。一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建设用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那么地方政府赚取土地差价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将极大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

具体落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地方政府，在强大的“财力”动机面前，会不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慎重稳妥”等本意为控制改革风险的预防性约束条件上大做文章，甚至造成改革的停滞或倒退呢？

具体落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地方政府，在强大的“财力”动机面前，会不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慎重稳妥”等本意为控制改革风险的预防性约束条件上大做文章，甚至造成改革的停滞或倒退呢？

对于这类可能直接影响到政策落实者利益的土地改革，如何让农民在内的利益主体合理公平地分享土地红利？关键在于以“权力清单”方式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权利。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权力清单”制度，表示“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这为建构政府行政行为规范、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了基本准则。

只有根据这一准则，把“规划”与“管制”的负面清单摆出来，将政府在农村土地及农民财产权益等问题上的权力阳光化、制度化，农村改革的土壤中才能开出艳丽的创新之花。

除此之外，根本性的改革还在于，把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与其生产性的公共服务能力挂钩，而非仅与其限制市场自由交易的能力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让土地改革红利充分涌流出来并实现公正合理的分配，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比如，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应予加快。无论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还是土地承包权，要转变为可用于转让、租赁、抵押、担保的资产束，应当首先明确其权属范围及关系。在资本要素相对于土地要素更加紧缺的地方，更应该优先试点，并鼓励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等有利于增加农村现代化经营能力的举措。

与之相关的是，应加快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

浙江、江苏等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抵押物不足造成的融资困难外，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资产的处理困难也让银行不愿意参与。处置抵押资产的市场基础设施及规则的供给，是政府履行制度创新职能的应有之义。

总之，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改革红利的释放及分配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权力的界限和服务的职能，这是对其落实“市场起决定作用”要求及塑造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锻炼与考验。



市长，请回答

3 月 12 日、13 日，全国政协、人大会议先后闭幕。两会期间本刊特派多名记者深入会场采访城市管理者，请他们就三个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今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最能代表自己城市形象的关键词是什么？你的城市之梦是什么？继上期刊发六位市（州）长的发言之后，本栏目本期继续记录市（州）长们的回答。

陕西省西安市市长董军：

一件是补工业短板，一件是我投入精力最多的惠民生；

厚重、包容、开放、时尚；

建设和谐宜居的国际化大都市。

云南省怒江州州长李四明：

全力推进扶贫开发攻坚，改善各族群生活水平；

生态怒江、和谐怒江、幸福怒江；

把六库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各民族兄弟团结并进、各民族文化融汇繁荣、生态宜居和谐的滨江山城。

湖北省咸宁市市长丁小强：

发展经济，旅游业上新台阶，并建成武汉城市圈绿色产业生态基地和商贸物流中心，这样才有足够财力改善民生；

秀美，浪漫，和谐；

走绿色发展崛起之路，建中三角重要枢纽城市，让每个咸宁人梦想都能实现。

四川省凉山州州长罗凉清：

进一步改善民生，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湿地，我们正恢复建设全国最大城市人工湿地，使之成为西昌新亮点，第二是平安，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全省推广；

生态、宜居、和谐、稳定。

海南省海口市市长倪强：

让海口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空气，我们有一句广告是：请到海口来深呼吸；

打造“四宜三养”城市：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养生、养眼、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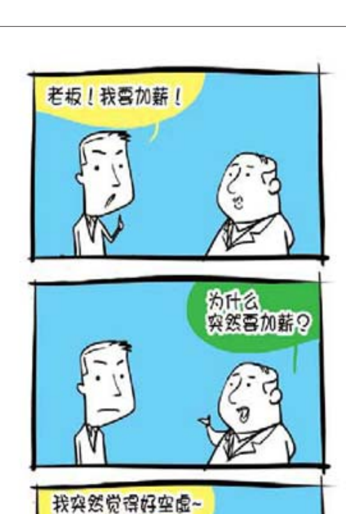
云南省昭通市市长张纪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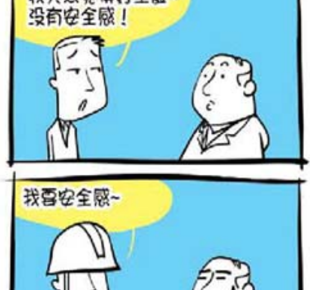
加快中心城市北部新区的建设；

磅礴乌蒙，神奇昭通；

城市之梦是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交通枢纽和生态屏障。

东方IC/漫画：张程亮





























安全感工资

所谓安全感工资，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生活安全感的工资数额。3月，“全国各大城市安全感工资标准”在网上热传，榜单所列的13个城市中，上海以9250元的工资排名第一，深圳、北京分别以8780元、8550元位列第二、三名。榜单一出，不少网友都留言表示自己“拖了后腿”“没有安全感”，也有网友质疑“安全感工资标准”不靠谱。

明明病

网络新词，并非疾病，却带有普遍性。比如明知道该减肥，却总也忍受不了美食的诱惑；明知道该努力工作，可还是得过且过。有时候，有些事明明知道不该做，可还是手欠、脑残、忍不住。对于这类症状，很多网友表示同感，并将这种疾病称为“2014年最高大上的不治之症”。

特产黑名单

指槟榔、奶酪、豆汁、甜豆腐脑等名声在外却口感不佳的土特产。不少网友称接受不了这些特产，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味，并告诫没有吃过的朋友，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不过，更多的网友理性地认为，特产食品是看各自的口味，南北差异导致各自的相互不适应，不应该对地方文化设置黑名单。

恋屏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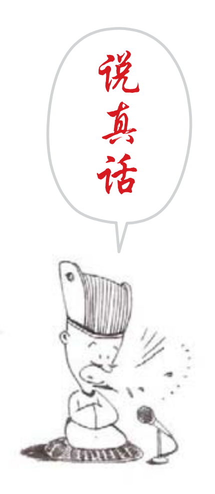
手机、平板电脑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它不仅让每个人都成为了拍摄者，也让每个人成为屏幕依赖者。等车、等人、候诊……以往各种无聊的等待时间，现在大家都在划动着指尖，拨弄着屏幕，发微信、微博，看小说、打游戏，充实着无聊的等候，甚至蹲个厕所都可以顺便了解重磅新闻。

新闻下周看



17 18 19 20 21 22 23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于3月19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此次访问没有奥巴马随行，她的两个女儿及母亲将陪同访华。







河南卫视：

否认崔永元无缘《成语英雄》系"封杀"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河南卫视即将开播的《成语英雄 2》评委名单中没有崔永元，引发公众对崔永元被"封杀"猜想。对此河南卫视品牌管理部张主任表示根本不存在"封杀"一说，随后解释："我们是年后和崔永元老师接触，他表示因时间冲突无法参加节目，但也强调因为以前合作很愉快，所以希望未来还能合作。"

山西吕梁：

散布H7N9疫情谣言男子被拘7天

近日微博、微信朋友圈及短信中有人传播"吕梁市离石地区医院感染 H7N9 禽流感及吕梁各地病例的数据"的帖子，引发部分群众恐慌。吕梁警方调查发现，2 月 25 日，孝义市民梁某某在微博发布信息称，吕梁离石地区医院收治一名 H7N9 住院病人，参与抢救的医生已被隔离，并称太原小店区已有多人被感染。后与卫生部门核实，吕梁市尚未发现 H7N9 禽流感病例，有关"离石医院发现 H7N9 禽流感病例"属虚假信息。3 月 8 日山西吕梁市公安局对外发布，吕梁一男子散布 H7N9 疫情谣言被查处。

北京副市长：

回应非"京字头"大学、医院外迁传闻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的首都经济圈规划呼之欲出，一些说法开始流传："非'京字头'高校、医院将外迁"、"央企总部撤离北京"。针对这些传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代表表示，"我们的原则是在满足首都市民需要的前提下，再适度疏解"。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也表示，教育部门要疏解部分高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避免因北京教育水平高的吸附作用形成更大的教育资源供需矛盾。

牡丹江公安局：

"火车站现东突恐怖分子"造谣者被拘

日前，网络及微信中曝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火车站发现东突恐怖分子"的传闻。经牡丹江市公安局调查，牡丹江市于 3 月 8 日曾发生一起火车站执勤警车被砸事件，初步调查发现，肇事者有吸毒史，并非东突恐怖分子实施暴力犯罪。该案现已刑事拘留一人，行政拘留两人，警告、批评教育四人。

东方IC

东莞警方：

发布"东莞遭恐怖袭击"谣言者被拘留

广东东莞警方日前透露，警方已对网上发布"东莞地王广场遭遇恐怖袭击"谣言的6人，依法分别作出治安拘留、罚款等处罚。据警方通报，3月5日东莞市鲜某上网时看到"东莞有人被杀了"信息后信以为真，并联想到昆明事件，随后编写并发布"新疆人在东莞杀人了"的帖子，称"今天在东莞地王广场有人被恐怖分子杀害，大家出门注意安全"。该帖在网络上引起各方关注，网络上传播的图片显示，位于东莞地王广场的一餐厅就餐区域被砸，桌椅翻倒在地。据警方查明，"地王广场遭受袭击图"实际上是一名外籍人士就餐时与服务员发生争执的照片，该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



美中情局：

否认非法侵入国会电脑网络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因斯坦3月11日公布称，中情局曾对一个为美国国会单独设立的电脑网络进行过不当搜查。范因斯坦指出，中情局搜索国会电脑网络，这一情况不容忽视，此举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其他联邦法律，她要求中情局道歉，并表明其所进行的搜索是不恰当的。但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很快否认"中情局非法侵入国会议员电脑"的指称，他表示"我们不可能那样做"。



1 北京：

停止审批公办高中国际班

课程体系设置混乱、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近年来，随着公办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的陆续兴起，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2013年，教育部明确表示将对各种形式的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进行规范。日前北京市教委透露，今年该市将在中招过程中加强对公办高中国际班的招生规范，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 四川：

单次死亡3人的矿山直接提请关闭

四川省安监局日前制定《四川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十条措施》，新措施加强了矿山安全监察执法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县级安全监管部门每年检查露天矿山不少于2次，检查地下矿山不少于4次，1年内累计死亡3人以上和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直接提请政府关闭。

3 南昌：

清明冬至墓区禁止放鞭炮烧纸钱

为治污减霾，保护城市环境，推进殡葬改革，南昌市拟规定清明、冬至期间瀛上墓区禁止燃放鞭炮、焚烧纸钱和冥币等迷信丧葬用品，对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环保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予以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南昌市民政局将举行听证会并公开征求意见。

4 委内瑞拉：

总统推出个人电台节目与民众交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于3月11日宣布在国家民族电台启动个人栏目，名为"联系马杜罗"。在该节目第一次播出时，马杜罗在节目中说道："这将是在另一层面上与民众对话的基地。"马杜罗表示，在此节目中，公民可以直接向他提出建议和意见，或直接批评。同时，他在Facebook上也开通了个人主页。

5 尼泊尔：

出租喜马拉雅山峰提振经济

尼泊尔观光部发言人沙普科塔3月11日表示，政府正考虑将喜马拉雅若干山峰出租给民间旅游公司，以舒缓大量登山客涌向圣母峰的压力，并协助振兴尼泊尔经济。沙普科塔说："我们已开始讨论释放若干山峰，出租给本国及外国民间企业，推广这些山峰成为新旅游产品。如果推动此计划，将可为尼泊尔带来收入。"

中国霾
改变执政生态



2013年12月9日，上海陆家嘴，戴着口罩的白领走过云雾间的摩天高楼

【编者按】

2014年全国两会上，关于环保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占比位居第一，其中有关雾霾的最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团发问：珠三角现在PM2.5是多少？

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就任后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宣示决心。

2月末长达一周、波及15%国土面积的重度雾霾，让连片的城市群面目模糊，却让一句句追问如警报般清晰入耳：是否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发展？牺牲了环境的经济发展，又能给民众带来多少幸福感？

雾霾，让环境治理问题，一下子近在眼前。当雾霾让人们的呼吸变得迟疑沉重，它已不仅仅是个环保问题、技术问题、科学问题，而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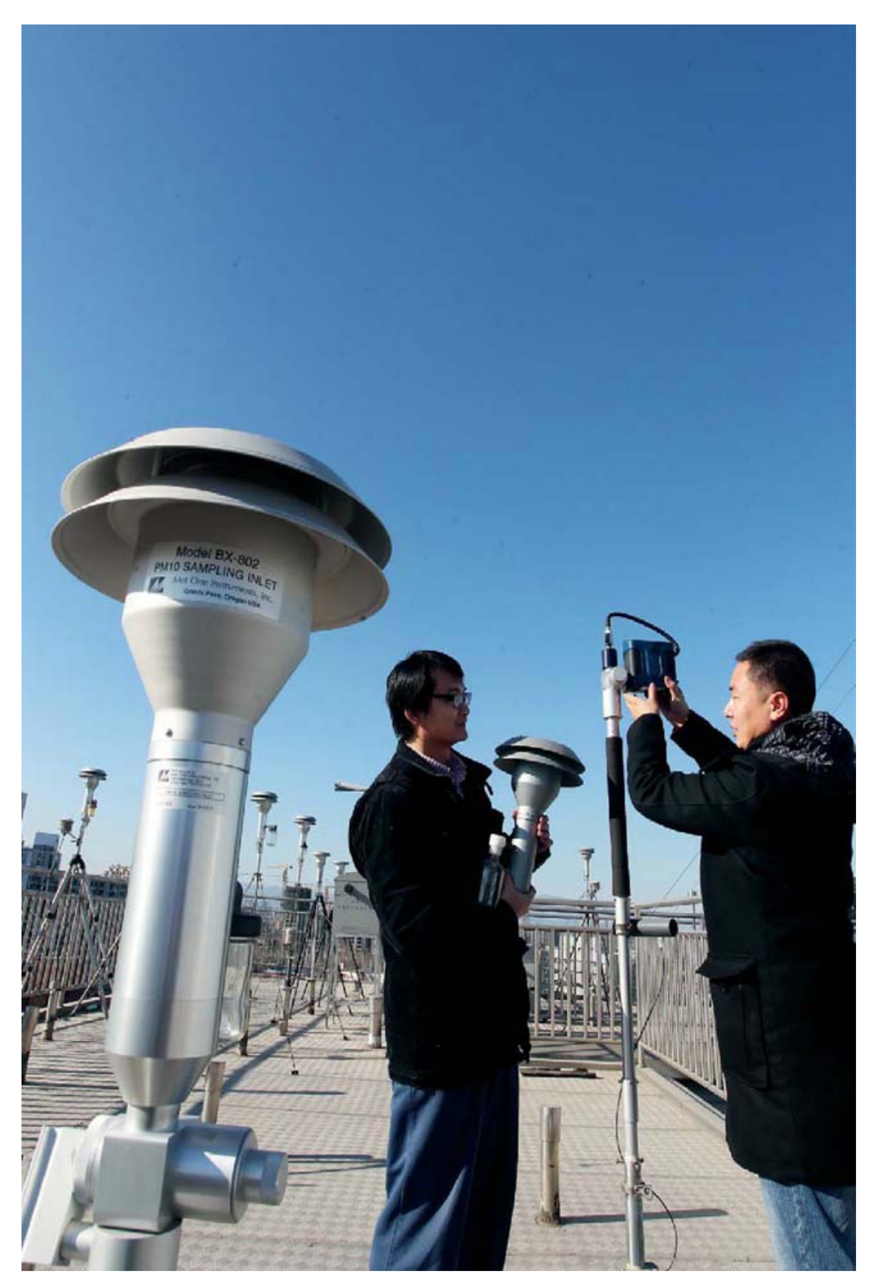
本刊曾采访过多年来主持中科院的全国性大气霾污染监测工程的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这位学者审慎地预言，空气污染问题会变成常态，三五年之内，污染面积越来越大；未来5年、10年，每年必定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雾霾污染。

可能需要不止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为其治理而投入的雾霾，正在改变中国的执政生态：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关停多少淘汰锅炉、改造多少燃煤电厂在内的明确目标，到不少地方开始尝试的"绿色GDP"，再到空气质量指标成为执政者的考核依据和问责因由，乃至呼吁机制创新的区域联动——一场由雾霾而进一步推动的发展方式、执政思路之变，已经展开。

北京治霾：7600亿元花在哪

环保部正在拟定涉及19个省份的考核办法，包括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投运率、机动车黄标车淘汰率和尾气检测率等多个指标，并争取对空气质量实施一票否决制，其中“规划年度考核”与“终期评估结果”将向国务院报告，作为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北京，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对PM2.5连续检测仪的切割头进行校验

2014年3月1日，零时起，北京市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北京宏翔鸿热力有限公司因燃煤锅炉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超标，收到一张8万至10万元的罚单。

这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后的第一张罚单，它意味着北京治霾从此违法必究。

“此条例的出台，确实为北京治霾奠定了基础。如何有效改善北京空气治理，当务之急是政府能形成一套有效的空气质量管理机制。”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鉴于雾霾的严峻形势以及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决心，北京的治霾路线图在政策层面已经清晰。

7600亿元花在哪

2014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交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降低PM2.5首次纳入立法。

会议期间最大的动静是，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当众表示治霾决心。2013年9月，国务院专门出台治理大气污染的条例，王安顺代表北京市与中央签订责任状，立下壮士断腕的决心。

“也是生死状，因为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既是玩笑话，也说明了这句话的分量很重。”王安顺说，北京市实施垃圾、污水三年行动计划，要投入848亿元。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7600亿元资金将投向何处？舆论纷纷揣测。近日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本刊专访时，首度概述了治霾资金的流向。

北京市环保局规划财务处工作人员郑定伟介绍说，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主要围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实施投放，重点是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四个领域。从环保专项资金

东方IC

投入情况来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等燃煤污染防治，以及老旧机动车提前淘汰更新等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投入力度最大。

压减燃煤使用量，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无疑是北京市治霾路线图中首要的基本战略。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工作人员伊博向本刊记者透露，北京市将通过燃煤电厂关停、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核心区“煤改电”、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等重要工程，进一步压减燃煤使用量。

这些以“压煤”为目标的工程实施已久，被政府部门认为效果显著。

2001年，北京市核心区平房居民开始实施“煤改电”工程。截至2013年底，北京城市核心区4.4万户居民“煤改电”外电源工程总体完工，全市累计有26.4万户居民采用清洁的电采暖过冬，被认为可大大降低中心城区冬季采暖煤烟型污染。

2009年，北京市7万多户二环内文化保护区居民实现“煤改电”。时任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杜少中透露，2009年“煤改电”工程预计投入资金约70亿元。该工程投入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从外围来看，为了加强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供应力度，一些新的工程投入正在不断加码。眼下，北京正在开工建设陕京四线、大唐煤制气（密云—李桥段）工程，增加北部供气通道。在2015年底前，北京不仅要基本实现区域内无燃煤锅炉，还要让远郊区县具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条件的地区，燃煤锅炉逐步改用清洁能源。

机动车污染防治仍是北京治霾的另一重要基本战略。2014年，北京限购政策进一步升级，小客车摇号指标将从每年24万辆缩减至15万辆，与此同时，拖延许久的新能源车私人购买试点终于启动，北京诸多新建小区纷纷承诺，为保证新能源车的发展，将建一定数量的充电桩。

这些新政直接指向一个清晰的目标：到2017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600万辆以内，实现淘汰老旧机动车100万辆。

“联防联控”难在利益统筹

经研究发现，北京市24.5%的大气污染并非来自本地“贡献”。北京的“空气保卫战”从单兵作战，演变为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联合作战”——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环评会商、联合执法、重污染应急，都涵盖其中

这种“联合作战”被官方称为“联防联控”。2013年9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以及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为成员单位。2013年10月协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建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 2014年2月18日，北京环境监察总队对2013年供暖季以来超标严重而受到处罚的企业进行随机暗访复查

作为大气质量的利益攸关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可谓利益共同体。从2013年开始，在北京治霾的路线图中，“区域联防联控的协调机制”成为不二选择。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副处长李立新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目前联防联控正在有序推进，2013年区域内六省区市已经出台了环保电价、车用油品质量升级价格、鼓励新能源车推广应用等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2014年还将出台包括强化煤炭质量管理、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等配套政策。区域内信息共享、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及应急联动等工作机制也将不断完善。

国家层面对联防联控亦抱有很大期待。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提到，将把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优先发展领域。

“在区域联防联控方面，我国有一定技术储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五到十年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都作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的部署，特别是在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的建立等支持空气质量管理和污染防治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了具有原创

➲ 对于北京来说，相对落后的产业已经转移，联防联控中，是否需要为联合治污支付成本？对于河北而言，是否会以需要加快发展为由，不愿在治污上“动真格”？

性的技术研发成果。

在技术储备之外，联防联控机制自去年运行以来，却面临难以回避的现实难题。

在联防联控过程中，国家环保部给出的对策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重点行业区域布局，对环境敏感区重污染企业实施搬迁改造；推进能源清洁利用，优化煤炭利用方式，增加天然气供应。

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表态：“压煤、控车、调整工业结构、治理扬尘。”

对于首当其冲的“压煤”，到 2015 年，北京市煤炭消费总量将削减到 1500 万吨。20 蒸吨以上的大锅炉，到 2015 年就可全部改造完成。

事实上，压力最大的不是北京——截至 2013 年 6 月，北京市燃煤总量为 2500 万吨，天津市约为 5000 万吨，河北省则高达 3 亿吨。由于历史原因，河北的建材、石化、电力等行业比重较大，其中粗钢产量超过全国总量的 1/4，能源消费量居全国第二位。

相比之下，北京市在上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已将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迁出，眼下服务业比重已接近 80%。

治霾联防联控，最终难在区域间的利益统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就有一次联防联控预演。当时，京津冀晋蒙的部分污染企业都曾停工，以确保北京的空气质量。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曾坦言，该省先后关停了 3 批使用燃煤的企业。当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62 万亿元，增速同比回落 2.7 个百分点。

对于北京来说，相对落后的产业已经转移，联防联控中，是否需要为联合治污支付成本？对于河北而言，是否会以需要加快发展为由，不愿在治污上“动真格”？这些问题，在联防联控所引发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仍有待回答。

绿色考核成政府“必修课”

2013 年年初，北京在内的全国 31 个省（区、市）与环保部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其中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内的 10 个省及重庆市，重点考核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确定了下降 25% 的目标。

早在“全国版”的责任目标公布之前，北京 2011 年先于其他城市，提出了“十二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具体计划。然而，这一目标实施以来，被质疑流于空谈。原因在于，始终没有建立有效的考核标准。

“真正治理雾霾，要让绿色考核成为政府必修课，通过考核这个指挥棒来引导地方政府往绿色发展的方向上转型。一方面应将 PM2.5 指标与污染物减排考核挂钩；另一方面，要将污染物减排考核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向本刊记者指出。

北京治霾的政绩考核已是势在必行。伊博表示，北京市已将大气污染防治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每年初对各区县、市有关部门上年度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同时，建立了相应的督察检查机制，对违法行为及时曝光查处，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者严格考核问责。

考核体系如何建立？国外的一条重要经验成为备受推崇的参考方案，即“空气限期达标管理制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透露，在 2000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法时，就曾提出这项制度，当时仅局限于北京这样的重点城市实施，要求重点城市制定“空气限期达标规划”，结果基本没有落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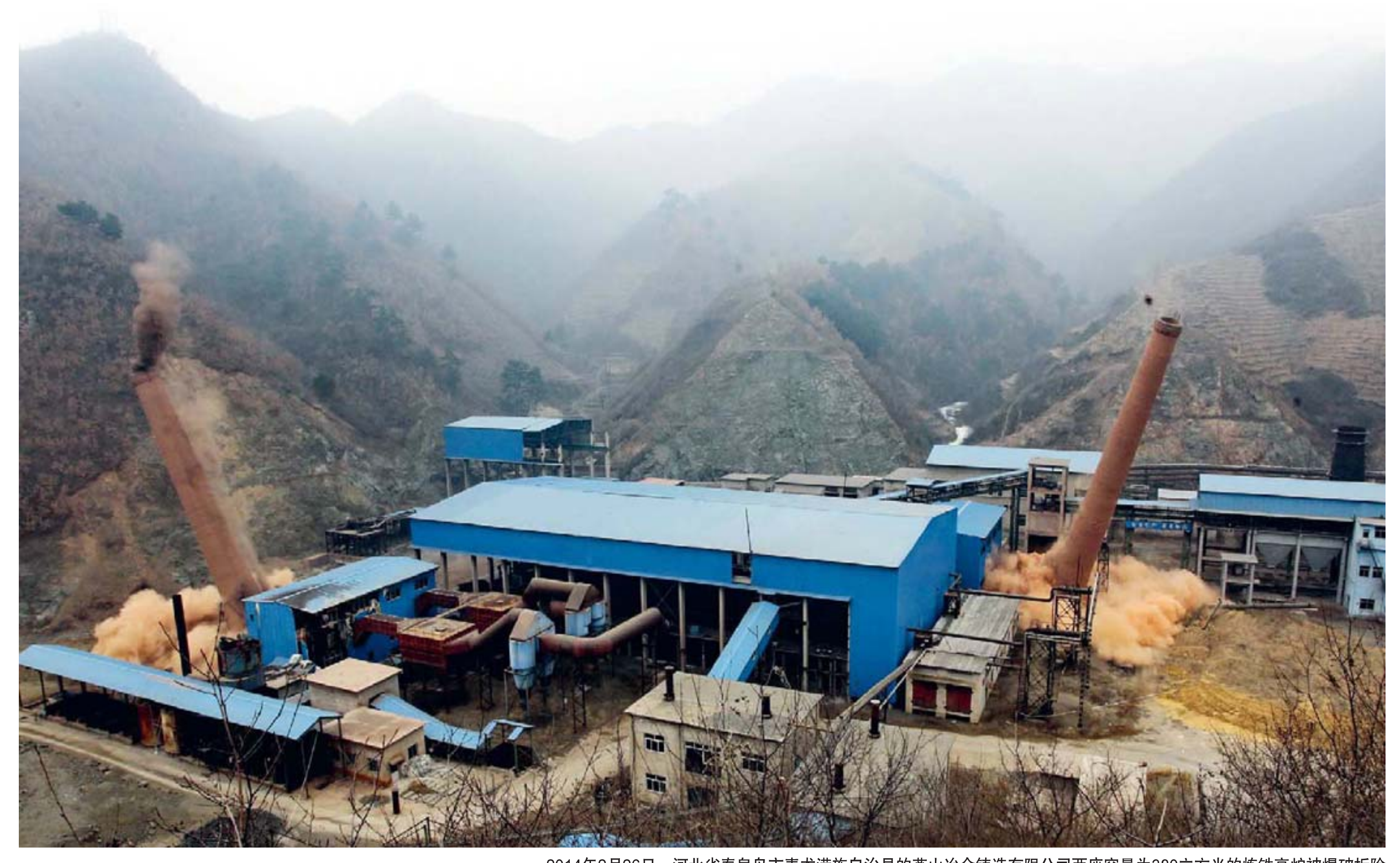
杨朝飞认为，该制度落空的原因主要是，修法时没有写清楚“达标治理规划”应当由谁来组织制定？由谁来审批、评估、考核和处罚？由谁来监督？

“限期达标管理制度的核心是要落实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专门要求企业达标。”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达标不重要，而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大气污染防治负有主要责任，政府对达到空气质量标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建立这个制度，必须在立法中，写清达标治理规划有关制订、实施、审批、评估、考核、处罚和监督的几个环节。“2000 年的‘大气法’中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地方政府不落实，也没办法去追究。”杨朝飞说。

据了解，环保部正在拟定涉及 19 个省份的考核办法，包括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投运率、机动车黄标车淘汰率和尾气检测率等多个指标，并争取对空气质量实施一票否决制，其中“规划年度考核”与“终期评估结果”将向国务院报告，作为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

一个更加乐观的信号是，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 3 月 9 日透露，受国务院委托，环保部与全国 31 个省区市签订大气治污目标责任书后，考核办法正提请国务院审议，预计上半年发布。届时，北京的治霾将与更具操作性的考核办法挂钩。东



2014年2月26日，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的燕山冶金铸造有限公司两座容量为38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被爆破拆除

雾霾推动执政之变

联防联控现在还在探索阶段，核心还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你跟邻居联防联控，凭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北京报道

2013 年下半年，雾霾席卷中国北部、东部、东北部大范围区域，而中央政府屡次强调对于空气质量的刚性约束及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在已公布的28个省份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26 个省份将空气污染治理列为要务，占比超九成，其中明确提到治理雾霾天气和监测 PM2.5 的省份达到 15 个。

2014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

总理前所未有地对治理霾问题宣布了系统的措施和目标：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年要淘汰燃煤小锅炉 5 万台，推进燃煤电厂脱硫改造 1500 万千瓦、脱硝改造 1.3 亿千瓦、除尘改造 1.8 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600 万辆，在全国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



▲山东省规划用8年时间使全省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50%左右。图为2013年5月30日，从千佛山山顶鸟瞰济南市城区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环保部获悉，今年全国两会所有的议案提案建议中，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数量位居第一，其中有关雾霾的最多。

在两会的大小会场上，不少代表委员对雾霾问题的反思已超出末端治理的范畴，而是从结构调整、城市布局、部门协调乃至发展速度的角度，探讨目前中国面临的环境难题出路何在。

会场上热烈的讨论反映着民情民意的温度，而在会场之外的中国政坛，一场由雾霾而进一步推动的发展方式、执政思路之变，正在展开。

同呼吸共命运的内涵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也有大气污染。那时候的新闻都有报道，中国版图上有卫星看不到的城市，比如山西临汾，辽宁的鞍山、本溪，内蒙古的包头等等，都是点状的污染。主要是因为城市里面有钢铁等企业。”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大气处副处长逯世泽对本刊记者说。

他介绍说，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全国不仅仅是某几个城市的污染问题。“像2月末那次重污染发生时，我咨询专家，假如北京没有人，就是一片草原，那会是什么情况？专家说，可能污染没那么重，但也会有，因为区域污染连成片了。”

逯世泽分析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是因为城镇化，城市之间日益靠近；二是由于工业布局太密集，以钢铁为例，过去点状污染的那些城市，一个城市的钢铁产能最多几百万吨，而现在，光是河北省，钢铁产能就有三亿吨。其中大量产能还是在GDP指挥棒的召唤下，未批先建。

他说，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08年做奥运会保障的时候，京津冀地区就首次提出了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采取了诸如让污染企业大面积停产等一些措施，各地提到讲政治的高度来配合完成，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虽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种应急模式很难长期坚持。甚至为了弥补“联防联控”期间的损失，污染产能又迅速反弹。

石家庄市的数位官员和专家都告诉本刊记者，作为重点保障的中心城市，北京不仅治理污染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早在2008年前，其污染企业就已尽数外迁到河北等地。被首都淘汰的产能对周边地区而言，却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香饽饽”。另外，移动污染源部分，北京的油品标准和汽车排放标准更是走在全国前沿，有专门的“京标”，品质差的油和污染重的车都不允许进入北京。这就是为什么在整片区域都污染的时候，北京的状况还能相对略好。

北京市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刚刚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更是将这种制度保障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很多条款都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的进步。

比如，《条例》提出坚持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从源头到末端全程控制污染物排放。这不仅超越了“末端治理”的思路，更是对长久以来横冲直撞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变革。

联防联控，核心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然而，单就北京而言，不管如何加强措施保障，不管再投入多少治理资金，在华北平原一整片持续而深重的雾霾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根据北京官方的统计，北京雾霾中的外来成分也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条例》的制定者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加强与相关省区市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建立重大污染事项通报制度，逐步实现重大监测信息和污染防治技术共享。

但是，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异决定了“联防联控”的平台存在短板。就拿河北来说，相对北京较为落后，除了信息可以共享、重大事件可以联防之外，经济、技术和制度保障都远远落后于北京。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又给联防联控增加了阻碍。

“联防联控现在还在探索阶段，核心还是利

益共享、责任共担，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你跟邻居联防联控，凭什么？”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英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4年2月华北地区连续重污染天气出现以后，环保部组织了12路督察组分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及《大气十条》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环保部的检查小组没有执法权力，也没有执法能力，不能直接对企业执法。只能通过发现的现象来佐证，看地方政府落实国务院的文件是否到位。我们现在下去都是带着记者，直接报道，头三天暗查，第四天通知当地政府，开始明查。把拍摄的一些证据放给地方领导看，说明检查中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违反了国务院的什么要求，然后请地方政府给出解释。通过检查企业来达到检查政府的目的。”赵英民说。

可是，让他苦恼的是，督察小组去了第一家企业之后，所有的企业马上都知道了。

在抗污治霾“联防联控”尚未建立起成熟机制之前，在GDP的刚性要求下，一些区域内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却早已形成了对抗检查的“联防联控”机制。

不仅京津冀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在内，也开始探索区域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

南京市人大环资委主任韦昌明对本刊记者说：“长三角地区的‘联防联控’，还停留在联席会议的形式上，没有常规化和制度化。”

他告诉本刊记者，和京津冀地区类似，早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及周边省市就搞过一次“联防联控”。具体措施包括每个省都配合控制黄标车，不让黄标车进上海，周边污染企业在世博会期间暂停，等等。现在南京筹备青奥会，也开联席会议请周边省市配合。

“这些都是临时性、阶段性的举措，并不足以维持长久。”韦昌明说。对于长三角区域而言，因为区域发展比较均衡，一体化程度较高，所以推进区域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机制，理论上讲更容易一些，但目前仍在探索之中。

从GDP到GEP，调整指挥棒

逯世泽告诉本刊记者：“从上到下都在反思发展方式，现在考核地方官员，不再唯GDP了，实际上也是一个调整。可能对今后的发展模式、发展什么产业、怎么布局都有影响。”

不考核GDP，那又考核什么？本刊记者获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改革和探索，如浙江省，对于杭州淳安、衢州开化等地的考核，不再涉及工业经济总量和人均生产总值等相关指标，而是增加了“水质”，“空气质量”等内容。

“浙江省的生态功能区划启动得就很早。在2008年以前，当时全国的生态功能区划做到每个省，而浙江省已经做到了每个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告诉本刊记者。

早在上世纪末，欧阳志云就开始研究生态功能的价值化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GDP用来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纳的国家和地方经济核算体系；社会指标有GNH，国民幸福指数，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目前尚缺乏与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和核算体系接轨，同时被各国所接受的衡量指标。

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评估与生态系统核算，已经成为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前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在寻求超越GDP的核算指标。但是，如何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的成果为基础，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引导全社会参与环保、遏制生存环境的恶化，是关键性的“临门一脚”。

欧阳志云说：“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这些价值，和我们需要汽车、住房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些东西以前没法计算价值，现在雾霾严重了大家知道空气有价值了，并且知道如果不保护它，就会出大问题。”

基于此，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跟多地合作，开始研究搭建“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框架，旨在解决生态环境的保护成果如何纳入一个可量化的评估体系之中。像广东、海南等地，都表现得很积极。

欧阳志云告诉本刊记者，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机制，使之成为考核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保护成效和生态效益的指标，还需要建立起国家生态系统核算框架与指标体系。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态要素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个框架需要均衡考虑到各个地方的特点。另外，还需要再加强监测评估和技术研究，完善定价方法。最后，要以GEP为基础，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中。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步。“这个工作，我们做出来是一个工具，但如果不用就只是一个玩具。和GDP核算体系一样，它需要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东

在抗污治霾“联防联控”尚未建立起成熟机制之前，在GDP的刚性要求下，一些区域内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却早已形成了对抗检查的“联防联控”机制。



环保标准执行不到位是根本问题

——专访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

现在的环境保护是“不缺技术缺良心，不缺标准缺执行，不缺口号缺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李潇雄 | 北京报道


熊跃辉

2013 年，在担任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五年之后，熊跃辉转任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工作重心从环保督查一线转向推动环境科技进步和环保标准的制定落实。

出任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之前，熊跃辉就曾担任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这些年，随着我国环境问题逐渐突出，正是国家环境督查体制改进与督查力度提升明显的关键时期。

治霾须先理清“源清单”

《瞭望东方周刊》：你从华北督查中心主任转任科技标准司司长之后，多次讲到要从科技角度重新梳理治霾思路。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对治霾的意义？

熊跃辉：科技治理是一个抓“牛鼻子”的措施。简单说，就是利用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得排污产业、企业减少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程度。如果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污染物就减少了。

从科学的角度说，雾霾治理的目标简单而明确，那就是主要控制煤炭的消耗。我国现在的煤炭产量约 40 亿吨，仅有少部分出口，大量是国内消耗。煤炭的开采、运输、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颗粒物 PM2.5、PM10，也就是构成雾霾的主要成分。所以，治霾首要是“控煤”。

“控煤”首先是减少消耗，但强行削减煤炭产量和消耗量，需要考虑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力。比如，我国电力事业的 60%~70% 要消耗煤炭，而现阶段火电还占据极大比重。煤炭、石化能源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不可能在总量上一下子减得太多。

北京现在年消耗 2000 多万吨煤，到 2017 年得减少到 1300 万吨；河北省煤炭消耗是 3 亿多吨，到 2017 年要削减 4000 万吨。这仍然是有限的，就得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煤炭、石化能源利用的清洁程度和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科技治霾，首先就需要搞清雾霾的科学成因。

熊跃辉：霾的形成是很清楚的，三个要件：静稳天气，80% 以上的空气湿度，以及一定时空内的颗粒污染物浓度。难度是如何准确搞清污染物的来源、成分，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控制。

各地情况还存在不同。比如，北京雾霾的来源与廊坊、保定、石家庄的雾霾来源未必是一样的。

环保部 2013 年 10 月出台了“清洁空气研究计划”，首先就是对污染物的“源解析”，理出“源清单”。打比方说，机动车尾气贡献了多少、燃煤电厂贡献了多少、工地扬尘贡献了多少，等等。如果不能从科学角度尽快摸清雾霾来源，治霾就没有针对性。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源解析”存在技术难度吗？

熊跃辉：环保部主要是推动出台“源解析”的方法和标准，然后各地依据方法实地检测，拉出“源清单”。检测的技术难度很高。

就全国范围来说，雾霾治理也不仅是治理 PM2.5、PM10。华北、长三角地区的主要污染物确实是颗粒物 PM2.5、PM10，但在珠三角地区，主要污染物就不仅是颗粒物了，还有臭氧。

根据 2012 年国务院最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臭氧也是六项必须评价的空气指标之一，对人体的危害不亚于 PM2.5。

CFP



2014年3月7日，安徽省淮北市，亚洲规模最大煤化工企业——安徽临涣焦化股份公司生产厂区

PM2.5相对还好治，真正做到控制燃烧、提高油品质量就行，但是臭氧很难治。臭氧的主要来源是VOC（注：指可挥发性有机物），VOC有1000多种，涉及印刷、油墨、涂料、家具喷涂、汽油挥发、餐饮油烟等等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是无组织排放，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不见摸不着。所以，VOC的治理难度就更大。

《瞭望东方周刊》：大众都在关注雾霾，对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

熊跃辉：这方面的差距更大，人们看得见雾霾，看不见臭氧。对VOC的治理，可以说现在是“老百姓缺认识、政府缺重视、监管部门缺标准、缺检测方法”。臭氧的治理也是我们当前“清洁空气研究计划”的主攻方向，如果现在不加强认识，过两年跟现在面临的雾霾问题将是一样的。

河北200多家钢铁企业只有几家达标

《瞭望东方周刊》：针对雾霾治理和污染物排放，国家和环保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靠什么去落实？

熊跃辉：最重要的手段是严格标准。标准是根据当前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来设定的。比如，有的行业污染不是很严重，那么可能根据三分之二的企业能达到的水平来制定标准；有的行业产能过剩，划线就会严一些。一方面，通过标准来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标准逼迫企业、产业实现技术进步。

比如说钢铁，我们要求钢铁烧结机机头的粉尘排放是40毫克／每立方米，机尾是20毫克／每立方米。但是，据估计，大概有五分之四的钢铁企业如果不加大技术进步和改造，很难达到这个标准。尤其是河北现在的200多家钢铁企业，估计只有几家能在严格污染管理的条件下达标。

通过严格标准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水平、降低污染物排放，这是很多国家都用过且奏效的手段。国家标准是技术法规，是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红线，越过红线就是违法，这是具有强制性的。

《瞭望东方周刊》：标准早已制定，但执行似乎一直都存在问题？

熊跃辉：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缺标准，缺的是执行不到位。

这有几种表现：一种是选择性执行，国家要考核的指标就执行。比如，地方在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这几项考核标准上就认真抓，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交差、交数据。

另一种是根本不执行。比如钢铁业，我们曾经排查发现，不要说现在收严以后的标准，就是过去的老标准，也有70%的企业达不到。现在我国的钢铁企业大多是违法而上，挣的就是牺牲环境的钱。

比如，生产一吨钢花在执行环保标准和污染治理上的成本，大约要一百元，但我国一吨钢的利润最低时还不够买一瓶矿泉水。钢铁企业要达到环保要求，必然亏得一塌糊涂。所以，环保标准在一些地方可有可无，有的地方政府还把执行环保标准视为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瞭望东方周刊》：像河北等一些省市，钢铁是地方的经济支柱，怎么能做到依靠地方政府去监管钢铁产业污染？

熊跃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一是不管，一是不让你管。一家钢铁企业一年能给一个县贡献几个亿，他会去管？他能让你去管？

本来，除了国家制定环保标准外，地方是有权制定地方标准的，但我们梳理发现，有三分之一强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没有一项对应的地方环保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需要照顾全国的情况，无法针对某些地方特殊、突出的环境问题，这就要求地方通过地方标准，针对这些特殊的环境问题提出要求。问题是，有的地方不但没有地方标准，甚至连国家标准都不想执行。

《瞭望东方周刊》：针对这些情况，环保部怎么去推动问题解决？

熊跃辉：不久前，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主持下，部长专题会刚刚通过《关于加强地方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目的就是积极争取各省级政府制定配套的严格的地方标准。部里的想法是，在当前国家标准没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强化地方标准来解决一些地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此外，环保部还自2013年3月开始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19个省区市的47个地级以上城市，涉及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重污染行业以及燃煤工业锅炉的新建项目纳入特别排放限值。

这47个城市的火电行业要达到这个特别条款标准，问题不大。问题最大的是钢铁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标准要求钢铁烧结机的机头达到40毫克每立方米，机尾要达到20毫克每立方米。这个标准将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执行，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算只有10个月的时间了。

按照这个标准，80%以上的河北钢铁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升级，需要改造脱硫、除尘等生产环节。这个改造完成，从动工的这天开始到结束，保守估计也要8个月时间，并且需要停产进行。

问题是，现在来看，河北还没有几个企业动手的。很显然，到2015年1月1日，他们要不就是违法干了，要不就得停了。

《瞭望东方周刊》：环保部是否在抓紧推动他们执行？

熊跃辉：环保部一直在严格要求，近期还要做一些评估，提醒地方政府迅速行动。

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交叉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环保标准执行不力是否因为惩处力度不够？

熊跃辉：我当了五年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标准执行不力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刺激企业去完善工艺设施，达到标准排放。

在打击非法排污等问题上，现行法律比较疲软，《环境保护法》20多年都未曾修改。很多人大代表跟我说，我等《环境保护

➲ 生产一吨钢花在执行环保标准和污染治理上的成本，大约要一百元钱，但我国一吨钢的利润最低时还不够买一瓶矿泉水。钢铁企业要达到环保要求，必然亏得一塌糊涂。所以，环保标准在一些地方可有可无，有的地方政府还把执行环保标准视为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法》修改都等到水黑了，等到一代人的头发白了。20多年前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现在看来显然微不足道。

举个例子，非法排污是按照排污费的三到五倍来处罚，如果平时交3000元排污费，假设排污十天，这没多少钱，对企业来说处罚不痛不痒。而且，环境执法部门处罚手段极为单一。以前就是单纯停留在行政处罚上，事实上，如果要制裁一个违法企业，需要刑事处罚、民事处罚等多种手段。

从国外来看，民事追究是很重要的手段。但在我们国家，追究民事处罚现阶段仍然相当难。首先是取证难，比如说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没有规定可以给老百姓看，可以给你拿去打官司，甚至有的地方还以保护企业为由不让老百姓看。老百姓拿不到证据，他自己去监测又有严格规定，如果不是科学取样也没有用。

关于刑事责任，2013年6月“两高”对《刑法》338条作出司法解释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可操作性才大大增强。过去追究刑事责任是以“后果定罪”，如造成多少人伤亡、多少耕地失耕等，才能追究刑事责任，问题是现实中环境后果评估极为困难。去年“两高”作出司法解释后，转变为“行为入罪”，只要你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入罪门槛降低以后，我感觉到效果大不一样。过去我带队下去督查，他们根本不怕你，甚至有的还盼着你去处罚。因为他只要被罚过，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监管部门就再没辙了。

《瞭望东方周刊》：*从环境督查的角度来说，地方省市的督查职责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熊跃辉：地方执法的问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敢为”，过去考核干部的主要手段就是看GDP的增长，至于老百姓的健康、环保等等指标都是没有约束性的。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让环境管理部门去企业检查。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要进园区企业检查，说不行，要有纪委批准。这些“土政策”完全凌驾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之上。

还有一种是客观上“不能为”，我国很多基层环保部门缺人才、缺能力、缺技术设备的问题极为突出。我曾经问一个县的环保局，他们十年没有进过一个科班出身的环保人才。很多时候下去督查，走一路能抓出一路的问题，但是有的地方环保队伍长年累月在那儿都找不出问题。何况，很多地方企业也在绞尽脑汁跟你对抗、造假，让你轻易监测不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问题在地方很普遍吗？有人据此提出对环保执法队伍进行“垂直管理”，有无必要？*

熊跃辉：这些问题特别突出。当然，还有“不作为”的情况。在执法中，见风使舵，讨好某些企业、领导，对当地的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对有些和领导沾亲带故的企业，网开一面，从以往来看，这种“行政干预、地方保护”是很普遍的。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强调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越来越严，政策越来越具体，地方领导干部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增强，这种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确实越来越少了。

现在来看，我觉得直管没有必要了。这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法律已经规定环境保护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把队伍收上去了，哪儿来人干活呢？第二，收上去是治标不是治本，治本要加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约束性考核，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第三，国家层面应该是侧重宏观管理，通过制定标准、加强考核，来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制定标准、改进管理机制，市场的手段呢？*

熊跃辉：市场的问题也是管理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交叉。这在机动车领域体现得比较明显，针对机动车减排，车、油、路是三位一体的，有好车、没好油，有好油、没好路，都是白搭。

比如柴油有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前者的含硫率比后者标准严格，但我们督查发现有的高速路上还是可以加到普通柴油。这块儿谁去管？我们管不到加油，交通部门也没法管，对车主来说，加车用柴油还是普通柴油对其没啥区别，后者还更便宜。因此，协同管理是个关键问题。

再比如新车要进行型式核准，但我们接到过举报，有的车企送检的是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车，但市场卖的却是“国三”的车。

《瞭望东方周刊》：*从环境管理体制来看，过去主要侧重“总量排放”控制，未来对外界关注较多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否会有推进？*

熊跃辉：客观上，“总量减排制度”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新的形势下确实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我概括了一下，现在的环境保护是“不缺技术缺良心、不缺标准缺执行、不缺口号缺机制”。

环保部几次讲到要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注重从完善顶层设计入手，简单地理解就是让每一个区域根据环境容量来确定排放量。今年开始，我们要全面推行。东

本刊记者石婧摄



早在日本中央政府将环保列入议程之前，日本地方环保行动已经先行一步。图为日本横滨街头

治污机制的他国经验

日本有被称为"直罚主义"的制度设置，若企事业单位和国民违反了法定条文，执法机关可以不经法院审判，直接以违反行政上的义务为依据给以刑事处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污染重疾时，如何强化机制，创新治理方式？

强势的日本环保省

20 世纪中叶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期，但工业发展给日本带来的问题一度不亚于其成就："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 和 "痛痛病" 等公害病相继暴发。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四种公害病的受害者把排污企业告上法庭，成为轰动一时的 "四大公害诉讼"。

重压之下，日本政府在 1970 年前后重拳出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重新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并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等 14 个相关环境法案。

日本环境省的前身日本环保厅，就是在 1971 年成立。环境厅是负责日本环境政策及计划制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环保工作的部门。2001 年，日

本中央政府各机关由原来的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在此次改组中，日本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日本环境省直属首相领导。除了这一部门，其他相关省厅也需对自己部门的环保工作负责。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曾撰写报告对日本环保机构的设置进行评价。其分析认为，日本的决策机制基本上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即任何决策的形成都是部门间或不同利益团体间谈判、妥协和平衡的结果。所以，在各部门形成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日本政府的这一结构可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否则，协调的难度和成本会很高。

而在这一政策协商过程中，环境省有两个优势，使其能够发挥统一监督管理的权力和职能。第一，环境省虽是总理府的直属机构，但其长官属于内阁大臣，与其他省大臣具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机会。第二，环境省被赋予协调各省厅环保工作，特别是协调污染防治经费预算的职能。根据法律规定，环境省有权向各部门提出质询和环保要求，各部门应予以答复并采取措施。环境省长官是内阁成员，可以参加内阁会议，可直接向总理报告环境事务，或提出立法建议，亦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执法威慑力

除了环保省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之外，执法部门的特殊制度设置，也是日本环保政策得以顺利落地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环境保护制度中有一系列复杂的指令控制制度。其中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公害防止计划制度、签订公害防止协议制度、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公害受害者补偿制度等。除此之外，还有日本首创的一种制度，包括水质总量控制、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这一制度对特定地区的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制定标准，进行定量控制。

这些制度早已进入日本的环境法律法规，一旦有超标排放发生，执法机关将发挥法律的强制力。

在日本的很多环境法律法规中，有被称为“直罚主义”的制度设置。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若企事业单位和国民违反了法定条文，执法机关可以不经法院审判，直接以违反行政上的义务为依据给以刑事处罚。例如，若故意实施超标排放行为，可以对直接责任者或者企事业单位处以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过失超标准排出的，对其责任者直接处以3个月以下的拘役或5万日元以下罚金。

不难想象，这一制度将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形成巨大威慑。

美国的中央环保部门几乎与日本同期设立，1970年7月，分散于农业部、环境质量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能，集中成立了美国国家环保局。

和日本相似，美国国家环保局除了组织排污许可证的实施、对企业排污行为进行调查检查之外，也拥有极具威慑力的执法权。

美国环保局是美国最主要的环境执法机构，相比其他联邦机构权力更大。比如，美国环保局有独立的执行机构和法庭。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美国环保局与各州的联系比其他部门更强。如果环保局发现地方的环境执法不力，可以直接行使原来由州行使的环境执法权。环保局或州政府在环保执法时有3种可供选择的行动：行政行动、民事行动、刑事行动。

这其中的刑事行动，惩罚范围从罚款到判刑。《资源保护回收法》中刑事处罚从每天罚款不超过5万美元或不超过5年徒刑，直至罚款总额不超过100万美元或不超过15年徒刑。大约每7次刑事行动中，6次的结果是罚款低于每天5万美元或刑期低于5年。

谁在影响环保政策

如前文所述，由于环保问题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因此，中央地方关系是环保体制面临的问题之一。

尽管美国环保局拥有较一般联邦机构更大的权力，但是，美国各州环保机构仍然具有自主性。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马英杰在对比了美国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后，认为中国趋向于中央政府主导型和驱动型的环境管理体制结构及工作方式，是目前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之一。

在美国，州级环保机构不受联邦环保机构的领导和管理，各州环保局各自保持独立，依照本州法律履行职责，只依据联邦法律在部分事项上与联邦环保局合作，完成任务。相较而言，中国的地方政府缺少自主行为，积极主动性发挥不够，中央环境管理权力较集中，具体职能较繁杂，负担较重，管理成本较高。

因此，需要设计中央与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机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效率，这种互动体制基本可以保证环保标准既能保护公众健康，又照顾到各方的利益。

从日本的经验也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在环保中的作用。

早在日本的中央政府将环保列入议程之前，日本地方环保行动已经先行一步。地方政府针对区域环境公害制定条例，为日后日本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打下基础。例如，作为日本地方自治政府关于环境立法的第一例，东京都早在1949年就制定了《工厂公害防治条例》，这比“公害国会”早了21年。此后，大阪府、神奈川县、福冈县等也制定了类似的条例。

这并不难理解。由于环境问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民众发起的邻避运动常常成为地方最初的环保动因。

现在，日本地方政府仍然在环境保护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指令控制制度，其污染物的排放值就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协商而定的。日本政府也十分注重畅通环保参与渠道，民众可以通过递交居民意见书来反馈意见，也可以参与听证会对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美国，外界对官方的环保决策影响则拥有更多的自身制度特征。

影响美国环保立法的大致有两类团体，一是行业团体，一是环保团体。由于现代环保运动发源于美国，因此，经过多年发展，美国环保团体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1992年，美国已有1万多个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10个最大的组织的成员已有720万人。东

（实习生郑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4年2月26日，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隧道施工现场

院士施仲衡：
地铁越修越多，为何愈加拥堵

现在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新市长来了、提出新要求，结果就要改线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于晓伟 | 北京报道

CFP

作为缓解城市拥堵的重要手段，以及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地下铁路正在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建设高潮。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铁工程咨询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的描述，目前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2500多公里，81.7%为地铁，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中国因此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在轨道交通中占比最高的国家。

然而以北京为例，虽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大力发展以地铁为主的公共交通，但至少在市民感受上，交通却愈加拥堵。而且在里程大量增长的同时，地铁自身也显得难堪重负。

作为中国权威的地铁专家，施仲衡却不主张更加剧烈地继续扩张地铁路网。

因为除了换乘、节能等诸多技术问题，中国地铁也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挑战，其中很多并非地铁系统自身所能克服。

比如地铁建设需要追赶、配合经常变动、深浸长官意志的城市规划，由此显得凌乱而疲惫。

以为多个城市提供地铁建设咨询的经历，施仲衡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达出对于“市长决策”的强烈反感。

他强调，轨道交通并非就是地下铁道。

地铁建设在中国已经不只是城市交通领域的问题。它已经深刻而直接地反映出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挑战。

换市长了，直线改环线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讲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结果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堵、地铁越来越挤？

施仲衡：拥堵的问题要从规划说起，咱们现在的规划老是变化。轨道交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但城市规划却一调再调。比如最近有副部长讲的北京天通苑的问题。我们在最初审查北京地铁五号线的时候，规划里面就没有天通苑站。那时候客流预报单位给出的客流预报，跟后来通车之后的实际客流出入很大。

城市规划老是在变化。比如北京CBD现在越来越往东。那些在高楼里上班的人，多数并不住在附近，他们每天上班都要有来回，这就给交通带来压力。

习近平同志说交通拥堵是个大难题，并提出来要科学规划。现在不光北京，全国都是规划不固定，经常调整。城市规划一调整，城市的轨道交通规划就要跟着改变。一改就有了很多问题。比如原来预计客流高峰3万人，城市规划变化之后这个数字变成5万人，通车后就很拥挤，就得限流。

规划是基础，地铁的规划跟城市的规划应该密切结合，城市规划要稳定、要立法，不能随便改动。现在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新市长来了、提出新要求，结果就要改线路。广州本来是在南北和东西客流最大的地方规划修地铁，但是新市长来了之后，要求修环线。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修环线与每个直线都要有换乘站，修好的地铁再修换乘站，这就存在很多问题。

再比如1987年上海一号线审查可行性报告的时候，只考虑到本身建设，当时我们提出人民广场和徐家汇是不是应该有换乘的设计？建议可行性报告里要考虑到。上海的工程师却表示没法考虑。到后来修建地铁二号线建设换乘站的时候，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结果不仅是一改再改，到现在人民广场的换乘仍然不方便。

交通交通，相交的地方畅通才是交通，这样的规划才合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建设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单站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地面是东西的交通，不要红绿灯，下边过南北的线路，再下去是东西的地铁车站，再下面是南北的车站。这个规划当时交到发改委讨论了8次，最后到市里审批时领导就是不同意。最终的结果是车站往东移动，西单地铁站距离路中心190米，这样四角的客流非常不方便。

这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不是科学民主的决策。现在中央提出民主决策是非常重要的，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民主讨论后再决策。我去法国波尔多考察，他们最早要在市中心修5到10公里地铁，但是规划提交议会讨论时，议会不同意。因为地铁造价高、时间长，讨论后变成修建有轨电车。最后他们用建设5公里地铁的费用建成了20公里的有轨电车。这就说明，规划要立法，决策要科学民主。

交通拥堵是个大难题，从最上头，城市规划就没有进行很好的考虑。实际上，城市的人口与城市的资源、城市的环境要相结合。如果没有那么多资源，人口却无限发展，土地资源、水资源都会是大问题。

城市的承载能力，与资源、土地、供电、交通等都有关系。交通也是一种资源，有一段时期，北京要求建设建筑物首先评审交通是不是可行，然后再规划作决定，但后来也就不提了。


施仲衡

本来是在南北和东西客流最大的地方修地铁，但是新市长来了之后，要求修环线。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修环线与每个直线都要有换乘站，修好的地铁再修换乘站，这就存在很多问题。

如果不解决，老百姓就得天天受罪。地铁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高铁一年也就坐两次，但是地铁每天都得坐，可能每天上下班都受罪。

北京提出要建设宜居城市，如果资源不够，连出门都拥堵，如何实现宜居？

地铁和公共汽车在竞争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说车多，是由于公共交通不方便。这些年用了很大力气发展公共交通，为什么不见缓解？

施仲衡：一个城市空气污染、出行不便，大家才开汽车出门。公共交通如果非常方便、非常舒服，为什么还自己开车？上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乘坐地铁就非常方便，住的地方有短距离的公共汽车，可以把附近的居民送到地铁站。

地铁为什么叫做骨干交通？大客流应该在地铁上通过，边上才是公共汽车。比如香港，公共汽车可以把乘客方便地送到地铁站。现在我们的公共汽车与地铁线路变成了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

当初从复兴门到八王坟的地铁线路修好了，地面上公共汽车仍然平行运行。我们提意见，地面交通应该把边上的客流送到地铁，但是地面公交却不同意。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交通拥堵的原因很多，错综复杂。最重要的就是规划，规划要合理。地面建筑物与交通的关系、与公共交通的关系……应该把他们融合为一体考虑。

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市长说了算，市长应该只是执行者。1977年我去日本考察的时候，他们介绍轨道交通规划是经过议会审批的，市长是按照议会审批的结果去执行。规划不能修改，如果修改，方案仍然要经过议会批准。

我们的问题是，规划的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地铁应该是修在市中心解决拥堵问题的，北京在还没有修好市中心线路的时候，就开始建设十三号线。当初评审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同意，认为应该首先修建南北市中心线路，等建成路网之后，再往外修。不然地铁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从规划开始，交通与城市的发展、与城市资源应该是一体化的。能统一考虑这些问题，确实是个难题，但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如果不解决，老百姓就得天天受罪。地铁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高铁一年也就坐两次，但是地铁每天都得坐，可能每天上下班都受罪。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我们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状况如何？

施仲衡：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我们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2500多公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地铁，比例甚至到了81.7%，是全球地铁线路最长、占比最高的国家。国外这个比例一般是30%。比如伦敦，他们的地铁达到410公里，修了100年了。北京现在已经有465公里，我们才修了几十年。

最初我们修地铁考虑的是战备。我1959年从苏联回来就开始修地铁，当时国防部定的是120米深。我找相关领导汇报，说120米太深了，世界上都没有这个经验，难度太大。后来中央开会，研究决定地铁采取浅埋加防护的办法，最深的地方是二号线的西直门站，只有27米。

最初考虑战备，后来才开始考虑交通。虽然地铁在不断延伸，但是按照地下铁道设计的原则，应该就在市中心，长度一般20到30公里。如果到更远的郊区县，就应该换乘汽车。出了市中心，就应该用区域线或者有轨电车。

城市轨道交通应该是多制式的，不能限于地铁，应该因地制宜，需要什么修什么。地铁的造价最贵，每公里6亿到8亿元，轻轨和地面有轨电车成本依次降低。现在国家批复了28个城市的地铁线路，包括一些二三线的城市也在修地铁。有些城市负责人还宣称地铁的修建水平不能低于北京，这个趋势不得了。很多地方显然更适合有轨电车或者轻轨，在地面运行可以节省空调的电力，还可以节省照明和自动扶梯等设备的用电。

地铁的很多社会效益实际上没有办法准确计算。但是地铁建设应该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能地上的不要地下，能地面的不要高架。

最近沈阳修了近60公里有轨电车，只花了一年半时间，投资是58个亿，平均一公里不到1亿，又便宜又快。地铁里面的关键问题是换乘，乘客一般会花很多时间换乘，上下扶梯、走站台等等非常费劲，但是有轨电车的站台就非常简单，又省电又方便。所以从规划开始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设。

政府修地铁的钱应该补助医疗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社会效益没法准确计算，但轨道交通还是有经济账可以算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施仲衡：轨道交通投资太大，近期效益就是个难题，要想办法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效益。地铁一公里投资达到6亿到8亿，这些资金里面包括30%到40%的城市资金，还有约70%的贷款。贷款就有6%以上的利息。

现在一些市长只知道要快修地铁，但是不管还

开开制图

贷款的问题。一方面贷款要还本付息，另一方面还有折旧问题，还有土建费用、车的费用等。现在修地铁的钱，要子孙去还，代价是非常大的，钱早晚还是从老百姓的税收里面拿。

深圳就提出以后的四号线、六号线和八号线都不要市政府的一分钱，自负盈亏。这样市民没有更大负担，财政的钱可以用到其他民生领域。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医疗的经费都很少。

前些日子看新闻，说北京财政对公交补贴达到 180 亿，费用高得吓人，相当于对医疗的补助。我去核实了，地铁亏损 18 个亿，其余部分是对公交的补贴。现在很多公交车是跑空车，这里面政府补贴得太多了，这些费用应该投入到教育等民生领域。

地铁应该降低投入、提高效益、开源节支、减少建设费用，充分利用沿线的土地价值。现在香港已经做到了，深圳也在做这个工作。比如深圳的三号线是高架线路，耗电量低，去年实现盈利 4000 万元。建设地铁一方面解决拥堵问题，同时还要减少人民的负担。

地铁的节能也非常重要。供电部门给我讲，20 公里地铁线路一年耗电达到 1 亿度。北京市规划将来达到 660 公里地铁线路，耗电总量太大了。

我们的电力是怎么来的？多数靠烧煤。

在地铁耗电量方面，现在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牵引用电上的节能减排措施，地铁牵引用电大约占总用电的 50%。

如何节省用电，目前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比如原来地铁用电是 750 伏电压、三轨供电，后来变成 1500 伏电压，这样电压加大、电流量减少，总体耗电量减少。比如广州地铁四号线和深圳地铁三号线，大概节能 20%。

在深圳，目前正在进行三个课题研究，包括用更高的 3000 伏电压以及车辆灵活编组试验。现在是高峰时间行车密度高、低峰时间行车密度低。如果行车密度不降低，行车间隔时间不拉长的话，减少编组也能实现节省用电的问题。现在高峰时间两分钟一班车，在低峰时间同样不能让乘客等待时间过长，可以在低峰时间减少车辆的编组，比如把 8 级编组变成 4 级编组。目前深圳正在进行这个研究。

还有车辆编组、车辆自动化、信号系统以及自动控制系统等方面。目前北京有一条线路正在进行研究，希望能从信号系统等方面实现节电。另外深圳地铁研究的第三个课题，就是牵引制动的节能减排问题。车辆在制动的时候同样可以节省电能，比如在行车密度大的时候，把制动的能量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

但讲技术推广还是很难的。比如 750 伏电压变成 1500 伏，就受到一些专家的抵制。我们组织了 15 位供电方面的专家，在广州开会研究、又在深圳开会，最后一致认为没有不安全的问题。

另外一个耗电大户是空调。早先就提出加装屏蔽门，比如上海的一号线，在 1987 年就有专家提出安装屏蔽门。包括北京的地铁，虽然现在基本都加装了屏蔽门，但是大家对屏蔽门的认识仍然不一致。在南方屏蔽门可以节省电力，但是在黄河以北这个就不一定能起到好的作用。

最初北京地铁是学习苏联建设的，并没有安装屏蔽门。后来有人跳下去自杀，北京地铁也陆续加装了屏蔽门。但是安装屏蔽门之后会影响到行车的密度和时间。现在屏蔽门是新的还好，等使用年限加长，那么多屏蔽门就可能出现故障，一旦一扇门出现故障，就会影响到整个列车的运行。

链接

2013 年实际新增 2 个运营城市、16 条运营线路、395 公里运营里程。在 2539 公里运营里程中，地铁 2074 公里，占总里程的 81.7%；轻轨 192 公里，占总里程的 7.6%；单轨 75 公里，占总里程的 3.0%；现代有轨电车 100 公里，占总里程的 3.9%；磁浮交通 30 公里，占总里程的 1.2%；市域快轨 67 公里，占总里程的 2.6%。













2013 年末，中国累计有 19 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 87 条，运营里程 2539 公里

城市领导者

王勇：三亚的房地产正在转型

我们2014年的供地，主要倾向产业，把地产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如果是纯商品房，我们供地的范围、条件，门槛就要高一点，如果把它和产业结合，政策就更宽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傅勇涛 | 北京报道

57岁的山东阳谷人王勇，担任三亚市长已有5年。

在2014年两会现场，面对一拨又一拨媒体记者，王勇一直笑容可掬，彬彬有礼，滔滔不绝。不管是"正面"问题，还是"负面"问题，他都坦然应答。

王勇来自中国最南边的浪漫之城三亚，这是一座一到冬天就人气爆棚并且每每成为舆论焦点的新兴城市。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雾霾压境的趋势下，三亚的清新空气和阳光沙滩更成为人心所向的宝贵资源。

在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和"离岛免税"等政策的推动下，三亚的游客人数在5年内增长了一倍，房地产高温不退，房价直逼北上广，机遇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个城市的进步，需要找短板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春节，不少关于三亚旅游业的负面消息引发关注和议论。你在去年两会上，表示要不惜牺牲财政收入来整治三亚的旅游业。现在看来收效如何？今年春节，从铁路和航空的数据看，三亚似乎更火爆了，原因是什么？

王勇：整治的效果大家自己能看到。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想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太现实。对三亚，大家爱之切，关注也切。作为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在社会上引起这么高的关注度，我们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有压力。每年出现这么多负面报道和评价，都是我们改进的动力。

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自己找问题。首先是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开展民生体验活动，自己主动找问题。然后通过政府12345热线广泛征集大家的反映、投诉、批评建议。2013年国庆黄金周，各部门找出来60个问题，我们当时就提出：整改60个问题，迎接春节黄金周。把这些问题整改了，使得春节黄金周能让市民满意，让游客满意。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现在我们又在找春节期间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倒逼机制。一个人的进步，需要找缺点；一个城市的进步，需要找问题。我们有个短板理念：一座城市好不好，不在于你的长处，而在于你的短处。我们自己感觉有所进步，但不敢说这些问题不会反弹，不会有新问题。有问题我们再找，再整改。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是基于三亚自身的特点。三亚的历史太短，才20多年历史。我山东老家那个县城，隋朝就是县城。成都的记者昨天问我，三亚和成都比怎么样？我说这个没法比，除了海洋与内陆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成都的历史悠久。成都的管理，成都的人文条件，成熟的过程早就已经走过了，但是三亚现在才开始走。

我们一方面积极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建议、批评，另一方面也在争取，别人用十年走过的路，我们能不能用三五年完成。

除了压力之外，还有一种鼓励，那就是每年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这说明什么？自然条件仅仅是一个方面，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理念是一个方面，而这座城市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三亚在成长变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在哪里？

王勇：三亚的硬件配置、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能那么快。我们的服务、管理，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能适应。

我对三亚的理解是，游客数量的增长，和游客对服务要求的提升，这两个方面，与我们每年所提供的这种有限满足之间的矛盾，还在加剧。因为需求增长得太多，是25%到30%的增长，而我们的满足能力是10%的增长。

今年春节黄金周，交通承载力超限。我听人说起，有人有急事离岛，但出不来。说"你只要能让我离开海南，你让我飞到乌鲁木齐去，我再回北京都行"。有几天，过海都难。

像这样的情况，游客就不满意，就要宣泄，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很大的点击量，对三亚的

CFP

影响就会很大。

三亚是一座刚刚发展起来的旅游城市，从2008年到现在，游客增长了一倍：2008年是600万游客，2013年是1228万。基础设施能翻番吗？服务人员能翻番吗？服务市场的管理，包括本地人员的条件、政府的管理水平，不能一下子就跟上。

就像我常说的，我家只有招待两桌客人的能力，来了10桌客人，来都来了，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还得尽可能招待着、照顾着。我辛苦一点儿也想把他们照顾好。但是无论怎样，两桌的条件，也招呼不了10桌的客人。九寨沟去年是这样，三亚的冬天也是这样。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怎么客观地看待这个城市很重要。这两年，大多数游客和媒体朋友对三亚的理解和包容更多了，极个别的媒体还一直盯着。

违章建筑一年拆除100多万平方米

《瞭望东方周刊》：“国际旅游岛”概念提出后，三亚曾出现房地产的膨胀以及大量的违规建筑。现在治理情况怎样？我们在三亚看到有大面积容积率很高但是又并不整齐的建筑群，会不会给城市留下后遗症？

王勇：你说的是旧城改造片区，新的片区我们规划是很好的。旧城改造有很多客观因素，要改造旧城，政府就要和原住户之间博弈，他跟你要的不是1：1换，可能是1：1.2，再加上开发商的利润，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把容积率提高了。我们现在旧城改造为什么慢，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要政府投入更多来补偿这部分需求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财力。我们一年才几十个亿的财政收入。政府卖地的钱主要是给老百姓做补偿，除了正常的补偿之外，我们还给老百姓建了风情小镇，投入也非常大。

新片区，比如亚龙湾、海棠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比较规范。

还有就是违章建筑，因为三亚的房价太高，有的人就铤而走险。违章建筑，我们现在一年的拆除量是100多万平方米，但还是打不过来，打不胜打。

像海航在机场净空区内建超高的唐拉雅秀酒店，我们一直在管，到现在还在给其下发通知，做工作，让其自己拆。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在三亚的崖城等地看到，有大面积的违规建筑拖了很多年都还没有拆除，像南滨花园、南山花园、椰岛阳光花园等等。现在大量地住进了“候鸟”型的越冬老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王勇：那个地方，省里已经作为一个案子，抓了好多人，有些是处级干部、农场场长。案子正在办，还没有结案。这个怎么处理，我们要根据省里的要求再做。

政府一直在强调不允许这些问题出现，利益驱动下，却总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一方面我们出台有关规定，另一方面通过打击来威慑。我们还提醒人们不要购买这种没有产权的房子，春节期间集中宣传这个事。

违规建筑，土地证都没有，买那儿的房子就是图便宜，几千元一平方米，但是基本权益都保障不了。比如你是哈尔滨的，你冬天在这儿住，夏天回去，我们打击违法建筑，就给你拆了，你冬天再来，这个房子就没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传，千万不要买那种没有产权的房子，你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产业转型从供地开始

《瞭望东方周刊》：三亚要打造“宜业宜居”的生态城市，除了发展旅游，还要“宜”什么样的“业”？

王勇：这就是我想说的——三亚的房地产正在转型，正在转向金融、会展、总部经济、文化创意、智慧产业等等。我们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住宅开发增长6%，旅游增长34%，基础设施增长30%，社会事业增长27%，高新技术产业增长267%——这些你就能看出来我们的转变。

这个转变从供地开始。我们2014年的供地，主要倾向产业，把地产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如果是纯商品房，我们供地的范围、条件，门槛就要高一点，如果把它和产业结合，政策就更宽松。

我们希望三亚的地产能够和产业结合，吸引更多的人来三亚工作，边工作边享受三亚的自然条件——阳光，空气。如果设总部达到一定条件，高管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可以给予50%到70%的奖励，用于在三亚买房子。

我们用这种方式吸引人才，吸引更多的机构，这样，房子就不会一直空在那里。这些人一方面是引进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消费群体。

最终，三亚的消费群由三部分人来构成：三亚本地人，游客，三亚新居民。三亚新居民，是通过三亚提供的优惠政策，吸引而来的产业从业人员。

慢慢地，三亚将用消费来支撑这个城市的经济。三亚的资源是有限的，必须转型。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转，所以叫“宜业宜居。”东


王勇



2014年1月30日，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为西沙赵述岛守岛渔民和民兵送上蔬菜等慰问品

城市领导者

肖杰：三沙建设一天都不耽搁

三沙建设连着国家的大局，必须成功，不能失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傅勇涛、刘伊曼 | 北京报道

肖杰，1960年生，广东雷州人，2012年7月24日当选首任中共三沙市委书记、市长。

“中国最年轻地级市”的市长肖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从遥远的三沙赴北京参会，抵达驻地后，一直被记者们围追堵截。

三沙市位于中国南海，是中国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为海南省第三个地级市，下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涉及岛屿面积13平方千米，海域面积260多万平方千米，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总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市。

3月8日，肖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介绍这座海岛城市的变迁。

海上维权执法可圈可点

《瞭望东方周刊》：三沙市成立以来，政权建设备受关注，你提出：三沙建设速度在加快，将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2013

年三沙政权建设是如何顺利推进的？

肖杰：过去一年，三沙市大力加强政权建设，行政管控能力范围有效拓展。依法建立完善了保证市级政权正常运作的20个行政机构，建立了党委议事与工作规则等53项确保政权运转的规章制度。我们建立了永乐群岛工作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包括5个党总支在内的33个基层党组织。建立了美济、银屿、北岛三个居民委员会，完成了8个居委会换届工作，第一次颁发三沙居民身份证和三沙居住证。

三沙市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放在突出位置，开展军警民海上联合执法，依法加强海上综合管控。我们实现了综合执法船永乐群岛巡航执法常态化，成立了西沙群岛军警民海上联防协调中心，建立了军警民联防管控机制，初步建成军警民联防体系。建立了海上执法协管员和海上民兵连队伍，海上维权执法能力明显提升。

在我看来，去年海上执法情况也是可圈可点。2013年渔政船共出航83次，其中巡航58次，出海225天，航程13565海里，登临检查渔船65艘次，查处国内外渔船14艘，驱赶外籍渔船45艘。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去过三沙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请你介绍一下去年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从海口至永兴岛的船舶输送能力有提高吗？军民往返海口还顺畅吗？

肖杰：一年来，三沙居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重点基础设施完善，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就在接受采访前，我们刚刚结束码头、岛际快艇停靠点等一些重点项目建设的论证会议。从目前看，永兴综合码头一期水工工程、"甘泉岛"号岛际交通船、三沙文物保护修复工程、赵述岛海防路、赵述岛海岛修复保护工程一期水下人工礁体工程等5个项目已竣工并投入使用。

在三沙市政府的驻地，永兴岛的基础设施变化也是最为显著的。公用住房封顶，永兴污水处理、西沙垃圾收集转运项目部分投入使用。永兴机场军民合用改扩建、晋卿岛综合补给基地、永兴综合码头服务设施项目、北礁生态保护站、赵述岛码头等一批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我认为，往来海口至永兴岛的补给也是去年基础设施增强的一个亮点。最新的情况是，万吨级"三沙1号"交通补给船入坞建造，永兴岛海水淡化及配套管网工程，宣德路、双拥路改造工程正在实施。污水垃圾处理主厂区已开工，永兴综合码头二期及陆域配套、文昌清澜交通补给码头即将动工。

三沙广播电视实现"村村通"、"户户通"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三沙变化最大还是民生。对于四面环海、远离大陆的三沙居民来说，喝上干净水、吃上新鲜菜，曾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三沙市一些海岛上的居民生活情况怎么样？

肖杰：如果你有机会实地走走看看，你会发觉三沙之大、之遥远、之艰苦，没有来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三沙市委、市政府的驻地在西沙永兴岛，这个2.13平方公里的海岛没有淡水，生活物资全靠补给船运送，交通运输、生活后勤保障是软肋。我曾六上赵述岛，亲身感受群众的艰难。那里房屋简陋，物资匮乏，文化生活单调，交通不便利、群众就医十分困难。

三沙市成立一年，变化最大的是民生。2013年，运送上岛的淡水2万余吨，海水淡化5万余吨，分别比上年提高6倍和3倍，基本解决了岛上居民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

海口往返永兴岛的补给船一周四次往返，三沙和大家的距离近了。"琼沙3号"、椰香公主号等交通补给船航行90航次，加上政务包机，运送海南至永兴岛军民4.8万人次，粮食蔬菜近9000吨，极大改善了岛上的物资补给。

如今，三沙市已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60多套卫视节目和四五个广播频率供渔民们选择。今年春节，永兴岛、赵述岛等海岛上的居民，都能看到直播春晚。

三沙市人民医院、休闲健身广场、海洋浴场建成投入使用，永兴岛公务人员实现办公区与住宿分离……对于四面环海、远离大陆的海岛，每一丁点的变化都来之不易，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与汗水。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西沙归来不看海。西沙邮轮旅游从2013年4月28日开通运营之后，情况怎么样？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令许多人向往的西沙邮轮旅游吗？

肖杰：西沙邮轮旅游目前已经运营14个航次，接待游客2000余人，实现了常态化运营。今年西沙旅游将再次扩大范围，增加旅游产品。游客乘坐"椰香公主号"邮轮，经海口－北礁－西沙永乐群岛，抵达西沙海域。目前西沙邮轮旅游的价格在4000元至9000元之间。

2014年，我们准备考虑扩大西沙旅游的覆盖面，提高旅游品质，增加旅游产品。比如策划更多的海上旅游项目和产品，西沙海洋博物馆、海底文物等文化产品都将是值得期待的旅游产品。

保护生态环境对于西沙旅游十分重要。邮轮将生活垃圾带回，缓解岛礁环保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在岛礁上建设更多的住宿、餐饮等设施。



2014年1月12日，俯瞰永兴岛

计划进一步开发西沙海域的晋卿岛，游客可以乘坐游艇上岛，在银白色的沙滩上捡贝壳、钓鱼、晒日光浴。邮轮受海况、风浪影响较大，颠簸性强，供给游客的食品和娱乐项目今年也要强化。

保护生态环境对于西沙旅游十分重要。邮轮将生活垃圾带回，缓解岛礁环保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在岛礁上建设更多的住宿、餐饮等设施。

其实，除了西沙邮轮旅游，三沙还准备开发其他旅游线路，例如，三沙有维权文化、海洋文化，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沙甘泉岛唐宋居住遗址、海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礁古代沉船遗址，这些景点都可以使旅游产品更丰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西沙旅游。

第一批税收263万元

《瞭望东方周刊》：三沙建设的速度全面加快，西沙远离陆地，海洋资源环境十分优越，如何处理好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肖杰：一年多的建设充分证明，三沙的建设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是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对每个项目都实行严格的环评制度，经常开展生态环保巡护执法，2013 年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巡护 28 次。

我们建立起永兴岛现代化环卫站，实现永兴岛环卫工作常态化管理，永兴、赵述、晋卿、鸭公、银屿等岛礁利用太阳能发电入户。三沙市还组织岛上的居民开展“绿化宝岛”植树活动，在鸭公、赵述等岛植树 3500 多棵；赵述岛 400 米水下人工礁体工程完工，实施了 4 次渔业增殖放流活动。海域动态监管系统已经建成，永兴日产 1000 吨海水淡化厂即将安装建设。可以说，三沙的天更蓝、海更清、岛更绿了。

《瞭望东方周刊》：2014 年三沙建设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发展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的着力点在哪里？

肖杰：今年，三沙还将持续改善民生条件，提高驻岛军民的幸福指数，特别是加快岛际交通建设，完成渔民住房、海水淡化、太阳能发电、污水垃圾处理等项目建设，形成岛际医疗急救系统，丰富军警民文化生活。

三沙将更加不遗余力地保护生态环境，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体系，保持独特、优美的生态环境。力争实现海水淡化设施全面覆盖有居民岛礁，2015 年永兴岛不再提取地下水。

今年前两个月，三沙的建设稳步推进。独立光伏智能微电网项目建成发电、永兴居委会大楼封顶、军民共建保鲜库开工建设、永兴学校项目初设通过评审、甘泉岛海洋动植物保护站和文物保护站已经成立。

三沙还将在发展特色经济上加强谋划，发展特色产业，拓展三沙品牌。三沙已登记注册科技、金融、服务和渔业公司等多领域的企业 37 家，他们在改善军地条件、保障三沙民生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三沙有了第一批税收 263 万元，实现了实体经济的一个突破。

三沙市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战略地位，决定了经营企业的特殊性，因而，对企业的准入要有重点、有选择。我们要立足实际，着力开发海水养殖与远洋捕捞业、高端旅游业、油气开发、运输服务业等三沙特色品牌产品，逐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为三沙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在三沙工作以来，你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肖杰：我这个市长，主要就是管老百姓生活中的那些事，包括一滴水、一餐菜。三沙的建设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必须认真为老百姓服务，真情投入。如果干不好，老百姓就该把我丢到海里去了。

上任以来，我乘船走了西沙的 20 余个岛礁，空中巡航了西沙、中沙群岛，还记得是 2012 年 12 月去南沙调研，冒着大风浪和台风，在海上漂了 10 天，登上了南沙永暑岛、美济礁等，慰问了不少渔民。脸晒得乌黑，身上脱了一层皮。

担任三沙市委、市政府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一方面我感觉很幸运、很特别，因为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很有压力，因为三沙建设连着国家的大局，必须成功，不能失败。

三沙有美丽的风光，在三沙建设中，我喜欢用“志存高远”这个词，三沙的建设是以天来算的，一天都不耽误，今后仍要步步为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是做好三沙工作的重要品格，对于我来说，是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前进的强大动力。

破题“富不过三代”靠现代企业制度

主动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于国、于民、于企业、于自己，都是大好事

文 | 东仁

“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可打破民企‘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全国政协委员、毅德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再兴，在政协全国十二届二次会议工商界联组3月7日举行的开放日上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委员的普遍赞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也培养了一批拥有一定数量财富的企业家。但在中国历史上，“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总是伴随着中国人财富的传承，千年史中富人的踪迹总是昙花一现，代际传承成为遗憾。

民营企业中90%以上都是以家族控股或家族控制形态存在的家族企业。与这些企业一样，王再兴的10个兄弟和1个妹妹，都在这个商贸物流集团里面。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想再提升时，家族企业的弊病成了“拦路虎”。

“家族成员之间理念不一致，靠人治，缺乏战略思维；决策程序混乱，创新发展难；规模小，经营分散，资金结构不紧密，投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企业组织机制混乱，人才引进难、团队建设难、制度执行难；选企业接班人难。”王再兴说，这些问题让企业走到了“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只能改制”。

2011年，在全国工商联的帮助支持下，毅德集团成功改制，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王再兴担任董事局主席，公开招聘6个副总裁，兄弟和侄子都不进董事会。企业行政、资金、产品研发、工程、招标采购、项目拓展、营销等各大系统告别“人治”，逐渐走向正规化、流程化，并于2013年10月31日在香港主板上市。

“改制3年来，企业发展效果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投资开发项目的规模、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都远远超过了改制前的16年。”王再兴说，3年来集团已在8个省开发了10个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约2778万平方米，辐射一半以上国土面积，成为中国领先的商贸物流开发商和运营商。

王再兴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发挥工商联作用，像全国工商联帮助、引导、培养毅德控股集团一样，促进全国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市场准入、教训考察、参与国企重组等方面给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民企更大的政策倾斜和鼓励，让他们参与到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来。

王凤英：关注诚信体系和新型城镇化汽车社会配套建设

随着汽车市场在中小城市乃至城镇的爆发式增长，进入全面的汽车社会已成为大势所趋，但目前相应的社会体系配套建设并不完善，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环保压力、能源紧张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顽疾，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新的课题。此外，近年来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对外形象和软实力。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两份议案，呼吁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汽车社会配套体系规划，以及倡导诚信，加快社会信用体系配套法制建设。

王凤英代表在今年的议案中提出四点建议：一、建议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提前做好功能区域规划；二、建议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提前做好路网规划、注重交通管理；三、建议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完善道路停车设施规划；四、建议完善新型城镇化的汽车配套服务体系规划与建设。

希望政府能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前做好系统配套建设的规划、政策和管理上的准备，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既要有科学预见，又要充分考虑现实的可能性，使规划尽量切合实际，与新城镇建设的发展相适应，真正为广大居民带来福祉。





全面深化改革对当前的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为2014年3月1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两会推动密集修法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3月9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向大会报告工作。

过去一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因此，编制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本届任期内立法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落实措施，成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的重要工作内容。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全面深化改革对当前的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改革需先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总结道，在过去一年，常委会审议了15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了其中的10件；涉及修改21部法律，新制定2部法律。

其中，两部新法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修改的21部法律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文物保护法》、《公司法》等。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表决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以及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颇受舆论关注的两项。张德江说，在国务院提出相关议案后，常委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明确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通过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提出，修法工作如何同步进行，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

2013年11月20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一周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即呼吁，要推动立法机关根据这次全会决定，对已有的法律进行一次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理出来，通过修法，尽快给予修订，尽快废止一部分条款。

2014年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任吴晓灵公开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涉及诸多利益调整，必须修法，将利益调整纳入法制的轨道。有立法立规、有问责、有处罚、有司法公正，改革才能够贯彻落实。“在法制框架内推动社会前进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是改革的最佳路径。改革者要做法治中国的建设者。”

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在总结过去一年的立法工作时，花了相当篇幅论述立法工作与改革的关系。除了立法工作，全国人大还通过相关决定、决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创新对外开放模式，改革工商登记制度。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也就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发表看法。他说要处理好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的关系，把深化改革同完善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先立法、后行动，在改革过程当中要处理好，要做好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不得试点。”

环保法会改什么

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阚珂在介绍了今年的立法重点任务时，特别提到几部法律，包括修改预算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修改安全生产法和食品安全法。

这其中，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尤为受到关注。

在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中，张德江对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环境方面的工作单独作了阐述，其中提到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两次审议。

至此，于1979年试行、1989年正式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已历经三次审议。今年再审议，将是第四次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3月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这一数字：“通常一部法律三审通过了就可以付诸表决了。但是这部法律又增加了审议，就是为了更好地吸纳社会的才智、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关切。希望能够切实制定出一部高质量、管用的新环保法。”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陆浩在10日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接受媒体采访称：“草案已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我们建议新环境保护法能尽早完善并出台，目前看今年推出的概率较大。”

对于新环保法的方向，张德江在报告中进行了宏观描述：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管理过程控制，强化污染物排放行为监管，加大违法行为惩治力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突出问题，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目前的修改方案，在多个问题上回应了舆论对旧法的批评。这其中，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违法成本过低两个方面，均是修改的重要内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介绍，修改后的法律明确了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在法律中还强化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规定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负责人要引咎辞职。

对于环境保护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新法提出对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的人员可以进行拘留。对未批先建的行为也作了针对性的规定。对环境评价机构等作出的虚假评价，可以追究其连带民事责任，并且赋予环保机构对污染物排放设备的查封权和扣押权。

预算法修改是否结果

另外两部法律的修改，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环境保护法。

其一是24年来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于1990年10月1日，近年来因为行政诉讼法院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早已引起舆论修法的呼声。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提到，读完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几乎所有类型案件的审结数量都上升了，只有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除外。

常年致力于研究行政诉讼法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目前信访而不信法，反映了当前通过人治而非法治方式解决争议的现状。

预算法的修改是近年来舆论讨论最多的法律之一。

现行预算法实施于1995年，1997年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动议，参与修订的学者李炜光曾向媒体透露，此稿修改力度最大，最终搁置。

2004年全国人大启动修订工作，但历经第十届、第十一届两届人大，两度成立起草小组，直到2011年底，修正草案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2年6月提交二审。

2012年8月，修正草案二稿征求网友意见时，共收到超过32万条意见，成为开门修法收到意见最多的草案，足见其争议。

同行政诉讼法一样，被称为“经济宪法”的预算法具有象征性意义。这一被视为预防腐败、解决三公问题的利器，对于实现法治，约束公权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德江在提到未来一年的具体立法工作时，首先便提到修改预算法。他说，将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精神，修改预算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关于预算法修订的问题并没有超出这一内容的具体表述。

不过，在具体的预算监督执行方面，全国人大有了新的尝试。例如，张德江提到，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关于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重点就某一具体领域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开展监督，这在常委会监督工作中还是第一次，是对深化财政预算监督的有益尝试。



2013年10月29日，广西柳州市鱼马公园，几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观看城市全景

人大代表说“人”的城镇化

南京学生想到这所“村”里学校上学，只能算借读，不仅名额有限，还要缴纳费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曾预期，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30年将达到70%，届时，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将达到75%。2014年两会期间，城镇化成为代表们最为热议的话题。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也预测，“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

然而，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城镇化如何释放扩大内需的潜力。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如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宿迁市委书记蓝绍敏、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淮安市市长曲福田、南京市高淳区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以江苏为样本的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因何受困

城镇化的本质可以看做是改革旧有的“人地”关系。农村土地流转集中，打破原有分散经营的农耕方式，机械化设施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业规模、产值，节余出大量的劳力。“人”的过剩，则通过合村并居、新建城镇集中安置。同时，村庄合并节余出的土地通过指标置换，又能为各级政府带来滚滚财源。

这是一次对农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

当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之时，人们谈论着如何刺激内需、保持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憧憬着万亿投资商机的开启、各相关产业的繁荣前景。在这场关乎“三农”的大变革中，作为被改革的主体，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呼声却难得听闻。

曲福田说，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与矛盾。“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6亿进城农民工尚未市民化，亟待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城融合度不高，不少地区出现“空城”现象，城镇化面临产业“空心化”难题，亟待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互动。“城市病”日趋严重，需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形态。城乡二元体制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武继军认为，“洗脚进城”的城镇化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失地农民进城后，虽有居住和养老的基本保障，但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没了生活来源，长此以往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向大中城市转移，而是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步转化为新城镇，实现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

社区化，让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是确保了转移过程中农民的最大利益。

周岚说，受城乡二元结构与重城轻乡传统思维影响，过去城乡建设的重心在城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法律法规更健全，而乡村地区的专门法规仅有国务院1993年颁布施行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又明确将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排除在管理范围之外。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缺乏足够法律保障支撑。

创新在产城融合与城乡统筹

中国城镇化改革的试点，最初基本是自上而下地推动，整体路径往往如出一辙，即“土地集中＋人口集中”。在此种整体路径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尝试转换思维模式，通过地方性政策尝试更多考虑民众的现实需求与利益。

淮安市处于苏北腹地，周边缺少大城市和经济增长极，淮安人均GDP刚过7200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基础还不强，还不能形成足够的产业辐射、支撑城镇化发展。

对于淮安市市长曲福田而言，淮安市城镇化的主要经验就是：近年来大力推进产城融合，立足地方实际，在多个维度探索创新。

曲福田认为，淮安小城镇与苏南相比小而分散，大多仍处于极核发育阶段，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发展存在失衡现象，城镇化支撑力不够。淮安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关键举措，以县域经济的提档升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淮安实行的“飞地经济”政策，引导各县区重点打造一批百亿元级特色产业基地，金湖石油钻采、盱眙钢管轴承、涟水食品酿造、洪泽盐化工等一批特色产业集聚集群目前已经显现效应。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淮安农用地占比、基本农田保护率分别高达66.2%和86.5%，同时水域面积占市域总面积的25%左右，生态环境敏感性较强，可开发后备资源不足。因此，集约集聚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更显重要。

对于宿迁市市委书记蓝绍敏来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宿迁的“一轴两副九市”城镇发展战略，通过建设九个小城市，“真正把城市布到农村、布到农民身边”。

蓝绍敏介绍说，宿迁跳出过去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思路，九个小城市，形成分层拉动、梯度带动、互促互动的格局，让农民身边有城乡统筹的辐射源、带动源、吸引源。

宿迁还建立了有利于城乡统筹的要素配置机制，明确县（区）财政每年对镇村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逐年提高到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0%以上，土地出让收益中用于“三农”的支出不得低于40%，用于拆旧区农村居民安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指标不得低于省下达挂钩指标总规模的30%。从制度层面上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武家嘴村如何实现“洗脚上楼”

今日江苏高淳县武家嘴村的村民都住进了别墅或公寓楼，喝自来水、用管道天然气，居住区有下水管道，村里参照城市模式创建学校、文化中心等公共设施。

上述这一切的基础来自近年来武家嘴村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做大船舶制造、水运、现代农业服务业，2013年，武家嘴村实现生产总值35.7亿元，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9.9万元。

武继军说，在就地城镇化方面，除了“硬件”，武家嘴村不断做优“软件”，九年制全免费的武家嘴实验学校，已经成为高淳区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之一。高淳区，甚至南京市很多学生想到这所学校上学，那只能算“借读”，不仅名额有限，还要缴纳费用。

武家嘴村还引导村民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以多种形式参股村集体企业，提高村民的民主管理参与度和资产性收入。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变市民的实际含金量。武家嘴村除村民新农保、新农合费用全部由村集体承担外，还建立了村民养老补助制度，60岁以上就可以领取，90岁以上老人每月补助800元。看病就医的费用，村里按照“医保报多少，村里就报多少”的政策直接兑现，村民看病的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

呼吁顶层设计，立法加强乡村建设管理

以牺牲环境和社会公平为代价换取发展速度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势在必行。

事实上，从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中国就释放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明确信号。这种转型将以何种路径实现，代表们对顶层设计充满期待。

周岚认为，立法加强乡村建设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国家对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的要求更加明晰。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科学引导村庄演变发展：“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做到规划先行”。

另一方面，近年来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在乡村规划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文化和特色景观保护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地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乡村建设经验和实践成果，具备了立法的必要基础。

曲福田提出，要找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结合点。地方层面，应支持基层实践创新，在户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武继军认为，必须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在保护耕地和保护农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对进镇落户的农民，可根据本人意愿，允许其依法有偿转让；处理好小城镇建设合理用地与严格保护耕地的关系，引导农民宅基地的有序流转，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盘活存量土地，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2013年1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东崇前学区6所小学的一年级小学生，在崇文小学体育馆开始本学期期末考试。本次期末考场变身游乐场，以“闯关”的形式，完成期末“乐考”

“乐考”的配套工程

“目的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都能自信地在同学面前露一手，”刘永胜回忆道，“结果当年的《北京晚报》就做了个新闻：《翻个跟头就是期末考试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 | 北京报道

2014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的几千名低年级小学生，没有了期末考试。

看起来像游戏——名为“乐考”的考察方式替代了卷面上醒目的分数。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如果它是一件好事，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形式，为何在1993年提出后的20年里，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所有小学的共同选择?

至少有家长不这么认为：我家的孩子不考试了，那小升初、初升高乃至高考，能比得过一路考试的孩子吗?

“说起减负，我们学校完全能减，真正减不下来的是家长。”北京育才学校校长田国丽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当然，问题恐怕不只在家长。除了统一性的改革布局，老师呢？校长呢？他们都会像孩子们这样，可以轻松地迎接新的观察方式吗?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法，将在基础教育领域着力推进评价制度改革：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除了期末考试，这种改革还要改什么?

改革的机会

2013年12月27日，距小学期末考试仅有十天。下班后，北京育才学校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教师们紧张忙碌着，以应对前几天刚刚下发的“紧急通知”：小学一年级取消期末考试!

这让育才学校一年级组长刘春香猝不及防。

通过教研室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以游戏代替期末考的方案逐渐成形，让她如释重负。

2014年1月7日，这个学校一年级的孩子们手持一张写满项目的体验卡来到体育场，参加“抽签背唐诗，英语情景对话，才艺展示”这种特殊的期末考试。

家长组成的评委团会给通过考验的孩子们的卡片上贴上小星星，每项活动3颗星最高分，61颗满分。

“所有的游戏考查了学生在一年级各科成绩、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田国丽说，“除了希望他们把这学期的知识点运用到生活当中，更希望他们在小学阶段对学习产生兴趣。”

西城区取消低年级考试的这一举措，是对北京市8条措施落实学生“减负”政策的积极回应。据媒体报道，从2014年起，北京市将推进小学一二年级取消期末考试。

取消低年级孩子期末考试的做法在北京并非首次。早在1993年，光明小学就已经开了考试变游戏的先河——“乐考”，并使其成为一种常规化的考核手段。

在2014学年的光明小学考场，孩子们

CFP

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从红黄绿三种颜色试卷中选择内容适合自己的试卷，进行笔答。

下午，实践性的“乐考”环节以游戏式答题为主，遇到难题，同学们会帮助、家长也会引导孩子们再给一次机会。但所有人都能得到“三朵小红花的快乐”，成绩差异大大被弱化。

“乐考”结束后，孩子们还要准备一份《学生成长报告》，从身心健康、生活自理、人际交往、学业成就四个方面审视自我，达到检视优缺点、系统训练思维的目的。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正式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自此，素质教育的车轮滚滚向前。同年，时任光明小学校长刘永胜首次提出以“乐教、乐学、乐考”来推动小学低年级期末考试改革。

刘永胜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1993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幼小衔接的课题，发现刚上一年级的孩子之前一直以玩为主，猛然间进入学习环境，有一个心理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老师应给予孩子们支持性帮助。”

美国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演变，一年级孩子进入了第四个“勤奋对自卑的冲突”的童年阶段，若此时能顺利地完成学习课程，就会获得勤奋感，在今后承担任务的过程中充满信心。反之就会自卑。

“有些学校认为90分以下就不及格，对儿童成长极其不利。”刘永胜说。1993年也是国家第七次课程改革的起始之年，“倡导更好地研究学习评价方式，素质教育也提出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乐考”开始后，刘永胜主要在“模糊学生对考试的概念”上下功夫。当时的“乐考”和2014年相比较为简单：主要在一二年级取消分数，期末考试用“很好”、“可以”、“再努力”进行个性化的评价。

如果学生对成绩不满意，可以当场再考。而在其他年级进行“分项考核，综合评价”的尝试，还增设了语文、算术考试后的“我能行”展示，使考试成为帮助体验成功的手段。

这便是当年“乐考”的雏形。

外界的声音

如果说仅仅是将考试改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欢笑热闹过后一切照旧，那这种考试改革显然会面临是否有价值的质疑。

光明小学的想法是，希望将“乐考”作为一种评价手段有机融入学校的整体，体现其办学理念及育人目标。

刘永胜在1996年系统地形成了光明小学“我能行”的教育理念，迄今仍在光明小学贯彻。

“我能行”的八句话理念如今已经被写入人教第七版政治课第二课的课文《关于自信》中：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新才最行。

“我能行”与“乐考”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创新的理念和举措，可想而知20年前这项改革对人们的冲击。

当时，一年级期末考试有个才艺展示环节，会什么展示什么，什么都不会可以前滚翻后滚翻。

“目的就是想让每个学生都能自信地在同学面前露一手，”刘永胜回忆道，“结果当年的《北京晚报》就做了个新闻：《翻个跟头就是期末考试了？》”

有一年全区小升初数学统考，光明小学比另一个学校差了零点几分，那个学校对外称该校的数学成绩超过了光明小学。

老师们坐不住了，开会时跟刘永胜提：“咱们是不是先想办法把分数整上去？”刘永胜很淡定：“差个零点几分并不代表什么，素质教育这条路必须坚持！”

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长，他们的普遍想法是“学多了怕孩子累、学少了怕孩子落后”。

刘永胜要求老师们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做法直到今天依然在坚持，包括家长亲子活动、主题家长会等活动，每年都在举办。

目前在群访中可以发现，所有来自一年级的家长近200人，都很支持“乐考”及光明小学的办学理念。数据也显示，这些孩子到高年级后，成绩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非常优异。

但这些家长身边的亲朋好友，对此却颇多顾虑。

有家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作为家委会成员了解‘乐考’，所以考试头两天，我每天都带孩子滑冰唱歌。别的家长一听，你们干嘛？疯了，不复习啊？我媳妇不了解情况，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天天跟女儿说‘怎么还不学习？你赶紧给我做卷子去！’后来发现我们孩子学习也没落下，就跟我说，‘早知道这样就让你们去玩儿去了’。”

“即使是两口子，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也不理解，更何况别人？”这位爸爸说。

保障的机制

孩子们减负了，老师们却不轻松。

一年级英语老师孙辰一，需要教6个班的英语，每天都会根据学生的特点在家校论坛上发布6份完全不同的课堂表现和课后活动，配以照片。

她还需要思考如何让孩子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知识，所以“每天都要熬夜。”

上个学期，她教孩子们制作了几百张英语小卡片，卡片正面是孩子们根据想象力画出的物品，背面写上单词。“老师从来不要求我们孩子背单词，可她都记住了。”有家长说。

北京市没有以成绩为基准的教师考核机制。刘春香告诉本刊，育才学校对于老师的考核，主要看教学质量，并配合学生和家长打分。家长打分主要是师德和教学质量两方面。在家长开放日中，家长可观摩老师的课堂。

这一考核从刘春香进入育才学校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考核后会对老师分A/B/C三个等级，但工资也就差二三百元，所以班级孩子成绩的好坏对教师的影响并不大。

光明小学同时增加了发展性评价、教师互评的机制。每个老师都有一本《教师发展性评价手册》，学年初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评，学年末考察自己的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其结果为本人保密，并且不和奖励直接挂钩。

光明小学副校长徐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教师之所以如此敬业努力，一方面出于教师对学校理念文化的认同，一方面说明教师对自我的成长发展有要求，此外，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开阔眼界。”

一种奖励是，学校曾全力为一个刚入职的年轻教师争取到参加联合国模拟峰会的机会。

而刘永胜也觉得“教育评价改革不仅仅要关注学生的需求和发展，也应关注教师的需求和发展。”

他“从业二十余年，从来没有用考试成绩奖励过一个老师”。乐

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任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男，汉族，1956 年 12 月生，辽宁大连人，1976 年 3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经济师。

1976.03~1978.10 北京市延庆县大柏老公社插队知青；

1978.10~1982.07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金融专业学习；

1982.07~1988.05 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局干部；

1988.05~1994.06 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综合处副处长（1992.03~1992.07 在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国家计委班学习）；

1994.06~1996.10 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综合处处长（1996.01~1996.03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

1996.10~1997.05 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技改处处长；

1997.05~1998.06 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司长；

1998.06~2001.07 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

2001.07~2003.04 国家计委国外资金利用司司长；

2003.04~2004.1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外资金利用司司长；

2004.11~2005.1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助理、党组成员，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5.12~2007.1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7.1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03~ 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姜增伟出任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

男，汉族，1953 年 5 月生，山东龙口人，1968 年 8 月参加工作，197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黑龙江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中国矿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1969.08~1976.10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工；

1976.10~1980.01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生；

1980.01~1982.05 商业部科技司科员；

1982.05~1985.10 商业部副食品局科员、副处长；

1985.10~1988.12 商业部办公厅副处级、正处级秘书；

1988.12~1991.05 中国商业对外贸易公司副总经理；

1991.05~1993.03 中国商业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正司级）；

1993.03~1996.10 国内贸易部消费品流通司司长；

1996.10~1998.05 国内贸易部总经济师兼消费品流通司司长；

1998.05~2000.11 国家国内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司级）；

2000.11~2005.10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

2005.10~ 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2010~ 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2014.03 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

何志敏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男，汉族，1963 年 10 月生，四川省平昌县人，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01~1996.10 毕业于天津大学留校任教，历任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08 获意大利拉奎拉大学和天津大学联合培养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1996.10~1998.06 天津市化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8.06~2000.07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2000.07~2008.08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01.02 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2002.11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2002.12 民进中央常委）；

2005.04~2006.04 挂职北京奥组委技术部副部长；

2008.08~2014.02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2014.02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廖涛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男，汉族，1964 年 10 月生，四川雅安人，1985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

1981.09~1986.07 中国科技大学系统与管理系学习；

1986.07~1989.08 中科院自动化所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研究生学习；

1989.08~1990.04 中国发明技术开发公司干部；

1990.04~1993.06 中国专利局专刊管理部干部；

1993.06~1994.01 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会物理申诉处审查员；

1994.01~1995.10 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会部长助理；

1995.10~1998.12 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会物理申诉处副处长；

1998.12~1999.06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物理申诉处副处长；

1999.06~2002.0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物理申诉处处长；

2002.01~2007.05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副主任；

2007.05~2009.06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副主任（正司级）；

2009.06~2014.02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主任.

2014.02~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新乡原市长王战营任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男，汉族，1965 年 2 月生，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198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6 月参加工作。

1993.01~2001.12 河南省科委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处长、办公

室主任；

2001.12~2002.10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2002.10~2008.04 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2008.04~2008.07 共青团河南省委党组成员；

2008.07~2008.08 新乡市委委员、常委，副市长；

2008.08~2011.05 新乡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1.05~2011.06 新乡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候选人；

2011.06~2011.07 新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1.07~2014.02 新乡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4.02~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赵京东任四川省雅安市副市长

男，汉族，1973 年 10 月生，山东蒙阴人，199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 年 7 月参加工作，工学博士。

1996.09~1997.07 四川联合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辅导员；

1997.07~1998.12 四川联合大学团委干部；

1998.12~2001.05 四川大学团委干部；

2001.05~2003.05 四川大学团委科技实践部科长；

2003.05~2003.07 四川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助理；

2003.07~2005.05 四川大学团委副书记；

2005.05~2007.01 四川大学团委书记；

2007.01~2009.12 共青团四川省委学校部部长；

2009.12~2012.08 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室主任（2004.09~2010.06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专业学习，2010.06 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2.08~2014.03 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党委书记、党组成员；

2014.03~ 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党委书记、党组成员，雅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黎勇任安徽省宣城市副市长

男，汉族，1961 年 10 月生，广东中山人，1977 年 1 月参加工作，198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1977.01~1978.09 宣城县水阳公社下放知青；

1978.09~1982.07 合肥工业大学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学习；

1982.07~1989.05 宣城地区水利工程管理所工作；

1989.05~1993.09 宣城地区水电局水利科副科长；

1993.09~1996.07 宣城地区水电局设计院院长；

1996.07~1997.06 宣城地区水电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青弋江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7.06~2001.06 宣城地区（市）水电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港口湾水库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青弋江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港口湾水库建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口湾水力发电公司副董事长；

2001.06~2004.04 宣城市水电局局长、党组书记，港口湾水库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青弋江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港口湾水库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04~2005.01 宣城市水务局局长、党组书记，青弋江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2005.01~2005.03 宣城市宣州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2005.03~2008.11 宣城市宣州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8.11~2009.01 宣城市宣州区委书记；

2009.01~2010.11 宣城市宣州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0.11~2011.04 宣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宣州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04~ 宣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市级）；

2014.03~ 宣城市政府副市长，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云南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男，汉族，1962 年 2 月生，云南施甸人，198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 年 8 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学历。

1979.09~1981.08 云南省保山地区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

1981.08~1989.07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中学教师（1986.08~1988.07 在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中文专业脱产学习）；

1989.07~1993.05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政府办公室干部；

1993.05~1995.02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02~1996.10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委办公室主任；

1996.10~1998.01 云南省保山地委副秘书长；

1998.01~2001.06 云南省保山地区腾冲县委书记；

2001.06~2003.01 云南省保山市委常委、腾冲县委书记（1999.09~2002.07 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3.01~2004.11 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04.11~2005.03 云南省思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5.03~2007.04 云南省思茅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7.04~2009.12 云南省普洱市委副书记、市长（2004.09~2007.07 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9.12~2013.01 云南省普洱市委书记；

2013.01~2013.02 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普洱市委书记；

2013.02~2014.03 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4.03~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岳敏君作品《大天鹅》

没文化的传统和“庸俗”生活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

文 | 王蒙

文化的对立面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恶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砍伐电线杆、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 —— 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 —— 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些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神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

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正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因此，一种文化固然可能逐渐暴露其陈旧鄙陋、束缚人的发展之处，仍然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 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其历史内容阶级内容各异，其献身理想的文化精神则一。

呜呼，而今呢？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 —— 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

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

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故事脍炙人口。“刘项原来不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把这句诗又弄得行时起来。另外则是“书读得愈多愈蠢，愈反动”。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诸如“油炸”“火烧”“砸烂”之类的字眼。

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

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 —— 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 —— 引导到建设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我想谈一下意义原则，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应该尽可能地过得有意义些。

什么叫意义？意义与目标不可分。你的目标是争取当上世界冠军，那么你的一切刻苦训练都是有意义的。你的目标只是一般的健身和娱乐，训练方法要求上就与专业运动员有许多不同。

具体的微观的意义比较少争议，例如每

天刷牙，对于洁齿是有意义的，而洁齿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至今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党派学派坚持牙齿愈脏愈好。但即使刷牙也不是全无争议，有一种主张认为现今的刷牙方式于牙齿无益，有益的方法应该是使用牙线剔牙。每天要用餐，吃的东西应该讲卫生、讲营养也争议不大，但也有争议，如有的人认为非吃野生动物、珍稀动物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才能"大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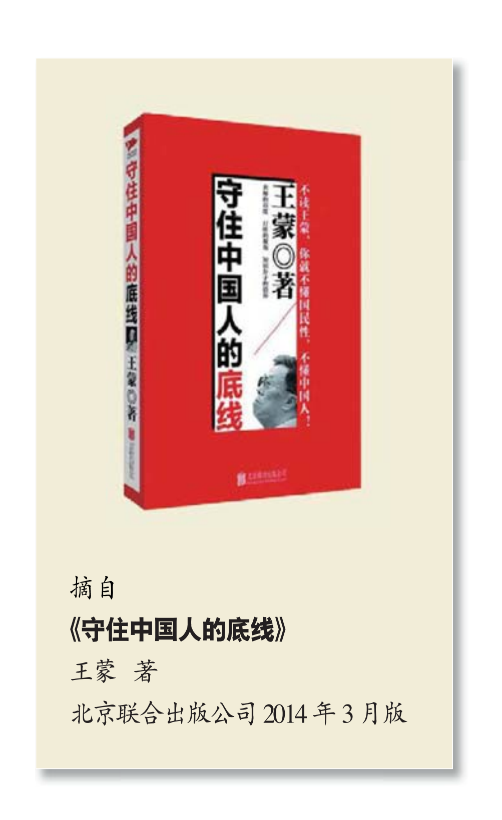
愈是愚昧无知的地方愈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饮食习惯。我们的气功里也有练"辟谷"的，对此我实在无法接受，但又想它大概客观上是一种减肥的中国特色的方式和说法。原来，一切意义都几乎是有争议的，争议并不妨碍我们认为它有意义，也不妨碍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大致有意义的事。例如，未必有哪个人因了意义之争而停止刷牙，也未必有哪个人因了饮食习惯的不一或对于辟谷的认识之争而长期停止吃饭。

愈是谈到大的问题、包容一切的问题就愈是难于讲座和取得一致的意见。谈到人生的终极目的就不能仅仅用常识来解答疑惑了。与无限长远的、永恒与无限辽阔的宇宙相比较，人类，特别是人类个体就渺小得可以不计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论述人生的无意义有它的合理的一面，也许论述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与人生的短促有助于使人的心胸开阔、气象宏大，也许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绪带几分终极眷顾的宗教色彩，也许一种空渺无边，扶摇遨游九万里乃至九万光年的感觉能使你成为哲人、诗人、政治家、思想家，直到苦行僧和传教士。

但这只是思想运动的一个向度，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现实走向茫茫，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但是同时，这里有另一个向度，就是说在无限的永恒与宇宙之中，你的目光投

鹦鹉学舌似的学着现代、后现代的口吻讲一点颓废，聊备一格，或者提供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消极的人生图画以供参照思考也并无不可，然而是当不得真的。



摘自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王蒙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 3 月版

向任何一个点、一个面、一个体，都是具体的、相对的、真实的、充满活气的、多彩多姿与意义分明的。

中国唐朝有唐朝的气象和追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奋斗与光辉，无限之所以是无限，不在于它是零的集合体，而在于它是无数个有限，无数个相对的长远与阔大、诚实与进步、创造与发明的积累与延伸。鹦鹉学舌似的学着现代、后现代的口吻讲一点颓废，聊备一格，或者提供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消极的人生图画以供参照思考也并无不可，然而是当不得真的。

欧美哲学家、文学家大讲人生的虚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强大的基督教传统神学传统与神学基础，他们从虚无中坠下，基督和圣母在那里接着，从空虚中跌下的人们至少可以掉到宗教和神学那里，他们讲的虚无还有体制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保证，你讲你、搞你的虚无，我抓我的效率和最大利润，你讲你、搞你的反战，我搞我的导弹计划。

在几万、几十万或者更多的能人讲怎么样改进电脑、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做爱、怎么样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的同时，有几个教授讲人生的终极的虚无确实显得卓尔不群、振聋发聩、如沐冰雪、当头棒喝，如给热昏者调一杯薄荷冰激凌，使陷入物质欲望永无超度之日的人们关心一下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价值系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噩梦。

但是在我们这里，在一个还有部分人口没有或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在一个忙于迎战春天的沙尘暴、夏天的洪水加干旱，还有不分季节的假冒伪劣的十几亿人的神州，舶来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也许只能造就出吸毒酗酒和信口开河的牛皮大王来。

好了，让我们暂时把时髦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请到一边。真理总是具体的，虽然我不反对抽象思维的享受也不反对抽象真理，如果您老能拿得出来点新鲜货色的话。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真理的具体性，承认真理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的联系。那么意义也从来是具体的，因为人生是具体的。

小而至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大而至于学习、工作、事业方向，我们可以选择更有意义的事去做并多做，而少做无意义的事。

"庸俗"

在当前人们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的情况下，也许大多数人难以碰到特别的逆境和顺境，更多是一种俗境：工作不好不坏，专业过得去但不出色，也并非全然滥竽充数，客观环境一般化，身体、心情、收入、地位、处境都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样的日子过得平常、平淡、平凡、平静、平和。这几个"平"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运气。我国南方就把"平"字当作一个吉祥的字。香港将"奔驰"（车）译成"平"字就很有趣。但这样的平常状态很容易被清高的、胸怀大志的、哪里也放不下的或多愁善感的人们视为庸俗。

这样的生活有着太多的重复，太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少的新鲜感、浪漫和刺激。静极思动，人们长期处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会突然憋气起来，上起火来。契诃夫就很善于写这种对平凡的小地主、小市民生活不满意的人的心态。

这里有一个杀伤力极强的名词叫作"庸俗"。和配偶生活了许多年双方都没有外遇，这似乎有点庸俗。饮食起居都有规律，没有酒精中毒，没有服用毒品，没有出车祸又没

有患癌症，这是否也有点庸俗呢？没当上模范，没当上罪犯，没当上大官，也没当上大款，没当上乞丐，也用不着逃亡，没住过五星级宾馆大套间，也没露宿过街头，没碰上妓女，也没碰上骗子，没碰上间谍，也没碰上雷锋，没有艳遇，也没有阳痿阴冷，那怎么办呢？庸俗在那里等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庸俗之怨、庸俗之叹我一无办法。我在年轻时最怕的也是庸俗。写作的一个目的也是对抗庸俗。我甚至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选择革命不是如工农那样由于饥饿和压迫，而是由于拒绝庸俗——随波逐流、自满自足、害怕变革、害怕牺牲等。后来，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我明白了，庸俗很难说是一种职业，一种客观环境，一种政治的特殊产物。

商人是庸俗的吗？和平生活是庸俗的吗？英雄主义的政治与大众化的政治，究竟哪个更庸俗呢？小学刚毕业的人批判爱因斯坦，如"文革"中发生过的，其实令人不觉得庸俗呢。莫非庸俗需要疯狂来治疗？而一个人文博士，刚出炉的 Ph.D，摆出救世的架势，或是摆出只要实惠可以向任何金钱或权力投靠的架势，究竟哪个是庸俗呢？真是天知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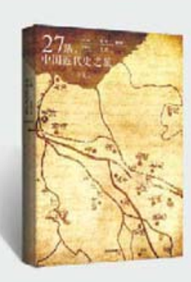
诗是最不庸俗的吗？有各种假冒伪劣的诗，还有俗不可耐的诗人——我曾刻薄地开玩笑说这种诗人把最好的东西写到诗里了，给自己剩下的只有低俗和丑恶了。革命阵营中也有庸俗，除非革命永不胜利，革命永不普及，革命成为格瓦拉式的小股冒险。画家、明星、外交官、飞行员、水兵和船长这些浪漫的工作中都有庸俗者。正如行行出状元一样，行行也出庸俗。而另一方面滥用庸俗这个说法，孤芳自赏，如王小波说的只会瞎浪漫，则只能败坏正常与正当的人生。

庸俗不庸俗主要还是一个境界问题，一个文化素养、趣味问题。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品位，扩大自己的眼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现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作"大雅若俗，大洋若土"。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只有旧俄作家笔下的乡村地主，才会留下十余年前在彼得堡听戏的戏票，时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的不俗。



名人荐书

葛剑雄：
先师谭其骧先生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本书描述了百年前的舞台一角，也记录了打造这个舞台和在舞台上演剧的人，值得一读。



《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李礼 主编
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冷哲：
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丹尼尔·金为我们揭示了美国贵族赖以达成世袭的秘密之一。



《大学潜规则》
【美】丹尼尔·金 著
张丽华 张驰 译
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

小宝：
作者亲切、坦白、有趣、会聊天、好人缘，但他是个俗人。当年清贵公子的文学才华已经换作沧桑百姓的生存智慧。



《宁静的地平线》
张郎郎 著
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版

吴肃然：
数位颇具影响力、富有社会关怀的经济学家，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哲学争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才是真理？"



《无声的革命》
梁晨 张浩 李中清等 著
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



2013年9月3日，日本摄影师Keisuke Jinushi拍摄的女友喂食照片走红网络，他将右手涂上指甲油和粉底假装"女友"给自己喂食并自拍下来，逼真程度足以乱真，但不少网友看完真相后"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日本进入"不婚时代"

"阿拉40"是一个当下日本的流行词，听起来很有些贵族感，专指那些40岁上下、有房有稳定工作，但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晚婚、不婚在日本日益普遍，《东洋经济周刊》称日本已经进入"超级单身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 | 日本东京报道

在东京赤坂的一个小居酒屋见到尾上小姐时，发现她和十年前在北京工作时几乎没有变化：仍然单身，仍然美丽。

同去的朋友介绍说，尾上小姐刚刚在东京市中心买了房子，以东京的房价水准来说，她算是生活相当稳定顺利了。

谈起 10 年间的变化，尾上自己用了一个很时髦的日语词 —— "阿拉 40"。"阿拉" 其实来源于英文词 "around"（大约、上下），不过很多日本人在读这个词的时候，会简单地读成 "阿拉"，听起来像是说上海话。

其实，"阿拉 40" 是一个当下日本的流行词，听起来很有些贵族感，专指那些 40 岁上下、有房有稳定工作，但还没有结婚的男女。20 多岁的青涩已经过去，30 多岁的拼搏一眨眼也随风而逝，以至于到了 40 岁上下时，心态似乎还停留在刚刚 30 岁出头的阶段。在尾上说起 "阿拉 40" 时，我甚至觉得，这个时间段很有可能会延续到 "阿拉 50"。

日本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是，2010 年日本 50 岁的人口中，从未结过婚的比例，男性为 20.1%，女性为 10.6%。晚婚现象也相当普遍，30 到 34 岁的男性未婚率高达 47.3%，35

东方IC

到39岁的未婚率也有35.6%。预计到2030年，日本50到60岁的男性中，有将近三成的人未婚且可能终身不婚，女性的未婚和不婚比例也会相当高。

可以说，日本社会正在进入“不婚时代”。

“超级单身社会”

第一次见坂上里子小姐是1989年，那时她大学刚刚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里子的父亲是报社编辑，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认识了里子。

日本经济泡沫及泡沫刚刚崩溃的时候，证券公司生意好得不得了。公司八点半上班，但里子基本上六点半就到了。白天接电话，会客，三点钟股市交易结束后，还要整理各种资料，晚上有一个或几个“学习班”、“兴趣同好会”，到家总要十点以后了。

以后几次去见里子父亲，听说里子已经辞去工作，在一家补习学校里当英语老师。再以后听说她去了一家企业，后来又学习中国针灸，并开了自己的小诊所。

最近一次去里子家，开始和她讨论戴老花镜问题——这本该是和里子父亲讨论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里子仍未嫁，即便是有了自己的诊所，节假日也会在她父亲这里遇到她。

20年前，去日本人家里做客，最普遍的家庭面貌是，父母带着一两个孩子生活。20年过去了，有太多的日本家庭还是父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只是孩子已经三四十岁，即便是独立了，可能也还未结婚，即便是结了婚，可能还没有孩子。

晚婚、不婚在日本已经非常普遍。日本“人口普查”的时候，会专门统计单身住户。目前的预计是，到2030年，日本30岁以上的单身住户将达到1600万，中老年男性4人中便会有一人单身生活。《东洋经济周刊》就此在2014年3月1日（提前出版）发表封面文章说，日本已经进入“超级单身社会”。

单身不等于孤单

另一个日本人单身不急于结婚的原因是，社会变了，单身已经变得不孤单，反而会让人感觉十分自由。

在大企业工作的大岛，现在也是“阿拉40”一族，前不久刚刚由公司公费派遣从美国留学回来。

刚刚40岁的大岛说，有过几次女友，也想过结婚的事，但就是下不了决心。他担心，结婚组建一个家庭，会打乱现在充实的生活，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

他在东京有自己的公寓，上下班很近，在公司里加班太晚的话，有家室住在郊区的同事担心没有轻轨或地铁，他打车一个起步价就能回家。

不仅在东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就算没有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手机上相当于中国微信的LINE也会有数不清的人可以联系，他的世界充满了未知。

在日本企业纷纷去中国投资之时，大岛所在的企业也在中国建了工厂，大岛因此有不少去中国出差的机会。拖家带口的同事没有几个能静下心来学习中文的，单身的大岛则可以集中精力学习，不到半年就已经能看懂简单的中文，还能进行一些日常会话。

“也有觉得很累、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坐上轻轨到郊区找个温泉，好好放松一下。”大岛说。如果有家庭的话，先不说能否有这个经济实力，带上老婆孩子去近郊住上两天，也会累得人仰马翻。

退休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阿拉40”都像大岛一样，在大企业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另外还有上千万日元（约数十万人民币）的存款。不少不婚者，也会有很强的不安感。

田中每月都会从东京去广岛看望自己70多岁的母亲。母亲过去总会担心田中的婚姻问题，看看儿子都40多了，并没有结婚的意思，母亲也就不再催促了。

“老人家已经开始有些健忘，刚刚吃过饭，忽然又问吃饭了吗。如果父亲在，还有个人能照顾一下，但父亲早就不在了。看她这个样子，真觉得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田中说。

由此再想想自己，他也担心，老了以后境遇也许会比自己的母亲更加糟糕。但他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惯了，回家和自己母亲住两天都觉得不自在，找人结婚天天住在一起就更难适应了。

更深层次上，“阿拉40”一族更多是对未来的淡淡不安。

负责人口的日本总务省最近发表了2012年的日本“家计调查”结果，其中发现，单身老人每月的平均支出为15.383万日元，但其收入只有12.1542万日元，相差了3万多日元。这意味着，一个人退休后如果独自生活30年的话，会面临1000万日元以上的个人财务赤字。

况且，日本目前尚能维持的国家养老体制，其基础是年轻人数量大大超过老年人，今天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能够支付老龄人口的养老费用。但一方面老龄化愈发严重，一方面不婚和少子化导致新生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像田中这一批如今40多岁的人在进入65岁以后，怕是很难获得和自己父母一样多的养老金。所以，田中们必须现在就把这部分钱攒出来，这是个巨大的压力。

人生活90岁，从45岁开始不晚

本刊记者见到并熟识的日本“阿拉40”，或许内心不时纠结于自由感和不安感之间，但总体的生活状态仍然是积极和开朗的。

负责国民体质数据调查的日本文部省，前不久发表了一个调查数据，说现在的日本人比20年前的日本人，在体质上要年轻大约10岁。也就是说，如今的70岁的人，和20年前60岁人的体质（走路的速度、提取重物的能力）基本相同。大约从30岁开始，日本人变老的速度就开始比其他国家的人要缓慢很多，“阿拉40”大致相当于过去30岁的人。

经营一家翻译公司的女老板吉田，到了40岁以后开始想要一个孩子，44岁那年真的生了一个，尽管她并未结婚。她的想法是：“人生大概有90年，到45岁只过去了一半，今后的日子还长。”

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多样化，让日本社会对单身不婚和单身母亲等以前的“异类”越来越宽容。今后的日本，不婚比率可能还会越来越高。不婚的自由会有更多人享受到，不婚带来的不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即使到了“阿拉40”的时候，还可以重新规划，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只要幸福就好。东

停不住

回到老地方



不到七点动身。早晨安静的村庄。一个年轻男人在门前擦摩托车，看来是新到手的玩具，一个老年人把捆好的一束青竹放向竹堆的上面；女人在房前水龙头下洗着什么，老太太在院中点燃一只气炉，我看见腾起的火苗，想象着他们的早饭。这是一幅安宁的画面，平淡，如果有人把它画下，观众会说："就像生活一样。"是的，这是生活，我们的生活，由这些平淡的情节组成，从早晨的第一次深呼吸，到夜间的灯光。

在竹山县境内，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在左前方，也就是公路的西南方，望见远处一排山峦的熟悉姿态。我立刻想，那是巴山。我意识到自己在微笑，至于这是苦笑，讽刺的笑，还是欢喜的笑，就很难说了。

半小时后，公路伸入山谷中，我得以就近观察几尺外的山，忽然又不能确定了。这一小段安静美丽的山谷，植物极为茂密而且品种繁多，但从塘湾村起，针叶树夺到了统治权，紧接着，公路在高处拐了个弯，我便看到前方绵亘数十里的山脉，是的，那是巴山的一部分。

这一天的情形，真是不知如何说起。

房县……竹山……竹溪……所有的印象都混在一起，那些道路，房屋，人，植物和山体，我一定经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刻，因为此刻我忽然记得悦耳的鸟鸣，然后又想起那正是在前面写日记的地方，我合上电脑后，注意到左边一小片树林里传来的音乐，欣赏了十分钟。

房县……竹山……竹溪……所有的印象都混在一起，我一定经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刻，因为此刻我忽然记得悦耳的鸟鸣

我记得最突出的声音，仿佛是乐队中的独奏，先是一个长音，紧接着是响亮的三个章节，这种鸣叫一起，别的鸟都知趣地沉默了，要过了好几秒钟，才有胆大的禽类小声地叽叽两声，经过它的试探，其他鸣禽才陆续加入，正当它们开始唱得有些兴高采烈时，那傲慢的乐手又开口了，它们只好羞愧地又闭嘴了。

其他，我只记过经过了无数村镇。大约十二点钟，我猝不及防地进了陕西（关垭），不由得苦笑。在平利县境内，我疲惫不堪，一心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歇下来，但整整两小时，一处也没发现。我的眼睛搜索得酸痛，而且干涩。我计算着离安康市的距离，越来越焦急，但毫无办法地在——我忘了几点钟了——进了安康，又在心中的一阵混乱中驶出来了。

下午三点半钟，我注意到前方地平线上的绵长山影变得清楚了，我已可以确认那是秦岭山区。我对自己说，好吧，咱们看看去。二十分钟后，先是岭东清真寺，然后是越岭关隧道——我是多么喜欢"岭"这个字啊，尽管面前的只是个斜斜的、比我高不多少的土坡。过了隧道，我仍然行驶在平地上，秦岭却嘲笑地跑到了我的左侧。前面有些低矮的土丘或土坡，仿佛是秦岭把尾巴拖在地上，即使如此，316 国道还努力地闪躲着它呢。

四点钟，经过了一个叫浦溪的地方，我终于接近了一些山丘。尽管有着蜡烛山的美名，驶到近处一看，充其量像掉在地上的烛泪。快到五点钟时，公路真的有些进入山区的意思，没等高兴一分钟，我见到了石泉县的界牌。

这时我已经逆来顺受了，只是麻木地开车。我看见一大片楼房和其他建筑。那一定是石泉县城。旅行的第一天晚上，我便是住在石泉县城外的汉水边上。实际上，下午的时候，和它有关的某一想法跳出来过，那时我觉得太荒唐。

二十分钟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到了二十三天前停车的空地上。乐

刀尔登：
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

贵族间的战争



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留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优雅的一个道歉："对不起，先生"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这岂不正是"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

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

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相同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留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优雅的一个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感觉更奇怪。

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调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即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欧洲政治中也有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只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中，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车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意思是，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因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

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了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竟然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二世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二世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但要宣布亨利二世为继承人。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间的战争一般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张宏杰：
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中石化	好丽友	德国汉高	联邦家私
关键词	**受贿行规**	**虚假宣传**	**黑榜**	**异味**
时间	3月10日	3月10日	3月11日	3月12日
事件梗概	乔某在2011年硕士毕业后入职中石化下属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采购部工作。工作不到一年，以“行规”受贿6万元。他把这6万元分成两份汇给了妻子和情人。被妻子发现在外养情人后，乔某被岳父举报。	你是否被好丽友薯愿“100%不含反式脂肪酸、还能瘦身”的广告语诱惑？但你又是否知道反式脂肪酸标注为“0”不等于完全不含？3月10日，该薯片因涉嫌虚假宣传被上海市工商部门处以5万元罚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如果100g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等于或低于0.3g就可以标示为“0”。因此，“0”未必等于一点都不含。	湖南省工商局发布了内墙涂料类商品质量监测通报，由“广东省江门市汉高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两款产品均因耐洗刷性不合格登上黑榜：“德国汉高”健康儿童五合一墙面漆，“汉高”超易洗抗污墙面漆。	广东省吴女士2012年购买了两套联邦家私实木家具，其中一套为儿童家具，总价近二十万元。送到后，儿童床及书桌味道非常浓重，每天开窗通风，还开着电风扇来吹气味，并因此推迟入住计划。但放置两个月后，家具味道还是很重。上海、北京等地亦有消费者反映类似问题。
消息起点	北京卫视	上海市工商局	湖南省工商局	《中国质量万里行》
影响/波及面		反式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经过部分氢化的植物油，长期摄入能形成血栓、影响发育、降低记忆、容易发胖，甚至引发冠心病等。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质量黑榜中，耐洗刷性不合格几乎成为企业上榜最集中的原因。汉高官网宣称：在所有总部位于德国的公司中，汉高是全球市场中最具国际化的跨国集团之一。	由于联邦家私公司一直未派员处理，吴女士只好请来日本公司对这批联邦儿童家私做了检测和光触媒处理。
应对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回应：对乔某“十分愤慨”，坚决支持依法严惩乔某，公司认为，乔某在庭审中所承认的“受贿行规”“绝不存在”。	上海市工商部门表示，2013年全年共查处各类虚假违法广告案件3140件。好丽友公关经理张晓艳对外表示公司宣传不违法。	有媒体记者联系汉高（中国）公司，未获回应。	联邦家私总裁办工作人员郝先生回应记者：“全实木家具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南北温差造成，一直在改善。”“目前，联邦家私采取直营+加盟商的销售方式。”至于为什么存在像吴女士一样遭遇到的差劲的售后服务，郝并未回答。
东方点评	祸国殃民的灰霾，有油品质量落后的“贡献”。请关注《瞭望东方周刊》调查报道。	不违法，违心否？	是“汉高”还是“德国汉高”？“德国制造”是否也有“假洋鬼子”？	温差能造成异味，温差能阻止售后人员出门吗？

啊饭达制图



光明乳业



通信运营商



麦卢卡



东芝

掺假

3月12日

南京江宁养牛大户王士发提供的南京龙耳奶站原始账单显示了奶农卖奶的记录：2013年8月7日，早上产鲜奶321.4公斤，晚上268.6公斤，而该家奶站卖给光明乳业的账单却显示，早上471.4公斤，晚上418.6公斤，早晚均多出了150公斤，一天多出300公斤。

人民网

王士发和周边奶农生产的牛奶一直卖不出好价钱，亏损越来越大。王士发认为，这是奶站往牛奶里“掺假”造成的。

负责调查此事的光明乳业顾经理承认奶站的生奶数量与实际收奶数量确实“有出入”，并且出入情况与王士发反映的“差不多”。光明乳业公共事业部殷江玲书面回复记者调查结果：南京光明乳品有限公司所收生奶的各项理化指标均在正常值内，并无掺假迹象。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以，但掉下大批牛奶……三鹿之灾，并不遥远。

诈骗蛋糕

3月12日

公安部统计，2013年电话诈骗发案30万余起，群众损失100多亿元，比2012年分别上升77%、25%，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陈伟才说：运营商在“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银行获得3%，以公众被骗1000万元为例，运营商只赚100万元，而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还需跨境进行，国家为此要开支2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

陈伟才在“两会”上对“两高”提出从源头和渠道治理电话诈骗，“呼唤”汤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挽回部分损失”。

中国移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公司拦截诈骗电话的效果也很明显。”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移动、联通、电信是小商人吗？他们是谁成立的？是人民。

掺假

3月12日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1月份进口食品化妆品不合格名单”中，来自法国和新西兰7个批次的麦卢卡蜂蜜被检出掺假。去年12月，来自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被检出掺假；去年11月，来自澳大利亚的“麦卢卡蜂蜜”货证不符被退货。英国食品研究机构此前曾对5个品牌的新西兰麦卢卡蜂蜜进行了抽样检测，结果发现有4个品牌根本不存在活性抗菌物质。

《北京商报》

麦卢卡(Manuka)是蜂蜜“贵族”，据称含有UMF抗菌活性物质，具有医疗价值，价格往往是普通国产蜂蜜的近10倍。新西兰独麦素蜂蜜生产协会是中国香港地区单独进行的检查中，在55份样本中甚至发现有14份样本中添加了糖浆。

麦卢卡蜂蜜年产量1700吨左右，但现在全球市场上以“麦卢卡”名义售出的新西兰蜂蜜却约1万吨。相关品牌数十个。

地球村没有村长，各种平民便自标“贵族”。

忽视大陆

3月13日

东芝宣布召回58.3万台洗衣机，进行无偿检修，因为这些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多次发生自燃事故。召回的洗衣机是2005年7月至2011年11月生产的30种机型。召回地区包括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但不包括中国大陆，虽然存在质量隐患的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均有销售。

《新京报》

2008年至今，东芝笔记本电脑、彩电、洗衣机等产品多次因存在质量缺陷被召回，每次召回也均不涉及中国大陆市场。

2010年7月，《家用电器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就已经开始征求意见，4年过去了，正式规定始终未出台。

既然肉食者不担心家里的电器，我们就寄望于民族良心企业壮大吧。

养老地产三足鼎立

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商机约4 万亿元人民币，到2030 年有望增加至13 万亿元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元元 | 北京报道

四年前，82 岁的张兰香（化名）和老伴把家安到了北京北六环边的一个小区。尽管在城区有房子，张兰香还是喜欢住在这个稍显荒凉的郊外小区。当初打动她的是该小区的宣传语：打造医护型全程化养老社区。

小区名叫北京太阳城，是目前国内投资较大、开发较早的养老地产项目。

到了 2013 年，一度困顿的养老地产迎来大爆发，甚至被称为“元年”。2014 年，养老地产将发生什么？谁在主导？

良好的开局

养老地产是以养老为宗旨的地产开发，是一种与旅游地产、文化地产等概念相似的

东方 IC



主题性地产项目，采用的是“养老+地产”的复合型开发模式，核心在于适老化设计。

“我们在2000年开发养老地产项目时，国内还是空白。”北京太阳城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凤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该项目的成功不仅使得养老地产这一新兴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更揭开了中国养老地产发展的序幕。不过，随后10年，中国养老地产受制于种种因素，一度陷入困境。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众多大投资项目上马，投资地域也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第三季度，全国各地新增养老项目25个，其中不乏160亿～200亿元的巨额投资项目。

养老地产能在2013年“重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场需求、国家政策以及房地产业现状三方面的合力。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9%，且仍将以每年1000万的规模递增，预计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

庞大的老年人群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据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所测算，目前中国养老市场的商机约4万亿元人民币，到2030年有望增加至13万亿元。

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19个具体方面、45项主要工作任务入手，促进我国养老产业。

“《意见》的出台不仅为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在政策上提供了明确支持。”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全经联”）养老住区委员会委员、北京吉利大学健康产业学院院长乌丹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就是一剂强心针，给足了市场信心。

另一个现实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疲软，寻找新的利益洼地、实现转型升级成为众多地产商的当务之急。

行业研究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监李亚南对本刊记者说：“2013年被业内称为养老地产元年，很多政策开始提出和落实、完善，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三足鼎立

简单梳理即可发现，房地产企业自养老地产开发伊始便雄踞要位。不过，随着国家在市场准入原则上的放宽，其他资本逐步进入养老地产市场，并渐成气候。

“房地产开发企业、险资、央企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养老地产‘三足鼎立’的竞争势态。”乌丹星说。

“已有近30%的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入了养老地产。”乌丹星介绍说，万科、保利、远洋等20余家国内一线房地产开发商都已涉足养老地产项目。

万科早在2010年就在北京房山窦店试点了养老地产项目“万科幸福汇”。此外，万科集团还在北京的欢庆城和青岛的万科城试水养老地产项目。目前，万科至少有4个养老地产项目。

2013年年末，保利地产发布养老战略，表示将全产业链进入养老产业，打造由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养老模式。目前，保利地产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已有6个养老地产项目在建。

2013年4月，远洋地产正式成立养老运营管理公司，创建自有养老品牌“椿萱茂”。同时，其与美国哥伦比亚太平洋公司合作的高级养老护理项目“椿萱茂·凯健”也于2013年开业。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国内房企预定的养老地产项目已超过百个。假设以每个项目平均投资3亿～5亿元计算，总投资额就可达数百亿元。

大举进入的还有保险业。2010年9月，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正式获准进入养老地产市场。到2012年底，保险系企业在养老地产领域的投资已超过500亿元，其中包括中国人寿、泰康人寿、中国平安等。

2011年11月，中国人寿首个养老基地国寿生态健康城在河北廊坊开工，总投资100亿元。目前，中国人寿在全国范围内共有6个养老基地。

2012年6月，泰康人寿第一家养老社区在北京昌平开工。2012年9月，中国平安进军养老产业的首个项目“桐乡平安养生养老综合服务社区”启动，总投资170亿元。与此同时，泰康也在上海、广州拿地启动多个养老项目。

此外，合众人寿、太平保险集团等公司也都开始尝试养老地产项目。

“还有一类是致力于医疗和养老领域投资的投资机构，比如国开行等。”李亚南说，投资机构与险资性质一样，同属金融机构范畴，且投资更有目的性，也更加谨慎。

第三支进入养老地产的“部队”就是央企，如中石化、中国水电、鲁能集团等。

“虽然央企在养老地产上起步晚于房企和险资，但它们来势凶猛、大笔出手，未来赶超之势不可小视。”乌丹星分析说，央企在未来的养老地产市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李亚南认为，除了以上三大主力，养老地产市场还存在另一类参与者——与医疗相关的跨界企业。这类企业多是做养生、健康管理等高级服务的专业公司。在养老地产崛起时，凭借自身在医疗方面的特色优势参与其中。不过，这类公司目前还未形成规模。

“每一类市场参与者都有优势和劣势，无法说哪一类更适合养老地产。”李亚南说，目前多数参与者都在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而忽视了劣势。

房产企业的优势在于取地和项目开发，长于市场营销；劣势在于跟政府谈判时比较被动。同时，这类企业缺乏资金，也不精于后期的项目运营。

和房产企业正相反，险资和央企在养老地产市场最大的优势在于稳定的资金池。而



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商，对于养老地产的认知和把握都有些底气不足。从这点来看，中国养老地产的未来注定充满变数。

资金是养老地产开发的关键。

此外，固定的客户渠道、成熟的营销团队也是险资和央企的优势所在。不过，这两类市场参与者在劣势上较为突出。一是在取地和开发上没有经验；二是对市场不敏感，无法准确定位市场。

“4+5”模式

随着市场的升温，业内对于养老地产开发模式和运营模式的讨论也日趋增多。

不过，对于刚起步的中国养老地产市场而言，固定的开发模式尚未成型，更多的尝试和探索仍在继续。总体来说，国内养老地产的开发模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专门开发的综合性养老社区。这类养老社区通常建在市郊、环境较好，产品类型包含养老住宅、养老公寓、养老护理机构等，可以为各类身体状况的老人提供持续性生活照护。社区中为老人配有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医院、老年大学等。北京太阳城、东方太阳城都是这类代表。

第二种是在新建普通居住区中配套开发养老住宅及相应服务设施。如在社区中配建老年人居住组团、老年公寓、老少户套型等。这种开发模式使老人能够居住于“混龄”社区，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同时，老人还可与自己的子女相邻居住、互相照顾。这类开发模式也被称为多代亲情开发模式。万科在杭州建设的良渚文化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三种是结合旅游、养生资源开发的度假型养老社区。这类社区通常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搭配相应的养生、康复服务，例如农业采摘、温泉水疗等。老人可以在一年当中的某个季节或时段来此居住，是一种具有时令特征的居住形式。目前，这类养老地产项目多集中在海南、云南等具有风景特色资源的地区。

第四种是会员制医养综合体。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高龄老人、有疾病或者慢性病康复的老人而设计。医是指中医、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养是指专门的护理院。在这类社区中，医和养配套建立、缺一不可。如北京的太申祥和山庄。

此外，目前引起业内关注的还有一种尚无成功实践的开发模式——医疗投资小镇。这种开发模式多以当地丰富的医疗设施资源为指引，为前来看病就医的老人提供暂时性居住服务。这类小区多以租赁为主，主要面向特定的医疗资源需求人群。

在后期的项目运营中，国内养老地产市场也大致存在 5 种盈利模式。

一是投资商和运营商向开发商定制养老地产项目（养老机构或养老社区），开发商按照要求开发，风险减小，盈利有保障；二是养老地产开发商开发之后卖给有意向的投资商或运营商，获得一次性收益；三是开发商持有部分物业，以出租方式获得长期稳定的租金回报，做养老地产的房东；四是开发商在持有部分物业的同时，请运营管理团队托管，获取运营管理的部分收益；五是投资商或开发商与运营商形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养老项目，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并在项目中发挥自己优势，获得收益。

“目前在国内这几种盈利模式都存在，但都不成熟，都处在摸索阶段。”乌丹星说，在发达国家成熟的运营模式中，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三者在投资、开发和运营方面可以做到相互渗透、相互介入甚至是三者之间不断转型。

融资困境与人才缺失

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养老地产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初期的碎片化发展、中期的产业链形成和后期的品牌诞生。

产业发展初期是在政府大力引导、鼓励和支持下，企业开始进入养老地产市场，开发类型、运营模式都存在诸多缺陷。产业发展中期是产业链的形成和不断成熟，软硬件配置更加合理，运营模式、盈利模式更加清晰。产业发展后期进入品牌阶段，资本大举进入，并购扩张成主线，通过强强联合，使品牌强化。

目前，中国养老地产正处于初期碎片化发展阶段，没有成熟的运营体系和盈利模式，缺乏足够的优质产品和运营服务支撑。

“养老地产与上下游的对接尚未完成。地产商还在依赖卖房子；险资虽不卖房，但真正进入良性运营的项目还没有；大型央企的养老项目还处于初期开发阶段。”乌丹星说。

中国养老地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环节，前期的投资开发和后期的运营维护。前者最大的问题在于融资，而后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专业人才的缺乏。

作为产业开发的第一链条，资金决定着项目开发的成败，也成为养老地产发展需跨过的第一道坎。“养老地产的投资周期长、成本回收慢，资金要求大，如果没有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就很难持续发展下去。目前养老地产融资渠道并未打开。”乌丹星说。

养老地产本身的市场特性，加上国内的养老地产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成熟的开发和运营模式，使得众多有能力的投资商在这一领域极为谨慎。银行之外的境内外大型资本基本处于观望状态。融资困境使得众多养老地产项目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项目的后期运营比前期开发更具挑战性，专业人才的缺乏是最大掣肘：一方面是高端运营人才、高级职业经理人的缺乏，另一方面是专业护工的缺乏。

以养老院为例，目前国内众多养老院的负责人是医院的退休院长。这些人虽然有多年的医院管理经验，但并不能胜任专业养老机构的管理岗位。问题在于两者存在定位之差，前者面向大众群体，后者面向特定老年人群。

专业护工缺乏更为严重。目前中国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多是从传统行业跨界而来，真正接受专业教育的护工少之又少。加之，很多养老机构在人员的选择和任用上标准不一，使得养老服务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

“随着养老地产项目的不断开业，未来几年人员总量需求将达到1000多万，但目前市场上只有30万左右在一线从事养老服务。”乌丹星说。

除此之外，养老地产市场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项目定位不清晰，一味走高端路线，忽视老年人真正需求；市场机制不成熟，营利性、非营利性、公办、民办养老项目之间的市场关系和运行机制尚未理清；社会大众养老观念尚未转变等。

体系建设、转变观念是关键

“养老地产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些都是行业性的问题，而非某个开发企业的问题。”行业顾问公司润土咨询董事长于贵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她看来，国家政策在解决养老地产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可以在用地方面给予开发商一定的政策支持，也可通过税收减免或者资金补贴的形式直接扶持运营商。”不过，她也提醒，政府应该对已批准的项目跟踪审查，以防个别企业打着养老的旗号进行地产开发。

“融资困境是当前养老地产面临的紧迫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众多市场参与主体能否通力合作。”李亚南给出的建议是，“保险公司出钱，由开发商代建、代集，再整合专业的市场机构和运营机构，形成一个产业链条，这是一种比较靠谱的模式。”

不过，在乌丹星看来，养老地产市场最急需解决的是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的养老地产市场庞大，如果没有一个市场标准，就会变得杂乱无章。”

标准体系的建设要完全涵盖养老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从养老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建筑施工到后期运营，以保证养老项目能够最大程度契合老年人需求。同时，居家养老设施改造、城市老年公寓、护理之家等应该以何种标准建设和运营管理才能满足老人需要也应纳入标准体系之中。

“没有这些内容做支撑，养老地产就是一个空壳。”乌丹星说，“众多开发者仍然用传统地产思维和地产模式做养老，注定失败。”



北京太阳城内景，专门开发的综合性养老社区为老人配有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不可预测的未来

2014年2月18日，全经联在京发布《2013中国房地产创新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对2014年养老地产市场的发展展望中，《报告》这样表述：2014年将是国家养老政策落地的关键年，届时国家还将陆续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一系列政策的密集落地必将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整个行业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

《报告》预测，养老地产将与其他产业形成集群，推动区域综合发展。

一时，“养老地产将迎来黄金春天”的论调似乎成为共识，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专家和多家行业研究公司均持相同看法。

根据全国老龄办的调查，目前中国老年人总的服务需求满足率仅为15.9%，还有84.1%的老年人服务需求没有被满足，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商情报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邓思思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总量巨大的老年人口中，只要有10%人群入住养老社区，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至少4500个养老地产项目需求。”

不过，与业内热炒养老地产市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家相关部门始终保持低调、审慎的态度，并有意为之“降温”。

2012年7月26日，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防止以养老项目名义建设和销售商品房”、“防范以自用项目名义投资不动产”这两条对养老地产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2013年7月9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仔细甄别养老地产与养老机构，既要保护房地产业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积极性，又要防止简单地把养老地产当成养老机构的现象发生。

2014年2月19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公开表示，养老地产不会纳入养老产业进行管理，也不会享受养老产业具有的相关税收政策优惠。

“政府对开发商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在出台相关政策时非常谨慎，担心被钻了空子。”于贵红说。

显然，不管是政府还是开发商，对于养老地产的认知和把握都有些底气不足。从这点来看，中国养老地产的未来注定充满变数。东



【编者按】

在上一期的杂志中，本刊推出了《“桶装水二次污染”多系人为》，引起各界对饮用水安全的重视，本刊继续投入力量，推出“水安全系列报道”，以盼各方早日合力，构建一个安全的饮用水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水安全报道之二

水龙头之毒

“净铅”成为市场“新宠”。然而，“无铅”或者“净铅”二字对于国内的铜制水龙头而言却是一个“伪命题”。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彭波 | 北京报道

2013年7月14日，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披露：通过对13个水龙头样品进行实验，发现9个品牌的水龙头浸泡水铅含量超国标。

其中，美标、申鹭达、朝阳卫浴少量超标，恒洁卫浴、得而达、摩恩超标数值在2～6倍，而九牧和高仪水龙头的铅超标量达到了18倍，最严重的乐家品牌铅析出量为173微克/升，超标34倍之多。

中外知名水龙头大品牌的悉数上榜，一时间搅乱了国内的水龙头行业。

5个月之后，面对愈演愈烈的水龙头"毒铅门"，央视《是真的吗？》再次对市场上的14款不同品牌的水龙头进行了检测，这一次名牌水龙头安然过关，只有来自建材市场的星丰洁具与五林卫浴两个厂商的水龙头存在铅超标。

"毒铅门"发展到此时，伴随着大品牌的"沉冤昭雪"似乎已是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谜团仍未全部解开，关系每日饮食的水龙头安全吗？对于水龙头行业，一次大洗牌也正悄悄地酝酿。

本刊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四大家族"的忧郁

在晋江中游，福建泉州南部的丘陵中，有一个地狭人稠、资源并不丰富的县级市——南安。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如今却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水暖城"，拥有申鹭达、中宇、九牧、辉煌在内的四大知名水龙头品牌，号称南安"四大家族"。

与此同时，南安亦有30多万人遍布全国，控制了水暖行业全国80%的终端销售。2013年7月，这个庞大的水暖帝国承受了一场不小的冲击，"四大家族"中的九牧与申鹭达成为众矢之的。

两家涉事企业均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称各自的水龙头产品符合行业标准对铅析出量的要求，九牧还提供了"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所出具的检验报告。本刊记者走访北京玉泉营居然之家时发现，由于"毒铅门"的影响，这两家企业的销售量都有所减少，九牧的销售人员称："出事后，九牧总部给各地卖场都下发了检验报告。"

令"四大家族"和水龙头业最不安的，其实是围绕大品牌生长的诸多小微品牌，央视二套《是真的吗？》所提及的星丰洁具与五林卫浴，它们同样来自南安。"这个行业，和中国其他的制造业一样，出问题的多是不具备生产资质的小微企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卫浴专委会秘书长谢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中国有三大水暖生产基地，福建厦门、南安，浙江温州、玉环，广西开平、水口。无论是哪一个，都既有核心大品牌，也有数目众多的小微品牌。谢鑫说："浙江一个镇，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小微卫浴企业就有400多家，没有注册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可能更多。"

大量小微水龙头企业的存在，拉低了整个行业的质量水准。

在浙江玉环，记者拍下了铜制水龙头的原材料生产过程，为了降低成本，大量的电子元件垃圾、铅皮等被加入铜水中，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铜水龙头，其含铅量可想而知。

但整治却不容易：那些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一旦听到风声就会暂时关闭；更重要的是小微水龙头企业对当地经济颇有贡献，一些政府部门面对已经形成规模的小微企业群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谢鑫说："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大品牌的扩张，通过挤占小微企业的生产份额来促其消失"。

何处觅"无铅"

经历"毒铅门"事件后，公众对于铅毒的危害有了更多的关注。

作为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元素，铅在人体内无任何生理功用，其理想的血铅浓度为零。但是，由于环境中铅的普遍存在，绝大多数人体中均存在一定量的铅，在安全线内无虞，一旦超标就会危害神经、造血及消化系统。

消费者开始寻找"无铅"的水龙头，一时间打着"净铅"口号的水龙头产品成为水龙头市场的"新宠"。然而，"无铅"或者"净铅"二字对于国内的铜制水龙头而言却是一个"伪命题"。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试验室主任赵钢，拥有多年水龙头检测的经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受工艺限制，目前水龙头铸造绝大部分采用铜合金，含有59%的铜、40%的锌和1%的其他金属，本身就含有微量的铅元素。而且为了方便精加工和切削，制作过程中还需要加入一定量的铅。"2010年，美国加州推出彻底的低铅法案AB1953，要求'与饮用水接触的水龙头过水表面区域铅含量加权平均值不超过0.25%'。"

可见，即便是对铜制水龙头原材料要求最为严格的美国，完全无铅的水龙头也并不存在。"在国内的水龙头行业，一些大厂商已经开始按照加州的低铅法案生产水龙头，一方面是为了主动提升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这些厂商的生产线也在为国外水龙头企业代工，对方的高标准必须遵守"。

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栏目曾介绍了一种可大为减少铜水龙头铅含量的制作方法，即将制作工艺所需要的铅由铋元素来取代。赵刚则对本刊记者表示，加铋元素尽管可以大幅降低水龙头铅元素的含量，但加铅的黄铜却更适合水龙头的精加工，因为加入铋元素后水龙头材质偏硬容易断裂；更重要的是，铋元素是微量元素，成本较高，企业为保利润一般不会采用，只有一些有出口需要的大品牌才会以铋代铅。

和水龙头材质"门道"一样复杂的是其价格。在本刊记者对北京各大建材城的走访过程中，既见到过标价上万元的德国"高仪"水龙头，也见到过15元一个的"奥斯森"水龙头，而后者是已被北京市工商检测部门检测出铅含量超标的不合格产品。

赵钢介绍，昂贵的水龙头多是国外企业在本土生产的高端产品，更多的是品牌效应的附加值；低价的水龙头则根本不能保证材质，建材城的经销人员也明确告诉本刊记者：低价水龙头多是锌合金材质，而锌合金的含铅量和铅析出量根本不适合用作制造水龙头。

"可以说，按照目前的铜价（3.8万元/吨～4万元/吨，一个约1.5公斤重的

面盆龙头，如果价格低于150元，其质量基本就失去了保证”，一位水龙头业的资深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契机与隐忧

水龙头“含铅门”在某个意义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赵钢看来，该事件会极大地推动水龙头行业新国标的出台，而他已为此努力了近10年。“不得不说，水龙头铅超标频发和现有标准的缺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水龙头行业，对生产厂商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分别是国标《陶瓷片密封水龙头》(GB18145–2003)与行标《水龙头通用技术条件》(QB 1334–2004)。然而，前者只对水龙头的外观质量、使用性能等作出了规定，对铅等有害物质的限量并未作出规定，后者也是如此。

而对铅含量和析出量有明确要求的标准却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属于推荐性标准，分别是国标《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1998)，要求铅的限量≤0.005mg/L(毫克每升)；与建材行业推荐性行标《水龙头铅析出限量》(JC/T 1043–2007)规定铅析出浓度不高于0.011mg/L。“这两个推荐性标准，目前执行得并不好。而且，两个推荐性标准对铅含量的数据规定也并不一致”，不强制与不一致给了生产厂商许多的借口，特别是对于从事水龙头生产的小微厂商而言，几无约束力。



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披露，乐家品牌铅析出量为173微克/升，超标34倍多

东方IC/CFP

2003年，赵钢所在的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就曾想过要把水龙头含铅量写入国家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09年再提此事时，许多厂商又质疑“为何只限制铅”，“去年的水龙头铅超标事件，加速了新国标的出台。”

对于谢鑫而言，“含铅门”则意味着一次行业洗牌正悄悄酝酿。一旦新国标出台，一个水龙头产品的成本将会提高30%左右，水龙头行业内靠低价抢占市场的低端品牌将彻底失去生产资质，优势品牌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必然会提高产品质量与自我检测，水龙头行业的升级将和洗牌一起到来。

契机的出现，并不能抹去仍然存在的隐忧。

“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足够重视，但水龙头中还含有锌、锰、铬、镍等其他重金属元素，它们的析出量一直以来也没有国家标准的约束”。这其中，铬元素超标问题已经有所显现，在央视二套《是真的吗？》栏目中，苏泊尔生产的一款不锈钢水龙头就被检测出六价铬超标，“今年有望出台的《陶瓷片密封水龙头》新国标，对各种材质水龙头中的铅、铬、镍、锰、镉等重金属限制量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没出台之前，普通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应当更为全面。”

自来水运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每一个环节与部件的达标和安全都决定了饮用水的最终结果。水龙头只是终端放水装置，大部分的水存在于阀门和管道中，但在目前，阀门和水表的制造却多采用杂铜，且无人监管，“如果管道材质是铸铁，重金属超标会更加严重。”而在欧洲，政府部门对饮水安全采用的是系统监控，其对水龙头、阀门、管道均有相应的重金属和微生物标准。一位曾从事水管销售的工作人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销售的水管管材更多地看重能否通过国家对压力标准的设定，在材质上一直都没有特别要求。

如此一来，水龙头之于水是最后一关，但对于国内饮用水安全而言，还未出台的新国标与轰轰烈烈的“含铅门”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东



北京朝阳区执法人员在水站制假现场发现了制假机器

《瞭望东方周刊》水安全系列报道之三

北京"水站"黑幕

黑水站众多、假水泛滥，北京近万个水站中，黑水站的数目已经占到水站总数的40%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元元 | 北京报道

王军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一家水站的负责人，属于最早经营水站的一批人。

"2002 年我刚开始做水站时，桶装水的消费量比较小，市场也很规范。"王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消费量是变大了，但市场也变乱了。"

比如，黑水站众多、假水泛滥，近万个水站中，黑水站的数目已经占到水站总数的 40% 左右。

"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行业将会越来越乱。"王军说。

二次污染势所难免

"因为相关部门在水站经营场所的环境、地理位置等硬件设施上并无明确要求，所以水站选址都较为随意。"北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市桶装水协会"）副会长袁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于是，水站很少考虑桶装水对于存储环境的要求。

为了缩短送水时间，多数水站会选择靠近住宅区或者写字楼的地方作为站点。但是，这种地区往往租金昂贵。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选择同区域内远离街道的胡同或者地下室。

王军的水站就位于一个胡同内，距离巷口 700 米左右。尽管位于东二环附近，但房

租只有临街商铺的60%，每月可节省近2000元。和王军相比，吴亮的水站就显得寒酸许多。

吴亮经营的水站在海淀区苏州桥附近小区的一个地下室。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1200元，比临街商铺便宜一半。

与此相关的是存储环境。据袁军介绍，目前北京最大的水站面积在70平方米左右，最小的只有8平方米。但是按照正常的水站经营情况核算，即使一个日销售量100桶的小规模水站营业面积也不应低于15平方米。

"外面地大，又没人管，还不用交房租。"吴亮说。在本刊记者走访的10余家水站中，都存在桶装水存放在室外的情况。在吴亮的水站，所有的桶装水高低错落地存放在地下室入口外的狭窄区域。"地下室太潮了，外面有阳光，比较干燥。"

但"适温保存或者冷藏、禁高温暴晒"一直都是桶装水存储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生产厂商在桶的包装外壁上明确标识的。

室外的高温暴晒极易造成水内细菌的滋生以及制桶材质内有毒有害物质的挥发，导致水质的变化。并且随着高温环境下存放时间的增加，水内细菌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参见本刊上期报道《"桶装水二次污染"多系人为》）

同时，室外环境中大量活跃的细菌也容易附着在水桶的封口处，在饮用过程中融入水中。

室内环境更加糟糕。很多水站的经营场所既是办公室又是厨房和餐厅，甚至是卧室。不仅存放有空桶、桶装水，还有办公桌、厨具等生活用品，极易造成二次污染。

在一些没有合法资质的地下水站，经营环境更加恶劣。

室内卫生条件不达标、室外存放环境不合格已是北京水站业普遍问题。

正规水站仅六成

按照北京市桶装水协会制定的标准，衡量一家水站是否正规主要依据三个指标，分别是经营场所、营业执照以及销售代理合同。

北京市桶装水协会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共有规模不一的水站近万个，其中正规水站仅占50%~60%。

即使是这些数目的正规水站，生存也不容易。

水站前期的注册手续不少。除了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外，还需申请办理食品（卫生）流通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以及税务登记证。如果是以公司形式注册，还需办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建成之后，仍会有很多预算之外的支出。在东城区东直门附近经营水站的张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正常支出成本外，我每年还需要参加工会、街道办、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必须出钱的。"每年单这一项支出就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厂家对于桶装水市场售价的硬性规定，也使水站丧失了掌控价格浮动的主动权。

张志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雀巢18.9升天然矿泉水为例，其市场统一售价为23元，水站进价为12元，除去房租、工人劳务成本、交通工具损耗以及17%的企业增值税，利润仅在2~3元之间。

按照目前每天200桶左右的销售量，张志的水站每天净利润仅在400~600元，每月的利润也就在14000元左右。即使是经营了12年之久的王军，水站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利润并不比张志多。

相比产品固定的市场进价和售价，水站在硬件设施、人力成本上的投入成本则逐年增加。这让经营者苦不堪言。

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劣更是加剧了正规水站的经营困难。目前，北京市场上黑水站众多、假水泛滥，市场基本处于无序竞争状态。"黑水站投入少，利润大，并且卖的都是假水，价格便宜。"张志感慨，黑水站正在不断侵蚀市场，挤占正规水站的生存范围。

2013年，张志在某写字楼的一个大客户，就因为黑水站的水比自家便宜了3块钱，而取消了订购。

对于这些正规水站经营者来说，干点卖水之外的副业是必须的。"单指望卖水是不够的，得为长远打算。"吴亮说，如果2年内水站的利润仍没有大的提升，他就会转行。

现在，吴亮的水站除了卖水外，还代卖饮水机和饮料。张志的水站还做起了电脑维修的生意。

"守法经营，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王军说。

黑水站生存之道

所谓黑水站，就是指没有正规经营场所、合法营业执照以及代销合同，专卖假水的"地下"水站。

目前，黑水站的数目已经占到水站总数的40%左右。"这只是一个粗略估计，肯定还存在一些没有发现的，真实的数量应该比这个还要多。"袁军说。

据袁军介绍，在东三环国贸以东、四惠以西、双井以北、大望桥以南的四方区域内，正规登记的水站仅有30多家，但黑水站的数目则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另一位业内知情人士何园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在东直门内大街以南、东四十条以北、东四北大街以东、东直门南小街以西的四方区域内约有20余家水站，其中黑水站约10余家，占二分之一。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和远郊地区，黑水站的数目更难估算。

无一例外，隐秘性是黑水站具有的共性。和正规水站标有显著的门牌和地址不同，黑水站都刻意隐藏自己的位置。黑暗的地下室、狭窄的胡同四合院以及大门紧闭的自建房都是这类水站中意的选址。

在何园的指引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海淀区长春桥路南的厂洼小区内，找到了一家黑水站。

该水站位于小区12号楼的地下室，除了路边摆放的十几桶水外，无任何显著标志。地下室设有门禁，出入者必须用钥匙刷卡才能进入。在本刊记者蹲守的半天时间内，地下室的门只被送水工打开过两次。每次进入地下室时，送水工总会警惕地四处张望，确认无人后方才进入。

"小区里很多人知道这是个假水站，从不在这买水。"该小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户告诉本刊记者。

黑水站泛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利润巨大。何园的前同事余辉从2007年开始经营一家黑水站。余辉介绍说，一桶18.9升的雀巢矿泉水真品成本价是12元，假水成本

CFP

价仅为3元。在一些自产假水的黑水站，一桶水的成本价甚至只有2元。

“黑水站一桶水的利润是正规水站的5倍，甚至更多。”何园说。上述提到的雀巢桶装矿泉水，在余辉的水站每桶售价在19~21元不等。而黑水站除去水的成本价3元以及房租、交通工具损耗等费用，净利润在15元左右，恰好是正规水站利润的5倍。

以这家黑水站每天50桶的销量来算，余辉一天净利润至少在750元。而这一利润额需要张志的水站至少卖出250桶水。“黑水站的水是假水按照真水的价格卖，还能随着消费者的意愿下降，反正多少都是利润。”张志说。

另一个导致黑水站泛滥的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安全意识薄弱。

“很多消费者想当然地认为桶装水是个暴利行业，一味压低购买价格，导致很多假水的流入。”袁军说。

目前，各大水站的消费大户基本都是公司等公共单位。这类消费群体为了面子希望饮用大品牌的桶装水，又不想以高价购买真品，最终导致假水钻了空子。

一次，当王军把饮用假水的事实告诉某公司负责订购桶装水的财务人员时，对方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反唇相讥：“你不能因为不定你的水就诬赖别人的是假水，再说，喝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出任何问题。”

本刊记者走访的多个水站负责人也反馈说：消费者在选择桶装水时甚少顾及水质，只看价格。

“没人买，就没人卖；没人卖，就没人生产。这是一个利益链条。黑水站能生存下去，消费者也‘功不可没’。”袁军说。

厂家与水站的默契

假水泛滥已经成为桶装水行业人尽皆知的秘密。

在北京东三环的国贸、建国门等高端写字楼比较集中的区域，桶装假水更是泛滥成灾，几乎每栋楼都有假水的存在。

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2013年报道，在国贸附近的和乔大厦内，有30%左右的商户订购的是假水。

这一情况也曾引起各品牌生产商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不了了之。

据袁军介绍，位于北京南三环与南四环之间的木樨园服装城一带，售卖的娃哈哈桶装水超过80%都是假水。

该地区一家水站的负责人杨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几年前，娃哈哈曾对这一地区的假水进行过突击调查，并要求商户不要再卖假水，但是大多数商户不以为然。

随后，为了打假，娃哈哈销售人员公开告知众多购买商户其饮用的是假桶装水，但这并没有改变假水在这一地区的横行。“后来，他们自己就啥也不说了，直接走了。”杨华说。

诸如雀巢、屈臣氏、燕京、乐百氏等北京市场桶装假水比较集中的品牌都大张旗鼓地进行过打假行动，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越打越多之势。

“我们本身并没有执法权，最多是向工商部门举报，但是轻微的处理并不能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某品牌客户经理张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厂家在假水问题上一直都是有心无力。

不过，这点在袁军看来纯属借口。“厂家并不是抱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来处理事件，反而是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为。”



已被查封的北京朝阳区一个制造假冒矿泉水的窝点

2012年，北京市桶装水协会曾在朝阳区发现一处制作假水的窝点，并及时联系警方和工商部门进行查处。但在案件后期的取证过程中，某品牌厂家却多次以没时间为由拒绝出面作证。

假水在市场上的风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的供给不足，导致水站供不应求，转而以假水代替。目前在北京市场销量靠前的大品牌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前几年，在销售旺季的时候确实出现过供不应求的现象。”娃哈哈客户经理李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有些客户就只认某一个品牌的水，如果你说没有，人家就转向别家了。为了留住客户，那就只能用假水冒充了。”杨华说。

这一说法在张乐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为了维护市场地位，品牌厂商对于水站的售假行为大多“睁只眼闭只眼”。在他们看来，假水和市场相比，后者更重要。

“即使是假水，也是我的品牌假水，也代表着我的市场占有率。”是某些品牌厂商的内心想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下，假水不仅成为它们维护品牌市场地位的一种手段，更能给对手造成心理震慑，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强势。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品牌厂家的销售人员在了解哪家水站卖假水后，不去制止，反倒祈求水站购买一定量的真水，掺杂出售。

更甚者，一些厂家将假水泛滥看做是“家丑”，为了维护自身的品牌形象，选择避而不谈。“他们（品牌厂家）觉得说多了会让消费者产生误区，以为这个牌子的水都是假的，不利于产品的销售。”何园说。

甚至在一些正规水站，品牌厂商对于卖假水的情况也故意视而不见。双方甚至达成一种默契：可以卖这个品牌的假水，但也要买这个品牌的真水。

如今，多数品牌厂家对于桶装假水的态度已由积极打假变为消极默认，甚至是默许。乐

（文中部分水站老板为化名）



银行迎战余额宝

与民生、兴业等银行相比，招行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方面，显得左右为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祁和忠 | 上海报道

余额宝及类余额宝们攻城略地，互联网金融产品遍地开花。

2 月 27 日，天弘基金宣布，余额宝用户数量突破 8100 万，与 1 月 15 日的 4900 万相比，增加了 3200 万。据称，余额宝资产规模已达 5000 亿元。

与此同时，微信理财通、华夏活期宝也在快速增长。3 月 11 日，华夏基金的总资产规模已达 3600 亿元，2014 年以来增长了 1600 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货币基金。

京东在 3 月上旬宣布将推出类余额宝产品“小金库”，首批上线嘉实基金的“活钱包”和鹏华基金的“增值宝”。

面对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各大银行反应不一：一些银行高管对余额宝口诛笔伐，要求加强对余额宝的监管；另一些银行则在加快推出自身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以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2 月 28 日，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正式对外提供服务，首期推出了三款产品：如意宝、随心存、轻松汇。其中，如意宝由民生直销银行与民生加银基金、汇添富基金合作推出，分别挂钩民生加银与汇添富旗下的现金宝货币基金。

继民生银行之后，3 月 10 日，兴业银行的掌柜钱包上线，对接兴全添利宝货币基金。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与肯定。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浦发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丁蔚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传统银行业已经身处于一个由互联网技术驾驭的重塑金融生态的时代，银行必须主动作出改变、拥抱变革，用一种平等开放的互联网精神重塑银行的产品

东方 IC

和服务，成为自由与便捷的新金融的缔造者。”

民生银行领衔创新

近几年来，民生银行分别在小微业务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成为领跑者，但在零售业务领域仍落后于招行。以个人活期存款余额为例，民生银行仅及招商银行的约1/5。

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民生银行克服营业网点的劣势，为零售业务领域的赶超提供了可能。2013年7月，民生银行直销银行启动，2014年2月28日正式上线，这7个月中完成了三件事：一是成立了直销银行二级部，明确了经营思路与内部关系；二是完成了网站、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系统渠道建设以及如意宝、随心存、轻松汇等产品的开发；三是加强三方合作，与基金公司、电信运营商、电商公司开展跨界合作。

与余额宝类似，民生直销银行的重点产品如意宝十分重视客户体验，提供网站、手机APP、微信等渠道7×24小时服务。客户签约如意宝后，系统自动将电子账户内的活期余额定时批量向汇添富或民生加银基金公司发起现金宝货币基金申购交易。该产品具有自动申购、1分钱起购、按需实时赎回、日日兑付收益等特点。

如意宝分别对接汇添富现金宝、民生现金宝。其中，汇添富现金宝成立于2013年9月12日，由明星基金经理曾刚管理，成立后大部分时间的7日年化收益率保持在5%以上，2014年初曾经一度高达6.7%，2月底以来跌破6%；民生现金宝成立于2013年10月18日，基金经理乐瑞祺，成立以来收益率波动较大，2013年底至2014年初曾经一度超过7%，2月下旬以来跌破6%。

截至2013年底，汇添富现金宝与民生现金宝的规模分别为120.72亿份、6.53亿份。

在股份制银行中，浦发银行对于互联网金融也高度重视，2013年首家推出NFC手机支付产品。丁蔚说：“余额宝、理财通的发展给商业银行新的启示。一是商业银行应主动适应互联网金融趋势，转变经营思维，利用新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二是商业银行可借助互联网摆脱网点服务半径制约，以最小的成本获取到大数量的客户。三是商业银行积累了丰富的风险经营经验，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和品牌，这是商业银行独特的竞争优势。”

招商银行亦步亦趋

与民生、兴业等银行相比，招行在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方面，显得左右为难。迄今，招行没有出现推出类似于民生银行如意宝或兴业银行掌上钱包的消息。

招行早年凭借一卡通等业务，吸引了大量年轻客户，确立了在零售业务领域的优势。利息率相对较低的大量个人存款，降低了招行的负债成本。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招行零售业务受到较大负面影响，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加大。

2月15日，招商银行公布2013年度业绩快报：2013年底，招商银行的客户存款总额为2.77万亿元。这与3季度末的2.8万亿元相比，出现1%的环比负增长，这引起很多投资者的关注。

平安证券的励雅敏、黄耀锋与王宇轩三位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泛资管业务的不断融合，类似于余额宝等T+0货币基金、P2P、众筹等新型投资模式的兴起，对银行储蓄存款造成巨大的分流压力。由于招行拥有上市股份制银行中最高的储蓄存款占比，以及其相对年轻的客户群体，导致其在2013年的储蓄存款增长低于预期。

不过，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上，招行并非无所作为。2014年2月，招行小企业E家重新上线，通过信息见证服务，实现资金供给和需求者间对称的信息、资金交互。招商银行作为信息提供方不对融资项目、融资人归还本息承担任何形式的担保、保证责任。同时，为保障投资人权益，招商银行对融资人及融资项目开展线下的尽职调查工作，进行风险评估。

招行小企业E家与平安陆金所的网络投融资平台类似，不同的是陆金所由平安担保提供全额本息担保，且最近的最高预期收益率为8.61%，而小企业E家没有担保或保证，且最近的最高预期收益率大多在6.5%附近，比陆金所要低一些。

鲶鱼效应初步显现

在2012年之前，货币基金的销售主要依赖银行；2013年以来，货币基金借助于互联网直销渠道，井喷式增长，成为倒逼银行进行改革的鲶鱼。

专业人士预测，货币基金规模对存款的替代仍将持续。

据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邱冠华等人的研究，历史上美国货币基金的资产规模与银行活期存款（个人+企业）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在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阶段（1970–1986年），美国货币基金与活期存款之比从1973年的0.1%上升至1986年的63%；在1986年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美国货币基金对活期存款的替代速度放缓但并未停止，1989年末货币基金规模首次超过活期存款。

目前，除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外，工行、中行、交行、浦发、广发等也都加大了对类余额宝产品的开发力度，相当于把理财产品的购买门槛由过去的5万元降低至1元甚至1分，且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流动性，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惠及广大普通储户。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现在反对余额宝是很正常的。但从长期来说，银行不可能永远躺在央行规定的利差上挣钱，早一天变革，就早一天争取到了主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陈龙撰文说。在货币基金浪潮的挤压下，银行将被迫更关注中小客户，谋求金融创新。这对银行管理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而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自我革命。

这正是中国金融改革想要追求的结果。

3月10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北京表示，经过反复论证和筛选，并报国务院同意，目前已确定5个民营银行试点方案，阿里、腾讯等将参与试点工作。

广发证券分析师沐华认为，长远看，互联网企业与银行之间有望走向产品合作开发、互利共赢模式。

市场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不少人的预期。3月11日，阿里金融宣布，国内首张网络信用卡将在支付宝钱包内亮相，这张由中信银行发放的网络信用卡首批将发行100万张，将可用于所有在线消费。消费者在支付宝钱包内透过公众号在线即时申请、即时获准，并支持消费者摆脱实体卡的束缚。



中本聪

“比特币之父”到底是谁

这位头发蓬乱、衣着朴素、住普通房子开普通汽车、从十几岁时就酷爱收藏火车模型——中本聪先生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老年技术宅”，他到底是不是传说中坐拥价值4亿美元虚拟资产的“比特币之父”

文 | 陆登

比特币，自2009年诞生以来渐成风潮，席卷全球，但其创始人究竟是谁，却一直是个谜。

有媒体曾报道说，一个名为“中本聪”的就是“比特币之父”，但“中本聪”究竟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是真名还是化名？是确有其人还是一个团队？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近日，美国知名时事周刊《新闻周刊》在其官网发布一篇揭秘“比特币之父”的报道——《比特币背后的面孔》。文章称“比特币之父”的确就是中本聪，他全名叫多利安·普伦蒂斯·中本聪，是一名64岁的日裔美籍工程师，目前就居住在洛杉矶坦普尔市的一栋普通民宅里。

文章一出，立即引发关注。连日来，中本聪家的电话被打爆了，家门口也围堵着各路记者，从不少现场拍摄的他的照片来看，传说中的坐拥数亿美元财富的“比特币之父”不是天才少年，竟然是一个老头儿，甚至还有点邋遢。

东方IC/漫画：大尸凶

他就是中本聪

《新闻周刊》这篇关于“比特币之父”中本聪的报道是由自由撰稿人莉亚·麦格拉斯·古德曼采写的。

古德曼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从中本聪这个名字着手，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署中的档案记录，并且采访了中本聪的很多亲人和一些程序员，她根据这个中本聪的受教育经历、职业、反政府的倾向，以及与比特币创始人相似的写作风格，逐步认定他就是比特币的创始人。

中本聪1949年出生于日本的别府，10岁时跟随母亲移民到美国加州。根据美国洛杉矶地方法院1973年的档案，在他23岁从加利福尼亚州立工业大学毕业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多利安·普伦蒂斯·中本聪(Dorian Prentice Satoshi Nakamoto)，从那时起的40多年时间里，他没再使用过“聪”这个名字，而用多利安·中本(Dorian S. Nakamoto)作为签名。

大学毕业后，中本聪曾经供职于美国空军的供货商休斯飞机公司，从事军事防御和电子通讯方面的工作。不久，中本聪就离开了休斯公司，来到美国无线电公司担任系统工程师。此后，又在多家通信和技术类公司做过电脑工程师，但他的工作经历都很神秘，“没法多说”。从2002年起，中本聪没有固定工作。

中本聪有过两次婚姻，育有6个孩子。目前，单身的中本聪和母亲一起居住。事实上，中本聪的家人和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身边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比特币之父”，在他们看来，中本聪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沉默寡言、极端聪明、情绪化、很看重个人隐私的男人。

中本聪的女儿艾琳·米切尔说，成长过程中，父亲教育她“不要受政府控制”。

中本聪的两个弟弟也从事科学研究，弟弟中本阿瑟（音译）说：“他是个极聪明的家伙，非常专注，思考问题不拘一格。智能化、数学、工程、计算机，凡是你能说出来的，他就能做到。”

据报道称，古德曼为揭秘“比特币之父”早前就和中本聪有过邮件往来，但当古德曼跟他提到比特币时，邮件往来就终止了。此后，古德曼决定去中本聪的住所面对面采访，但中本聪不仅没有开门，还叫来了警察。在警察的见证下，古德曼与中本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古德曼在报道中称，中本聪表示，他与

希瑟·福尔摩斯

美国美女记者希瑟·福尔摩斯在奥克兰市进行现场连线播报时，突然一股鼻涕流出。福尔摩斯在说完话后，迅速用嘴接住自己的鼻涕并吞下。

敬业的人总要吞下不少常人难以咽下的东西。

遛狗夫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对中年夫妇带狗在散步时，发现一个生锈的铁罐，铁罐内藏着一批几乎全新的19世纪美国金币，估值总计1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127万元）。


汪星人立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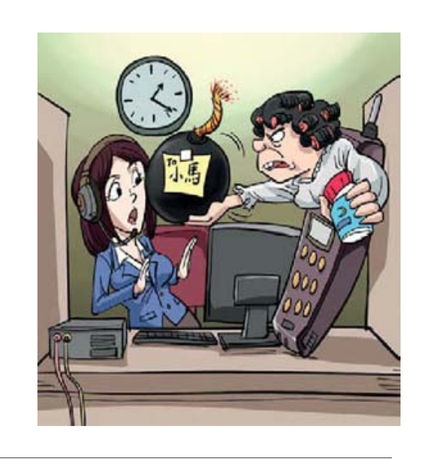
赵本山



近日，网络上有关“政协委员赵本山已移民国外”的消息，再度流传。赵本山回应说：“如果有媒体非要说我移民的话，那我就只好说，我会从沈阳移民到莲花村。我不会移民到海外。”

大叔都给气得移民村里了，这下大家满足了吧！

杜姓妇人



60岁的杜姓妇人因对政局不满，半夜睡不着，打台北市民服务电话宣泄情绪，扬言要炸掉马英九办公室。警方侦讯后将其依恐吓维安罪名函送法办。

大妈，失眠是病，不能放弃治疗啊。

比特币已经没有关联了，比特币已经被转让给其他人。

从这番辩解的话来看，中本聪确实跟比特币“有过”关联。

否认自己是“比特币之父”

当大批媒体被吸引来后，中本聪却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他与比特币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希望找到一名会说日语的记者给他一份免费午餐。

据悉，当时一名美联社的记者答应了他的要求，两人在大批记者的尾随下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寿司店。随后两人离开寿司店，前往美联社洛杉矶办公室接受了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根据美联社2014年3月6日晚发表的文章披露，中本聪在专访中声称，他与比特币没有任何关系，他在三周前才从儿子那里第一次听说比特币。

次日凌晨，网络上的那个已沉寂数年的“中本聪”再次现身，在“P2P基金会”的网站上发表了一条评论：“我不是多利安·中本。”

随后，《新闻周刊》再次发文力挺《比特币背后的面孔》一文的作者古德曼，声称古德曼的调查过程符合《新闻周刊》80多年来的职业道德标准。

3月7日晚，一些比特币爱好者由于同情中本聪当下遭遇的困境，发起了对他的捐款，目前已募集超过36个比特币（价值约2万美元）。

事情似乎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这位头发蓬乱、衣着朴素、住普通房子开普通汽车、从十几岁时就酷爱收藏火车模型——中本聪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老年技术宅”，他到底是不是传说中坐拥价值4亿美元虚拟资产的“比特币之父”？

非营利性组织比特币基金会成员Jeff Garzik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中本聪的身份也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也许永远是个迷……大家对中本聪的身份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透露信息时请负责任地三思而后行，请考虑到信息泄露可能造成的危险。”

不过，《连线》杂志网站却指出，比特币圈内人士们之所以众口一词地反对《新闻周刊》、否认中本先生是“比特币之父”的背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并不需要一位实际的“领袖”。就比如，两年前一位网名“Myrtlewood”的比特币爱好者写道：“我希望我们永远找不出中本聪是谁。人都有弱点，但思想却是刀枪不入的。”这句话或许也代表了很多比特币圈内人士的想法。

他们是“中本聪”么？

2008年11月1日，一个自称“中本聪”的人在一个隐秘的密码学评论组上贴出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陈述了他对电子货币的新设想。10天后，sourceforge.net上出现了一个叫“比特币”的项目。

2009年1月3日，第一枚比特币诞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本聪”和比特币一起成为被“挖掘”的对象,大部分人认为“中本聪”就是比特币的创始人，但他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却不得而知。“中本聪”在互联网加密货币论坛活跃了一两年后，突然销声匿迹，许多人做了大量尝试，试图挖出“中本聪”的真身，却一直没有收获。

2013年5月，知名计算机科学家、“超文本”概念创造者特德·尼尔森曾在Youtube上曝料称，化名“中本聪”的比特币创始人的真实身份，就是日本京都大学数学教授望月新一。

望月新一2013年因为证明“ABC猜想”而名声大噪。他高中时就读于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后者是美国最具声望的高中之一，仅仅两年后就毕业；16岁望月新一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2岁博士毕业，33岁就被评为教授。

尼尔森之所以认定望月新一是“比特币之父”基于三个原因：一、望月新一足够聪明可以开发出比特币；二、望月新一并不使用传统科学同行评审机制，他习惯于发表，让其他数学家探索其中奥妙；三、比特币符合望月新一的水准。

尼尔森的论断显然缺乏实质性证据，视频上传后，立即遭到质疑，比如，望月新一只是一名纯粹的数学家，怎么能开发出这样一个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货币系统呢？一些人在分析了望月新一此前所发表的各种学术作品后发现，这一领域同他以往所研究的学术范畴并不吻合。除此之外，望月新一本人对密码学也并不感兴趣。

2013年底，又一次传出关于“中本聪”是谁的文章。Wordpress站点“如在镜中（Like In A Mirror）”一位匿名博主发布博文，通过对比“中本聪”论文中的行文方式进行分析，指出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克·萨博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中本聪”。

博文称：“根据对内容的反向调查，比特币白皮书的内容将我引向了尼克的博客。这一结果和之前外界掌握的信息毫无联系。我必须强调一下：在整个互联网上，对比特币白皮书相似文本进行了广泛、公正的调查后，尼克的文章成为最为匹配的候选。”

但萨博本人却向《连线》杂志否认了这一猜测。

什么是比特币

2月28日，世界最大规模的比特币交易所运营商Mt.Gox因交易平台的85万个比特币被盗一空，宣布关闭。几天后，一家比特币银行Flexcoin也因遭黑客盗领洗劫宣布关门。

相继出现的坏消息对于刚刚诞生5年的比特币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而在2013年就有一项关于比特币交易平台的调查显示，约45%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已倒闭，未倒闭的虽然是交易量很大的平台，但遭到的网络攻击也非常多。

究竟什么是比特币？简单来说，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电子货币，是没有“央行”这个角色也能发行并流通的货币。

根据“中本聪”对比特币技术原理的描述，比特币是基于一套密码编码、通过复杂算法产生；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并运行比特币软件而参与制造比特币；比特币利用电子签名的方式来实现流通，通过P2P网络来核查重复消费。到2140年之前，比特币的总量为2100万个，如果有需要，每个比特币还可以切割为10的8次方份，所以不会出现因总量不够通货紧缩的情况。

不仅如此，比特币还可以用来套现，兑换成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可以购买一些虚拟的物品，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帽子、装

漫画：大尸凶

备等，也可以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

还有一点，人们可以用电脑产生比特币，只需运行比特币软件，就可以参与比特币的制造，这种方式被称为“挖矿”。2009 年 1 月 3 日，“中本聪”成为挖到比特币的第一人 —— 他从创世区挖到 50 枚比特币。

作为一个新鲜事物，比特币诞生后逐渐风靡全球，价值也从一开始的“不值钱”暴涨上千倍。2013 年，1 个比特币达到 266 美元的高点，逐利者越来越多，但比特币的行情却总是如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巨大。

对于比特币，各国政府的态度也不一致。

扮演急先锋的是德国。2013 年 6 月底，德国议会决定持有比特币一年以上将予以免税后，比特币被德国财政部认定为“记账单位”，这意味着比特币在德国已被视为合法货币，并且可以用来交税和从事贸易活动。

在澳大利亚，多个商家表示愿意接受比特币支付，甚至一家众筹网站也接受比特币筹款。“比特币”甚至成为 2013 年澳大利亚年度词汇候选词。

但美国财政部却在 2013 年发布一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关于虚拟货币的文件》，指出“虚拟货币在司法权上不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美国监管部门也出台一项裁定：所有兑换或转让虚拟货币的企业都属于“货币服务商”，必须向政府注册，还要做好反洗钱检查安排。

最近，日本政府正在制定比特币交易规则，以加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监管。日本监管当局不承认比特币是“货币”，计划把比特币交易列入类似贵金属品类的交易，并拟对交易收益征税。

在中国，比特币连遭两次重大打击。先是央行联合有关部委出台《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提供比特币等级和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并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对用户身份进行识别、报告可疑交易。接着，央行约谈银行、支付宝和财付通等相关负责人，明确要求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给比特币等交易网站提供支付和清算服务。东

（本文信息来源：美国《新闻周刊》、腾讯科技、腾讯财经、凤凰科技、网易财经、搜狐 IT 等）



威廉姆斯

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家殡仪馆正准备火葬一名已宣布死亡的男子沃尔特·威廉姆斯时，这名男子却自行从袋子中爬出。原来他装的心脏起搏器暂时“罢工”，随着起搏器复工，又活过来了。

把心交给机器，难免受惊吓。



雷维亚

西班牙议员雷维亚在政治辩论会时，正盯着杂志上裸女图片看，被当地媒体抓个现行。他称自己只是在浏览杂志页面，寻找有关马德里储蓄银行的文章，而图片只是国家新闻一部分。



难道是杂志社把关不严？





周星驰

近年来，周星驰不断被传出炒股，投资房产、网络游戏，收购影院，进入上市公司等。保守估计，这位喜剧之王的财富已经超过 15 亿港元（约等于 13 亿人民币）。

星爷变身财神爷。

许钦松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近日在中国热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表示：“韩剧热潮，已经不仅是韩剧的问题了，这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

外星来的都敏俊伤害了所有地球人的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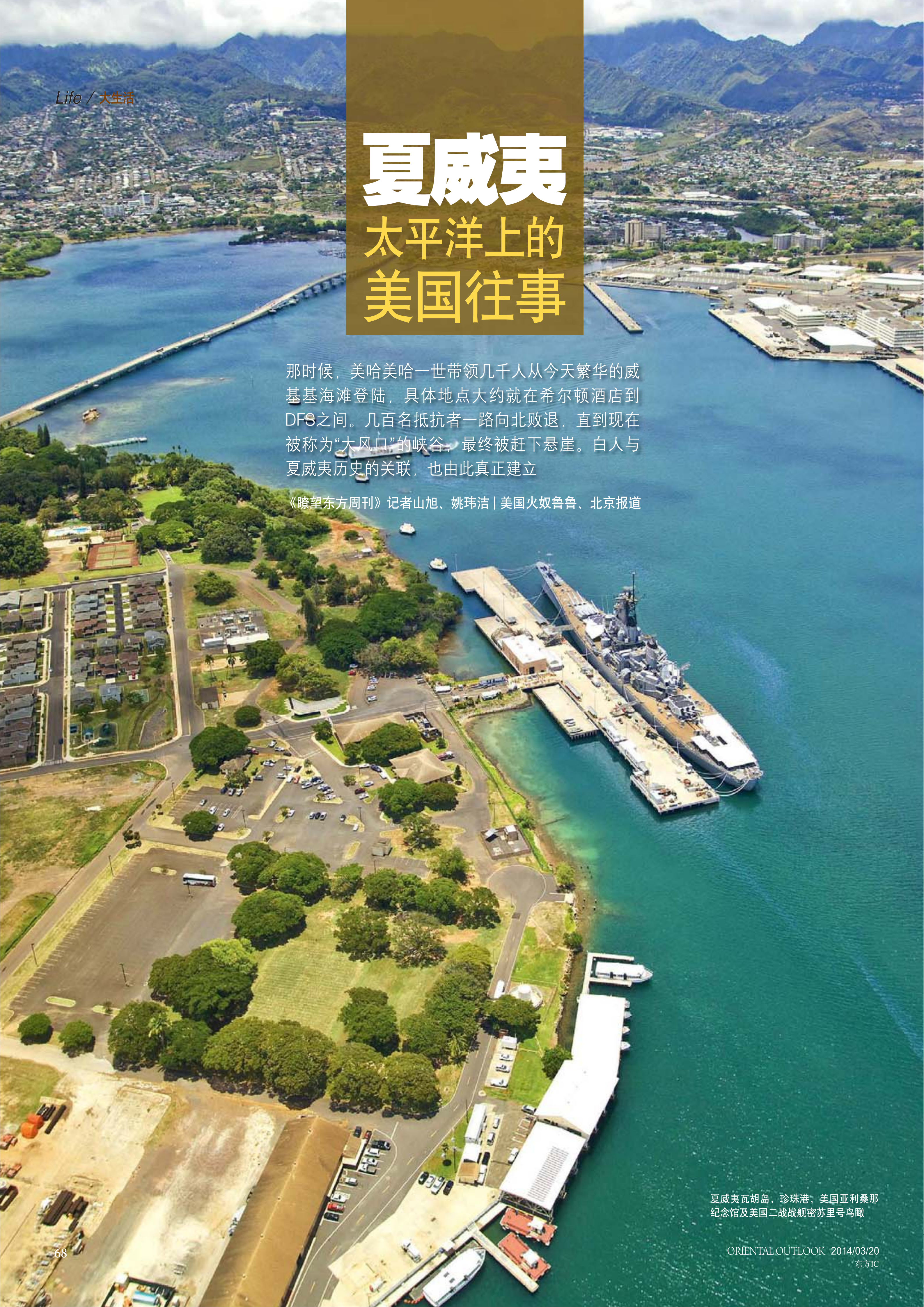


夏威夷

太平洋上的美国往事

那时候，美哈美哈一世带领几千人从今天繁华的威基基海滩登陆，具体地点大约就在希尔顿酒店到DFS之间。几百名抵抗者一路向北败退，直到现在被称为“大风口”的峡谷，最终被赶下悬崖。白人与夏威夷历史的关联，也由此真正建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姚玮洁 | 美国火奴鲁鲁、北京报道



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美国亚利桑那纪念馆及美国二战战舰密苏里号鸟瞰

东方IC

中国人距离夏威夷——太平洋的珍珠，似乎越来越近了。

从2014年起，每周有三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北京直飞夏威夷。由于更加便捷的交通，夏威夷旅游局预计这一年中国游客将增长50%。

阳光、沙滩、座头鲸和火山以及其他，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真正了解太平洋的地方。

众所周知，中国人头脑中的海洋，大多是指西太平洋一连串岛屿构筑的半闭合海域。而由此向东，在被称为"蓝水"的世界里，还极少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在过去几十年间，太平洋被称为"美国人的海洋"。"夏威夷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夏威夷太平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道格拉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除了作为著名度假地，夏威夷也反映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海洋国家的兴起之路。

"中南太平洋海盆"中的三个文化圈

在北京飞往夏威夷的航班上，中国游客会讨论一些有关中国和夏威夷的问题。除了曾在夏威夷避难的孙中山和最终葬于那里的张学良，还有"夏威夷本来属于中国"这样有趣的话题。

对于夏威夷原住民来自何处，科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包括他们的祖先可能居住在中国台湾。只是在中国人不多的远洋记录中，确实没有对这一海域的发现。

与环太平洋自大陆碎裂的岛屿不同，夏威夷群岛——由130多个大小岛组成——是大洋扩张的结果。

地壳从大洋中部隆起造成了复杂的断裂区，海底岩浆经常垂直向上，突破洋面，造成火山岛。而在单个喷射点上，地壳的横向运动最终造成了群岛。

如今从夏威夷州政府所在的瓦胡岛乘内陆飞机到最大的夏威夷岛，既可以漫步于6个月前刚凝固的熔岩流上，也可以乘坐直升机观看仍然活跃的火山口。

更为重要的是，海洋的恩赐使这些岛屿拥有多雨气候和火山灰造就的肥沃土壤。它们分布在名为"中南太平洋海盆"的庞大区域里，人群安居其上。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块相当于半个太平洋的区域无疑过于遥远。它的西部边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马里亚纳、加罗林，自菲律宾向西航行还要上千公里。

海盆的南部边界是另一些相对陌生的名字：澳大利亚东面的新西兰、斐济、汤加、塔希提。夏威夷在东北边，它其实也是全球距离大陆最远的群岛。

太平洋无比浩瀚，对于亚洲国家而言，穿越"中南太平洋海盆"甚至接近它，都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挑战。所以古代西方的商船选择沿印度洋北岸经中南半岛抵达中国。于是，当郑和在1433年结束最后一次远航时，中国人还没有一次真正向东驶入中南太平洋。

由于难以通航造成的与世隔绝，夏威夷也保留有数千种独有的植物。而太平洋人民，除了以胖为美，也很少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生活在"中南太平洋海盆"的这些人们分为三个大的族群：从海盆西沿到萨摩亚，属于密克罗尼西亚，它的南面属于美拉尼西亚，更广阔的海域——从夏威夷到新西兰、复活节岛，被称为"波利尼西亚大三角"。

一直从事太平洋地区原住民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希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法国探险家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使用的这三个术语，与其说代表了三个民族，不如说它们是三个文化圈。在一个文化圈内，即使相隔数千公里，语言仍然通用。

到19世纪西方人在广阔的太平洋中南部开始殖民之前，这里生活着数百万人口。一种说法是，夏威夷在1840年有35万人口，很快因传染病缩减到5万人。在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也有从数万人下降到数百人的案例。

无论如何，这片海域、这些岛屿、这些人民，位于大洋的心脏，就像人们称呼夏威夷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掌控太平洋的关键一环

作为游客必到之处，瓦胡岛至今还有夏威夷国王的宫殿伊欧拉尼宫，以及最伟大的国王美哈美哈一世的雕塑——它像传说中的本尊那样超过2米，有黝黑的皮肤和金黄色的装束。

希洛说，通常人们认为，波利尼西亚人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从西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夏威夷，但也有说法是这个时间可以提前到公元前几百年。



夏威夷瓦胡岛檀香山，国王美哈美哈一世的雕塑

到18世纪末，西方人发现夏威夷时，四个最大的岛屿上有四个国王或酋长，与世无争地统治着自己的国度。

夏威夷是大洋中最晚被发现的群岛之一。通常，西方航海家从岛屿密布的南太平洋进行穿越海盆的航行。第一个是葡萄牙的麦哲伦，第二个是西班牙的德雷瓦，第三个是英国的德雷克。其实在整个大航海时代，船长们仍然十分忌惮在太平洋中航行。

德雷瓦是秘鲁总督的侄子。西班牙人抵达美洲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大陆西面的大洋里有一座满是财富的南方大陆。他们把这个大洋称为"南海"，后来因为麦哲伦穿越海盆时一帆风顺而被命名为"太平洋"。

德雷瓦既没有找到南方大陆，也没有发现期待中的宝藏。西班牙在海盆的一些岛屿上建立了殖民地。但由于航行困难，它们在17世纪初几乎全部被废弃。

德雷克则是为了寻找传说中连接大西洋和美洲西岸的"西北航道"而驶入太平洋。后来为了躲避西班牙舰队，他只好向西穿越太平洋，最终从好望角回家。

直到 18 世纪末，英国人库克开始了对太平洋的真正发现之旅。

库克在太平洋航行的第一个任务仍是寻找“南方大陆”。他最终发现，在南半球中纬度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澳大利亚之外的任何大陆。但他驶入南极圈，预言了南极大陆的存在。

“西北航道”则是库克航行的现实任务。那时，西班牙统治着北纬 50 度以南的大洋，也就是从美洲前往亚洲的传统航道。

英国人急需把中国的纺织品、茶叶和瓷器快速送回大不列颠，或是更便捷地抵达印度，于是国会拿出两万英镑奖励寻找“北方航道”的船长。

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库克于 1778 年率领两艘帆船抵达夏威夷第四大岛考爱岛。

从那以后，无论要从两大洲相向航行，还是掌控太平洋，拥有北太平洋唯一深水港的夏威夷都成为关键一环。

被分食的神

库克赞助给美哈美哈一世枪炮和铁器，后者从夏威夷岛出发，很快统一了四个最大的岛屿，这就是夏威夷王国的由来。

那时，美哈美哈一世带领几千人从今天繁华的威基基海滩登陆，具体地点大约就在希尔顿酒店到 DFS 之间。几百名抵抗者一路向北败退，直到现在被称为“大风口”的峡谷，最终被赶下悬崖。白人与夏威夷历史的关联，由此真正建立。

这一战大约 150 年后，日本战斗机正是从大风口鱼贯而入，南下袭击了珍珠港。

俯视广阔的大洋，本地导游一般都会夸张地告诉游客，日本航空母舰那时就停留在目光所及的外海。其实，当时日本特遣舰队距离夏威夷最近也要 400 多公里。

库克最终死于夏威夷。本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他抵达夏威夷时正是当地祭祀的季节，国王以为他是天神而给予崇拜；等他第二次因桅杆问题返回夏威夷时，却不是天神应该降临的时候，国王为印证他是否拥有不死之身，用木棒尝试，库克因此丧命。

西方公认的说法则是，库克为了获得补给，与波利尼西亚人发生冲突，于是被杀。

无论如何，库克最后被分食。一些权威著作说，他的遗骸在 19 世纪仍然作为神迹被不同部落和原住民精心保存。

苏联解体后，太平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的“内湖”。它的安全警戒线在东亚大陆的近海，“波利尼西亚大三角”作为海洋屏障的作用似乎小了很多。

现在，库克的墓地就在瓦胡岛北岸、大风口向西的海湾里。这也是原住民聚集的地方。由于要建设大型酒店，很多人家的墙上都有“NO NEW CITY”等标语。

夏威夷被发现后，成为太平洋贸易和捕鲸的重要中转地。无论是美洲、亚洲之间的货物往来，还是从阿拉斯加南下追逐鲸群，漫长的航行都需要休整和补给，这个地点就是拥有良好港口的瓦胡岛。

伊欧拉尼宫因此成为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宫殿，使用电力比白宫还要早。

1842 年，在距离伊欧拉尼宫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夏威夷第一座教堂卡瓦依阿好教堂，它由 1.4 万块珊瑚礁石建成。如今，它和伊欧拉尼宫、美哈美哈一世塑像等组成了火奴鲁鲁市区最有名的观光路线。

珊瑚礁石符合夏威夷王族的传统：王室成员过去大多葬于海底洞穴，尽管受到基督教开化的影响，他们仍然愿意用珊瑚礁石装点自己的墓地。

但是，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太平洋航行已安全可控，不仅夏威夷难以保留其传统，在争夺殖民地的浪潮中，大洋也变得拥挤起来。

最后的女王

先是英国。本来美哈美哈二世曾想与英国建立密切关系，但是他和王后访问伦敦打算签署条约时，因麻疹去世。1812 年，美国和英国舰队在太平洋进行了一系列交锋，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趋于平静。

还有俄罗斯人。1816 年，在一艘军舰的胁迫下，夏威夷国王将瓦胡岛的一部分割让给俄罗斯，后者派遣了 500 人驻扎。但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东部太平洋实在太过遥远，而且他们更需要在欧洲的出海口。最终，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在 19 世纪末败于日本。

法国舰队在 1849 年袭击了瓦胡岛，此前 6 年英国军队也曾在瓦胡岛登陆。西方人就这样在夏威夷获得了贸易、土地等各种权利。

还有德国，用舰队占领了位于海盆西面的萨摩亚。当德国、美国、英国打算在那里终极 PK 时，1889 年 3 月的一场强热带气旋，将对峙舰队扫荡无遗。德国在这里的权利一直保留到一战结束。

在更远的菲律宾，美国与西班牙发生了一场战争，后者作为老牌海洋强国丧失了最后的尊严，美国得以在远东真正掌控一个支点。

周旋在强国之间的夏威夷王室甚至想到了日本。1885 年，一位夏威夷国王访问日本时，曾向明治天皇提出，由日本的依仁亲王迎娶他的侄女。这次联姻最终未果。

日本人最早在 18 世纪中叶到达夏威夷。那时由于西方人带来的疫病，原住民迅速缩减到几万人的规模。

西方甘蔗种植园主从日本和中国引进劳动力。如今从火山公园返回夏威夷岛东岸城市希洛的公路边，还可以看到第一个日本劳工工作的制糖场。

制糖业深刻地改变了夏威夷的社会经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种植园主怂恿国王美哈美哈三世用保护条约换取了美国的蔗糖免税待遇。这个时间是 1876 年。其后 14 年，夏威夷出口美国的蔗糖从 2100 万磅上升到 22500 万磅。

与此同时，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后者最终在 1887 年获得了珍珠港的控制权。“美国获得夏威夷，包括经济和战略的原因。”达格拉斯说。

在美哈美哈三世的继任者卡拉卡瓦国王的时代，通过了君主立宪制的宪法，使权力进一步归属种植园主阶层。

卡拉卡瓦的妹妹利留卡拉尼女王为保护原住民的权利进行了最后的努力，并因此在 1893 年被一场由美国公使和海军陆战队深度参与的政变推翻。这以后，白人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

这是美国外交官在历史上第一次参与颠覆驻在国政府。

“利留卡拉尼女王今天在夏威夷仍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道格拉斯告诉本刊记者。

1898 年，美国与夏威夷共和国合并。

盘旋。如果晚上在夏威夷岛中部行车，还可以听见机枪连续射击的声音，这是那里的陆军基地正在训练。

教会大学的“校办企业”

如今夏威夷的军事气息已经减弱很多。冷战结束后，威基基海滩上已经很少见到着装的休假军官。

苏联解体后，太平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的“内湖”。它的安全警戒线在东亚大陆的近海，“波利尼西亚大三角”作为海洋屏障的作用似乎缩小了很多。

但希洛认为，夏威夷仍是整个波利尼西亚文化圈的核心，作为必到景点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就是体现。

在中国人眼中，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就是一个巨大的民俗园。但举办者和当地人都称之为博物馆。夏威夷、萨摩亚、塔希提、汤加、斐济、新西兰、马克萨斯 7 个不同的族群，在此都有典型村庄，反映其文化传统与风土人情。

压轴大戏是每天晚上的大型舞蹈剧。它描述了一位波利尼西亚王子在 7 大族群中闯荡，学习不同技艺，最终为波利尼西亚人所尊崇的故事。

两个小时的演出极具夏威夷特色，但美国文化气息仍然浓重。比如描写王子诞生的第一章，如同迪斯尼歌舞剧，连配乐也和“狮子王”类似。

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由杨百翰大学夏威夷分校举办，作为学生勤工俭学的场所——杨百翰大学是美国最大的教会大学。这所大学主要招收来自世界各地岛屿的学生，包括台湾、菲律宾等等，但主要针对来自中南太平洋各地的波利尼西亚青年。

学校主楼大门上的醒目绘画是，一群波利尼西亚儿童正在参与一次星条旗升旗仪式。它来自殖民时代的典故，如今具有某种特殊的意味。

杨百翰大学夏威夷分校旁有一大片波利尼西亚人社区，还有一座白色、庄严的教会圣殿。导游的教会志愿者说，在学校里就读的都是来自各个岛国的精英子弟。

在这里，他们学习关于自己族群和大洋的历史，了解美国和基督教，然后将美国式的历史叙事带回自己的岛屿。



19世纪的夏威夷原住民

日本人的挑战

日本人是美国在夏威夷权力的最后挑战者。不过即使对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主要是想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而不是真正占领太平洋。”道格拉斯说。

到一战结束时，日本从德国手中获得了位于海盆西沿的北马里亚纳，看起来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南太平洋。

当日本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战胜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后，美国于 1907 年派出全部漆成白色的舰队进行环球航行，向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宣示势力，这就是著名的“大白舰队”。

随后，由于巴拿马运河计划在 1914 年投入使用，大大方便了美国在两大洋调配海军，塔夫脱总统决定在珍珠港建立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

夏威夷因为其独一无二的位置，既可以作为两洋舰队调配的中转地，又可以支配几乎整个北太平洋。它距离亚洲大陆也足够远，可以作为战略纵深的支点。在更靠近亚洲大陆的地方，美国于菲律宾建立了第一线阵地。

如今在进入珍珠港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工厂式建筑，门前全是民用牌照的车辆，既看不到围墙也没有哨兵。

在珍珠港，除了众所周知的密苏里号战舰和亚利桑那号遗骸，还可以看到天外来客一般的“海基 X 波段雷达”。

它的外形就是海上石油平台加巨星球状雷达，作为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部分，它可以探测到数千公里外棒球大小的飞行物。

美国共有 3 部“海基 X 波段雷达”，全部部署在太平洋：珍珠港、关岛、冲绳。

除了“海基 X 波段雷达”，2013 年科幻战舰 DDG1000、濒海战斗舰都曾在珍珠港停留，然后前往东亚，下面也许就是超级航母“福特号”。

不容错过的军事景点，显示了夏威夷在美国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比如瓦胡岛北部的游览胜地古兰尼牧场，作为《侏罗纪公园》、《哥斯拉》、《风语者》、《珍珠港》等好莱坞大片和《迷失》等热门美剧的拍摄地而著名。但这里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就是二战遗留的巨大的军事堡垒。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人才加强了瓦胡岛北部的防御。这个堡垒中至今还有第七航空队的标识：盾徽中心是插入旭日图案的“7”。

战争中，第七航空队负责对日本的战略轰炸，也就是所谓“地毯式轰炸”。

如今无论在火奴鲁鲁国际机场还是夏威夷岛的两座机场，都可以看到军用飞机起降、



王学富：

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多年沉潜于心理咨询专业实践，探索和创导中国本土的“直面疗法”，并致力于推动中国与西方存在-人本心理学领域的对话与交流。著有《受伤的人》、《成长的路》、《医治的心》。

神经症的另一端是创造力

敏感的神经里隐藏着一种创造力，如果你压抑它，就会形成神经症

文 | 王学富

坐在教室，对周围的声音和别人的动作都特别敏感，害怕受到影响，强撑着把目光放在书本上，却看不进去。害怕跟别人眼神接触，又忍不住寻找别人的眼光。本来担心受到周围声音与动作的影响，又忍不住关注和收集环境中的任何一点响动和迹象，包括别人的眼神、咳嗽、动作、姿态……就好像有一块磁铁把心吸到那些琐碎的方面去了。越是害怕各样的感觉，越是沉溺于各样的感觉，渐渐跟世界脱离了关系。内心责怪自己，越来越担心自己出现心理异常。每时每刻都感到紧张，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反应，如耳胀、耳鸣、头晕、胃痛，等等。

以上这段话，是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写信或在谈话中向我描述的情况。分析起来，他们的心理困扰有环境的原因，如学习压力过大；也有个人的原因，就是太敏感，对事情有过度的担忧。他们是神经极其敏感的人。我跟他们谈话，不太去管他们的感觉，我最关注他们的态度——我问他们：如果你的神经比别人更敏感，你怎样看待这一点？既然你有比别人更敏感的神经，你怎样使用它？

神经症的形成

有一个高中生就是这样在信中描述她在生活中各种细微感觉和担忧的，下面是我对她的来信的一个回复：

读你的来信，我内心不禁感慨：好微妙、曲折、丰富的内心体验呀。如果不是排斥这种内心的感觉，而是拿起笔来，就这样把它们写出来，你简直可以写一本意识流小说了。

法国有一个作家叫普鲁斯特，就是一个内心有许多细微感觉的人，他的选择是，把往日的记忆过滤成美妙的文字，结果写成了《追忆似水年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你可以试试!

你有这么细微的、触须一般的感觉，如果诉诸文字，让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呈现或流淌，就成了文学；如果不明白它们，害怕它们，把它们阻塞起来，就成了症状。

我曾经接待一个高中生，她周期性来跟我谈话。她的神经极其敏感，给她造成了无限的烦恼。原因在于，她觉得一个人有如此敏感的神经，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有了这样的想法，她就无法控制地去关注琐碎之事，如“别人怎样看”之类，因而陷入了神经症。但在谈话中，她慢慢意识到，敏感的神经是她身上独特的东西，不必否定它，不必害怕它，也不必压制它。这时她发展出一种新的态度，并且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后来她考上大学，进入影视戏剧文学系，开始了她的创作。因为有这样特别的内在资源，她创作出来的作品被导师评为“接近了博尔赫斯”。

敏感的神经里隐藏着一种创造力。但是，如果这种创造力一直在隐藏之中，受到抑制，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式发挥出来，就会形成神经症。神经症就是资源受到压抑的状态。心理学上真正的医治，就是释放这种被压抑、被禁锢的创造力。



变神经症为创造力

治疗师也常常是一些神经敏感的人。甚至有些治疗师曾经是神经症者。只是他们经历了转化。这个转化的关键在态度。举例如荣格，如森田正马，如艾里斯（Albert Allis），以及欧文·亚隆（Irvin Yalom）。在亚隆年轻的时候，也曾为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而苦恼，因为他不想感受到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但另一位心理学家提醒了他：你有敏感的神经，比别人更容易感受到痛苦，但你也因此有了比别人更多的灵感和创造性呀！这就是接受的态度。

原来，一个人有敏感的神经，这或者是一个生物的既成事实，或者是过去生活影响的结果，或者二者兼有。这个事实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由一个人的态度决定的。如果他拒不接受这个事实，就会发展出各种违背自己的行为，就把它变成了导致神经症的根源。如果他接受这个事实，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充分使用它，反而把它变成了成长与医治的资源。

其实，你的这些感觉，许多人都有，我自己也有。我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到现在，这些感觉还会时时从我敏感的神经里产生出来。这话你听来可能会感到惊讶。但你可以想一想，一个跟人的心灵打交道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他能行吗？因此，跟你一样，我有许多微妙的感觉，但不同的是，在我眼里，它们是我生命的特质，甚至是我的禀赋，是我理解来访者并跟他们一路同行的资源或条件。不然的话，对于他们内在丰富而复杂的感觉世界，我就不得其门而入，也不能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心理咨询了。

因此，对于来自敏感神经的那些细微的感觉，它们在那里，就让它们在那里。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试图去消除它们，而是用新的态度去看待它们，找到新的方式去使用它们。你相信吧，它们可以成为你的宝贝。许多人没有它们，似乎不像我们这么烦恼，但他们也少了一样宝贝呀。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粪堆里埋着金子，它就不只是一个粪堆了。当我们伸手进去掏出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我们会为之高兴，就不以为脏了。

因此，我读你的来信，为你感到惋惜，因为我看到，你在滥用感觉的资源，把它们全部当成了烦恼，而不知道里面埋着宝贝。

私人剧场

或许，你太在意自己了，不去管生活的经验，只去关注内心的体验。在感觉里，你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的中心，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就像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都随你的感受在动。我要问，你有什么心思，有什么动作，周围的人真的会那么在意吗？

或许，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跟人交往、互动，就暗中采用这种感觉的方式，跟人建立一种无效的关系。你总在内心里说“我觉得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参与你的感觉，那只是你的感觉，只有你一个人在自己的感觉世界演戏。这个，被安娜·O（弗洛伊德的第一位“女病人”）称为“私人剧场”。

或许，你的经验太单一，生活太单调，才为自己建立一个私人剧场，沉溺在那个隐秘的感觉空间里，表演着，演得热火朝天，但周围的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是你自编、自导、自演、自观的戏剧。

一个人的私人剧场，就是他的神经症。安娜·O也曾在自己的私人剧场里表演，但后来她决定离开这个孤立而封闭的感觉世界，走进现实的生活，在经验里成长和发展，最后，她充分实现了自己。安娜·O在社会服务领域发挥出自己独特的创造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德国政府的嘉奖。

什么时候你能够接受自己的神经比别人更敏感，并不害怕它，也不执著于它，更不迷恋它和麻醉自己，你就开始走进生活的广阔领域，在那里有所创造，有所建造。

对于敏感的神经，我们的态度是：它带来的痛苦多一些，它带来的资源也多一些。

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特质，每个特质都不能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评判它，这些特质就像一块钻石，你从这一面看是锋利的刀刃，从另一面看到的是它折射出的美丽的七色光，它们对你来说，是什么，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挖掘出了自身特质的宝藏！

《修行论语》秉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致力于探讨现代人的心灵修养，传播仁爱的精神。栏目开办以来收到很多热心读者意见反馈，为此特设邮箱：lancy_xxly@126.com，征集读者关心和困惑的问题，兰溪将代你请教大师。



报道反馈


中国人一辈子都是讲责任

本刊近期刊登了著名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的系列访谈，谈及中国模式、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的根柢等问题。在姜义华看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强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而我们今天要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要建立在对自己的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有真正了解的基础之上。”

该访谈被光明网、新浪、腾讯、人民论坛等多家主流媒体及网站转载，引发读者热烈讨论。来自辽宁的网友“萨尔布鲁克”说：“中国的文化并不比外国差，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因为曾经衰落过就无止境地自我贬低实在让人痛心。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概否定是错误的。”四川网友“执笔、写青春”则感叹：“我为我出生在这个华夏民族而自豪，不因为别的就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热爱这里的一切！热爱家风教会我的种种责任！”

（《中国人一辈子都是讲责任——历史学者姜义华谈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暨根柢》记者：杨天 2014 年第 8 期）

大树去哪了

前几天，开车路过一条村道，被一辆装载着挖掘机的大卡车堵住了，因为场地狭小，一群人手忙脚乱地“张罗”着如何把挖掘机从车上开下来。

我进退两难，索性停车休息。其中有个老板模样的，见堵了我的车，过来递烟，让我稍等。我便与他聊上了，原来他是个树贩子，就是从农村低价购进大树，然后运到城里去，从中赚取差价。他指指山头的一棵银杏，他说出了 5000 元。我问他运到城里可以卖多少，他笑而不语。

此时村人在旁边围观。有个胖大婶，说话咋咋乎乎的，说她家也有一棵银杏，但长在屋前，挖掘机开不进，即便挖了也抬不出去。看到山头的那棵银杏可以卖 5000 元，露出十分羡慕的神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始，农村里一些珍贵的树可以出售了，经常有骑着摩托车的陌生人来打听，价格也是连年上涨。前几年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村庄的村外有一排松树，长得婀娜多姿，但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只剩下几个大坑，显然是挖掘机干的，村人报了警，但最后不了了之。

在城里，我经常看到道路边、小区里、公园里会出现硕大的树，我就会猜想这些树也许是树贩子从哪个村、哪个山头挖掘来的，或是买的，或是盗来的。

我有一个亲戚为树贩子做苦力许多年了，每天工资 200 元，任务就是挖那些挖掘机器无法上山挖掘的树。人工挖一棵大树，然后从山上抬下来，四五个人也往往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经常在公路边看到形形色色的苗木基地，里面总有一些大树，大概都是这样从农村收集来的，这已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也是不少人的生财之道。

我总觉得这样做不对，但至今未见过哪个地方禁止这样做。也许有一天，农村里的孩子会问，村里的大树去哪了，不知怎样回答他们。

流沙（浙江）

热心读者
来信邮箱：
lwdfdzlx@163.com

新华社有错即改
专用邮箱：
ycjg@xinhua.cn

编读往来 热线电话：
(021)64721367
lwdf2008@vip.sohu.com

话费套餐，照顾一下老人

前不久，邻居何大伯抱怨自己的手机费用太高，说自己大部分时间是接电话，很少主动打电话，一个月下来,仍然话费近百,想弃用。我帮他到营业厅一查，随即发现了问题。

女儿过年前，给何大伯换了部智能手机，里面有不少自动上网功能。何大伯眼花，经常不经意按错键，又不记得关停，仅流量超标一项，一个月就支出 20 多元。此外，一些短信提醒、收费彩铃等付费业务，营业员主动打到何大伯手机里，老人家没听明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就用上了，这几项费用，每个月也要支出 10 多元。另外有一项是家里宽带网费“交一送三”业务，要求用户每月保底消费 38 元，老人家根本用不了这么多话费。

一般老人对新科技的接受能力有限，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些只知追求利润的营运商，钻各种套餐空子，伤害了一些老人的利益。老人们大多一辈子生活节俭，每个月多出几十元费用，他们很可能需在其他方面省出来，以致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现在，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希望有关部门从尊重老人的角度出发，加强主动服务和收费透明度，或针对老人推出一些套餐服务，让老人们明明白白消费。

蒋平（湖南）

红绿灯下的“小市场”

近日，笔者发现，在一些城市的主要交通要道的转盘、红绿灯处，因车流量大出现短时的拥堵后，就会出现一些职业的推销人员，紧随车辆周围：主动向驾驶员推销方向盘护套、车用点烟器、手机充电器、车内饰品等；还有些人在发放房产推销广告。而且这些上路推销人员形成了团伙，每一个地段有着固定的人员。

红绿灯下的“小市场”，存在着诸多隐患：一是不安全。交叉的十字路口车流量大，在等候红绿灯时，车辆走走停停，推销人员在路上行走推销，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二是影响环境卫生。发放的小卡片随意丢弃在路上，车辆来回碾压，给环卫工人的清扫带来不便。小卡片上传递的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三是引发治安事件。有的推销人员看见是女司机一人开车，趁堵车时，一人去与女司机搭讪分散注意力，另一人从另侧拉开车门抢劫车内包等。

红绿灯下的“小市场”应当取缔，希望那些维护交通秩序的交警、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的市政环卫部门，以及管理广告发放的工商部门主动出击，打击这些安全隐患极大的“小市场”。

王越忠（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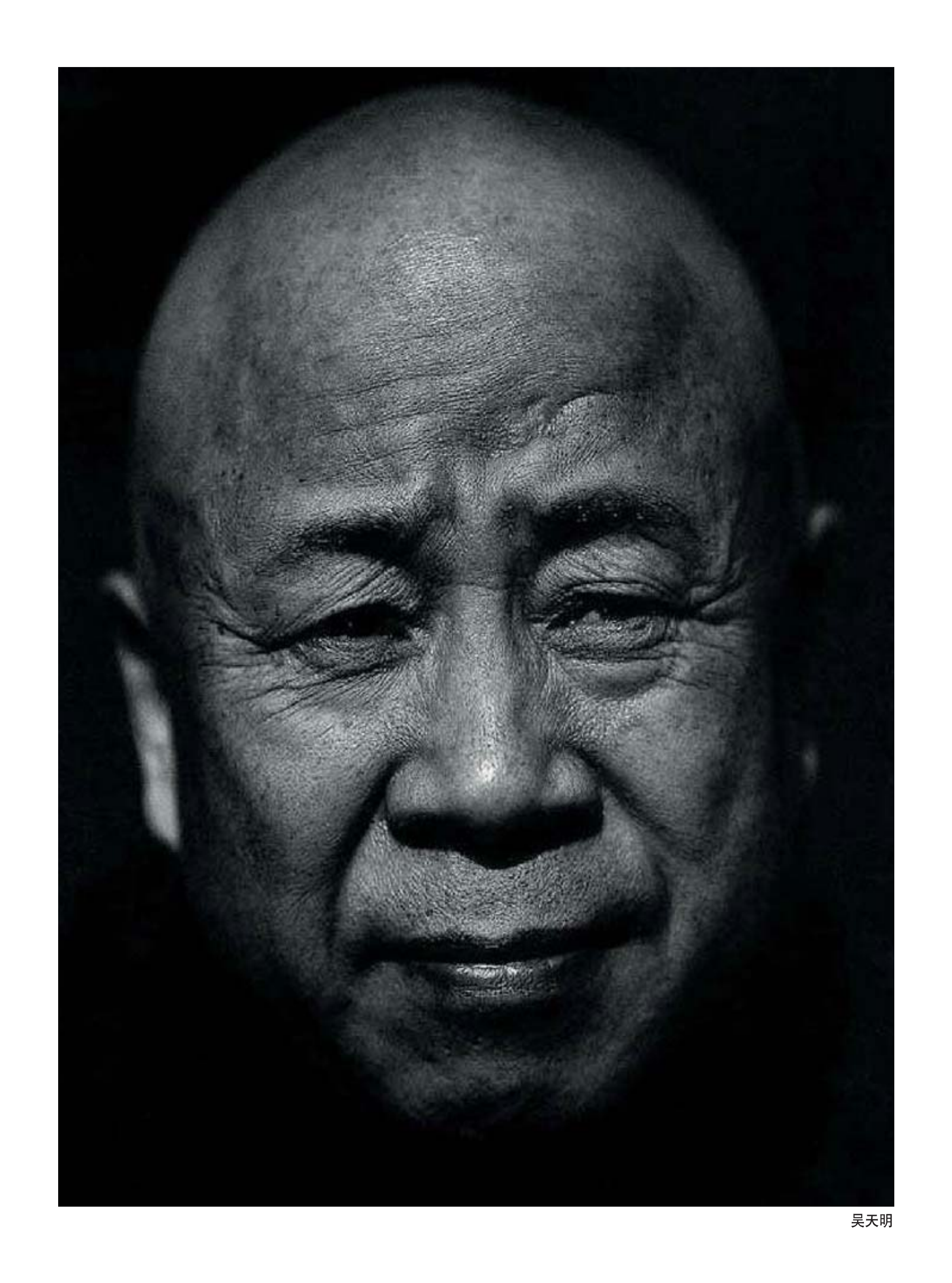
“黑网吧”下乡

近年以来，由于城市里不断加强对网吧的管理，网吧经营逐渐规范化，一些无照经营的“黑网吧”和被有关部门禁止的“不良网吧”正呈现出向乡下转移的趋势。

笔者在公安系统长期的工作中发现，“黑网吧”下乡是看中了农村地域广大、易于隐藏的“优势”。一些无良经营者把网吧设在居民和农户的家里，搞起了“地下战”和“游击战”，如果没有学生家长和热心群众的举报，单凭执法部门单枪匹马行动是很难查获的。同时，由于在农村一些青少年的家长长期在外打工，家里人对他们的管教较为松散，有些学生在网吧一玩就是七八个小时，有些孩子则沉迷于色情影片……

笔者认为，要想让“黑网吧”从农村消失，一方面，监管工作要及时跟进，监管视线要向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延伸。工商、文化、公安等职能部门要有效配合，齐抓共管，扩展巡查范围，加大打击力度，遏制“黑网吧”蔓延。同时，电信等相关企业在接受申请，安装私人宽带时，应查明安装用途，并对宽带使用进行管理，不能只安装不管其用途，如发现是非法开黑网吧的，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对宽带用户进行断网。

田晓剑（山东）


吴天明

告别吴天明：一个时代的背影与省思

吴天明带走了一个时代，同时他用他的离世唤起了"第五代"的回归之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闵捷、薛艳雯 | 北京报道

2014 年 3 月 8 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中国电影界沉痛悼念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西部电影" 奠基人、著名导演吴天明。礼堂的门柱上，贴着一幅用他的 5 部电影片名串起的对联，上联是："人生无奈常变脸 没有航标任漂流"，下联是："老井无声胜有声 百鸟朝凤一曲终"，大字横幅："春雨纷纷悼天明"。

自发前来送行的数百名各界人士聚集在礼堂前的广场上。李少红、谢飞、张艺谋、何平、冯小刚、张纪中、陆川等知名导演出现在追悼会现场。

就在此前不到一个月，春节刚过，吴天明从西安一回到北京，就跑到他家附近的天通苑万达广场看了两场电影。当天两部电影都票房过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要看看是什么。

第二天，他与老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一见面就问："你说那俩电影是怎么回事？" 一部电影一天之间就 "票房过亿"，这事令他大惑不解。

时间退回到 30 年前，1984 年 5 月 27 日，百花奖金鸡奖在成都四川大学颁奖，电影《人生》那年获得 "双奖"。12000 名师生站在雨中观礼，会散了但一个人也不走——他们要看吴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大雨中一直看到天黑，学生们自发地喊："电影万岁！《人生》万岁！"

回忆起这段往事，郑洞天感慨地说："这个情景和一天一个亿相比，是我们过去这一代人和现在这代人的区别。"

"很久没有聚得这么齐了，大家坐在一起坦诚相见，也不避讳在场的媒体，有什么说什么。"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在吴天明追思会现场外接受采访时说。

由于吴天明的猝然离世，中国电影 "第五代导演"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黄建新、顾长卫、霍建起等，3 月 10 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再度聚首，在追思吴天明 "电影情怀" 的同时，也追忆了 80 年代电影的辉煌，并反思当下电影市场过度商业化的 "票房误区"。

在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 的称谓是和吴天明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当年，作为 "第四代" 导演的领军人物，吴天明提携、发现并任用了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影人们。

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的话说，吴天明“接了学校老师的棒”，填补了从导演系学生到真正成为导演的一段历练时光，让更多导演走了出来。

在“为有天明多壮志——吴天明导演追思会”上，除“第五代导演”之外，谢飞、郑洞天、罗艺军、许还山、芦苇等影视界人士40余人济济一堂，深切缅怀这位让西北烈风吹遍国内外银幕的影坛巨匠。他们对于“那些年”电影梦想情怀的集体回忆、对中国近30年电影发展历程的理性梳理，也是对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再思考。

“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

近年来，当导演们忙着大制作、拍大片，票房奇迹屡屡被刷新的同时，“情怀”一词已经很少被提及了，取而代之的热词像“资本运作”、“票房过亿”之类，似乎更能吸引眼球。但是最近几天，当人们回忆起吴天明的时候，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大导演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词——“情怀”。

张艺谋：吴天明的电影风格很像台湾的侯孝贤，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种乡土的、从土地而来的质朴。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东西，他们这一代很注重真情实感，也许从技术、技法、观念上说他们可能落后了，但是他将全部的情感真诚倾注到每一寸胶片上。他的创作风格是大师级的，是无形的，他不追求华丽的、形式感的东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朴实无华，但实在有力。正如俗话说文如其人一样，那真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陈凯歌：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为当时的年轻导演展示才能的舞台，而这座舞台的掌门人就是吴天明。在他的鼓励之下，很多当时非常年轻的创作者，激情澎湃地创作。吴天明强烈的个性影响了很多当时年轻创作者的选择。我记得他跟我说：“凯歌，咱们都是从‘文革’中间过来的，我们得爱老百姓。”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拍《黄土地》采景的时候，他正在陕北拍《人生》。我们四五个人没有车坐，都是走一程再想办法下一程坐什么车。在陕北拍戏的吴天明知道了，派了车把我们送到陕北的家乡，后来在回程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紧紧握手。

李少红：2005年，适逢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将第一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吴天明导演。颁奖典礼上，所有电影人起立为他鼓掌，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个奖项有10万元奖金，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老艺术家在他们最辉煌的年代里过的是最清贫的日子，同时也是鼓励他们晚年还能继续电影创作，完成他们的电影梦想。

吴天明导演接过这笔钱，问他将怎么使用这笔奖金的时候，他沉吟片刻，突然说：“我要把这笔奖金捐献给老井村。因为，老井村一口两百年的井干枯了，我希望这笔钱能帮助他们打一口井，让他们喝上干净的水。”

他用离世唤起了“第五代”的回归之心

上世纪80年代，《红高粱》、《孩子王》里的诗意与哲学，让全社会玩味与思考。电影创作者们用影像营造的梦境，推动中国电影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他们尝试以现代电影语言和传统中国元素的“混搭”诠释这片土地上的爱恨情仇。

吴天明带走了一个时代，同时他用他的离世终于唤起了“第五代”的回归之心。他们在吴天明那里看到了当年的定位仪，也找回了当年的自己——那《孩子王》里的教师，那个种高粱的人，那只远去的蓝风筝……那些曾经的辉煌深入人心，绝不是票房奇迹所能企及的。缅怀过去，并不是要沉浸在昔日的成就里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找回原点重新出发。那些与观众一起心灵激荡的感觉，又重新回来了。

张艺谋：80年代最可贵的是当时社会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时候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时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别多。那个时代的文学空前繁荣，电影受到文学的滋养。

“头儿”他们那一批电影厂的厂长，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导演的“皇上”。因为他们对上、对下都要负责，而且他们有经济指挥权，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担在他们十几位厂长身上。基于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能够给予我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没有他就没有《红高粱》，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爱惜才华。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考上电影学院，一次是拍《红高粱》，而改变命运的这部电影全靠吴天明。

陈凯歌：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健康清新，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关心民族苦难的声音，关心劳苦大众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前途。应该说，那个阶段的中国电影是中国自有电影以来，艺术质量和水平、思想深度的表达、情感的奔放等各个方面，都足以与世界电影先进的国家比肩。

谢飞（“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导演的病逝让人无法接受，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当我们青春年少正要开始人生事业征途的时候，遇到了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当我们重新走上电影创作的工作岗位时，已经是30多岁，甚至人到中年。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也是奋进的一代，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努力学习，迅速抛掉多年的思想禁锢，接受新观念、新变革，在艺术的路上奋进。

罗艺军（电影评论家）：电影评论家跟电影艺术家在80年代结合得非常密切。如果说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提出的“中国西部片”，自那以后，扛着这杆大旗，并且走这条路的就是吴天明。吴天明走这一条路，正好就回到他刚刚到西影厂时的初衷，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西北风，也就是中国的西部开发，这是中国电影里最光辉的亮点，也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

他像一个站在场外的退休教练，干着急也使不上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大步快跑。从某种程度上说，投入的资金多了，投入的情感少了。票房高了，观众的认可度低了。技法更花哨，内容却难免流于空洞。大片们在“大制作”“大投入”“大场面”的宏大叙事中，内容上的空洞与浮夸却在捉襟见肘。

在一场场视觉盛宴的背后，难怪吴天明





吴天明代表作《变脸》、《老井》海报

会问："你究竟想告诉观众什么？" 高投入、高片酬、高回报，电影"三高"虚症的表面，不容忽视的是情感的低投入、内容的低成本、观众的低认可度的"三低"窘境。

在中国电影人心里，已经从心里装着观众，悄悄演变成心里装着市场。观众与市场，二者看似等价，但实际上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想赢得观众的"心"，后者更在意获得观众掏出的钱。所以就有了某些电影在骂声中票房高歌猛进的怪现象。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就是电影情感投入少了，淡了，薄了；观众累了，厌了，烦了。浮夸风在骂声中渐渐走进了死胡同。

这个时候的市场其实是需要一声断喝的，可是似乎谁说都没有用了。强大的利益链下，就算吴天明生前一再发出警示，他的声音也在商业化高速列车的隆隆声中被消音。他像一个站在场外的退休教练，干着急也使不上劲。

但是，可能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由于他的突然离世，无意中给一场疯狂的竞赛叫了暂停。影坛大腕们在震惊中坐下来，集体感念他当年的提携，重温他的电影情怀。蓦然回首，当年拍电影的初衷终于被唤醒，找回了为电影思考、为社会担当的感觉。

陈凯歌：吴天明对我说，他对今天电影的现状不满意。中国电影因为资本市场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绝对有不适应、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吴天明一个人无力改变或改善今天的情形，他只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今天我们这些人集合在这儿来诉说关于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的是：我们在电影学院"七八班"学习电影的时候，我们当年的初衷到了今天有没有改变？

张艺谋：这是中国电影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们拍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片子。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除了有情怀，也需要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去占领这个阵地，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我也在某些报道中看到他对我批评，说得很对。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但他就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都知道。他那个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凯歌、壮壮我们这些人，能拍一部他欣赏的电影。我有一个愿望，就是一直没有完成，其实我后来拍的《归来》，也是想我把电影做好了，请"头儿"看一眼，我很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差不多近十几年来，我们各忙各的，忽略了很多东西，也忽略了沟通，虽然我们每一次见面都像以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后悔，对他的关心和联络都不够。

李少红：以前大家遇到的更多是政治限制上的困难，现在面临的困难来自市场，但这两种情形有相似之处。这 30 年大家一路走来不容易，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这种坚守很不容易。

电影版的"中国梦"

3 月 6 日晚，本刊记者在位于北太平庄的一家电影工作室里独家专访了久未谋面的著名导演张艺谋。身穿黑色外套的张艺谋，表情凝重，比以往更为消瘦。他近日正忙于为新执导的电影《归来》做后期，日程安排相当紧张。

谈话在"吴天明"、"80 年代"和"中国电影"几个关键词中切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说"电影是年轻的艺术，中国电影未来要靠年轻一代。"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展望了未来 10 年乃至 50 年中国电影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之后的发展路径。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到了那一天，中国电影的"春天"就要来了。

张艺谋：中国电影要发展，其实需要各种类型的电影，确实也需要更大的市场。我们都知道中国会迅速成为第一大市场，对我们来讲，其实缅怀吴天明导演，缅怀他所有的品格和情怀，就是要把我们手头的事儿做好，把电影拍好，无论什么类型。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每一部片子尽量拍好，尽量用"头儿"那种情怀，用他的那种期望要求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缅怀。

中国电影未来要靠年轻一代。电影是年轻的艺术，不是唯艺术电影为最高。电影承载着娱乐功能。要两手抓，一手是优秀的艺术电影，一手是真正的商业大片。不能简单片面地看商业电影，优秀的艺术电影也可能在商业上很成功。

中国未来 10 年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这是一块蓬松的大蛋糕。但是我们不能让市场教育出的都是"好莱坞式"的观众，所以要鼓励年轻人拍好中国电影，包括商业电影。把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拍好。

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未来可以继续扩大市场，保护民族的传统，以高质量的电影拓展市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路还很漫长。《卧虎藏龙》是个奇迹。开放、民主、体制、法治、审查制度的开放、年轻人有才华、有创造性、市场更加理性，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电影的"春天"就来了。这大约需要 50 年，这就是电影版的"中国梦"。



文 | 李赛拉

勇敢的“亚洲新娘”

绝大多数西方中产阶层的生活，与中国北京上海的中产阶级并无太大不同——朝九晚五，上有老下有小，还身负房贷、孩子的教育费

“另一边的草看起来总是更绿”，但实际上，人生都是战斗，无论你生活在哪里

最近，一位在国内事业小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在经过反复纠结后，终于决定辞去工作，告别家人和朋友，追随已经回国的英国男友，去英国结婚、定居。

这个消息在朋友圈里引起了热议 —— 她做得对不对，“值不值”？

总体来看，身在国内的朋友大都持赞成或者羡慕的态度，原因也很容易理解，比如“那边至少没有雾霾”，“她也到了生孩子的年龄，英国教育那么好，正合适”。

但有意思的是，当我跟身边的英国朋友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多数人却持保留意见，有人甚至干脆表示 “不看好”。为什么呢?

一位曾在中国生活过的英国朋友说，不少中国人对英国仍然停留在浪漫想象的层面 —— 伦敦雾、牛津剑桥、乡间豪宅、绅士淑女。这些当然都是有的，但现在的英国人，几乎不可能像《唐顿庄园》里一般，每日华衣加身，朝宴晚饮，田园牧歌。

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是，英国是一个 “阶层感” 很分明的社会。非富即贵的 “上层”，很多在伦敦有豪华公寓，乡间还有庄园，是活得最 “唐顿” 的一群人。而绝大多数中产阶层的生活，与中国北京上海的中产阶级并无太大不同 —— 朝九晚五，上有老下有小，还身负房贷、孩子的教育费。如果没有祖上福荫或父母帮衬，在寸土寸金的伦敦供一套房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压力巨大的。

此外，英国其他地方与国际化大都市伦敦也有巨大差异，很多 “小地方” 生活节奏慢，宗教气息重，几乎没有娱乐生活和国际化气息。如果是从国内的北京上海去那里生活的话，可能会面临严重的 “文化震荡”。

说起有口皆碑的英式教育，同样也不是那么一片光明的。著名私校和寄宿学校，价格昂贵且不说，即使有钱且愿意花钱，也要参加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拼分数，学校决定录取谁时可能还要再拼一拼 “关系”。公立学校中 “教学质量” 好的，现在竞争也已经非常激烈 —— 英国教育界现在开始反过来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要求给孩子更大学习压力，特别是数学和科学课程，否则未来一代在国际竞争中将无立足之地。

说到这里，英国朋友用英国式的婉转语言总结说，你的朋友真是一个勇敢的 “亚洲新娘” —— 敢于舍弃一切，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与文化差异和生活压力的双重压力拼搏，我祝她好运。

我开玩笑说，怎么被你一说，她像是来自找苦吃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她太幸运了。

这一次朋友用了一句英国谚语来回答我 —— “另一边的草看起来总是更绿”，但实际上，人生都是战斗，无论你生活在哪里。



李赛拉：媒体人，现居伦敦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文 | 韩娟（Jen Ambrose）（美国）

中国：现实版的魔幻“中土大陆”

我们常常把现实的中国当作魔幻中的“中土大陆”来探险，因为在我们看来两者有时同样充满神秘感

我们全家第一次发现“中国”（Middle Kingdom）与《指环王》中“中土大陆”（Middle Earth）的相似之处，是在2007年的桂林。

那一次，我们在深深的溶洞里又“呜”又“啊”，沉醉于神奇的钟乳石构造。站在那里，我的感觉是，你几乎忘记了时间，丢失了空间感。我先生应该也有同感，他对我和儿子说：“我已经记不起这个地方了”。

这其实是《指环王》第一部《魔戒现身》里，灰袍巫师甘道夫的台词。和我们一样，甘道夫和他的伙伴们也在一个地下洞穴里迷失了方向；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只需要注意来往的游客就行，他们却要小心提防半兽人的攻击。

从此之后，一个新的家庭传统诞生了——我们常常把现实的中国当作魔幻中的“中土大陆”来探险，因为在我们看来两者有时同样充满神秘感。

在西安看兵马俑的时候，我们又产生了这样的联想。站在俑坑里，想到这些陶土的士兵都曾经是2000年前为秦始皇浴血奋战过的，我们惊叹不已，感觉似乎看到了一支从全中国招募来的远古军队。

突然间，我想起了《指环王》第二部《双塔奇兵》中刚铎国摄政王次子法拉米尔杀死了敌人之后说的一段话：“我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家人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谎言或威胁才让他踏上了离开家园的远征之路？”

在北京，我们一家人有空，就去爬长城。现在我们已经记不清是谁第一个说的了，但每次看到山顶上的明代烽火台，就一定会有人模仿《指环王》第三部《王者归来》里阿拉贡绝望的请求：“看，米那斯提力斯（刚铎王城）的信号灯！米那斯提力斯的信号灯！刚铎在求救！”然后，其他人，包括我5岁的女儿，就会齐声高喊希优顿（出生在刚铎的洛汗王国国王）的英勇回复：“洛汗来帮助你们！”

联想一下，几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士兵就曾驻扎在那里，守望一个类似原始的信息传递系统，枕戈待旦。

去年《霍比特人》上映之后，孩子们又找到了新的“中土大陆”台词。一个寒冷阴雨的春日下午，我们正开车行进在北京与河北边界的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突然一阵冰雹袭来。这时，后座上居然传来一阵歌声，先是儿子，然后是女儿，用他们能达到的最低音，唱小矮人们被流放时那首哀伤的歌：“阴冷迷蒙 山那边的远方／是深深的牢狱 冰冷的洞穴／我们要在明天天亮到达……”

我和先生转头看了看外面的雾气，一时间有些恍惚，我们到底是身在现实的中国，还是魔幻中的“中土”。

站在兵马俑坑里，我想起了刚铎国摄政王次子法拉米尔的一段话：“我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家人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谎言或威胁才让他踏上了离开家园的远征之路？”

韩娟（Jen Ambrose）：
现随家人居住北京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漫画／李峰